

我的战后经历

〔日本〕袴田里见著

商务印书馆

K833.137/7

我的战后经历

——一个前共产党干部的证言——

〔日本〕袴田里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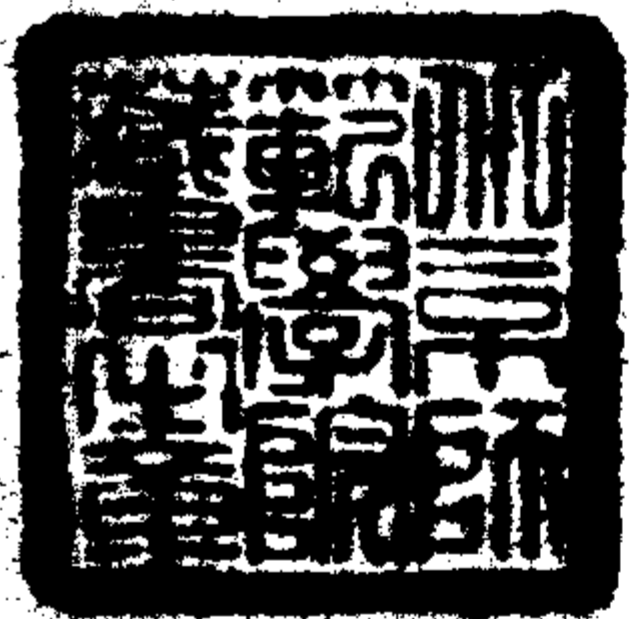
周 斌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84398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784398

週刊朝日

(独占連載)

1978年3月10日—9月1日

東京

内部发行

我的战后经历

一个前共产党干部的证言

[日本] 袴田里见 著

周 斌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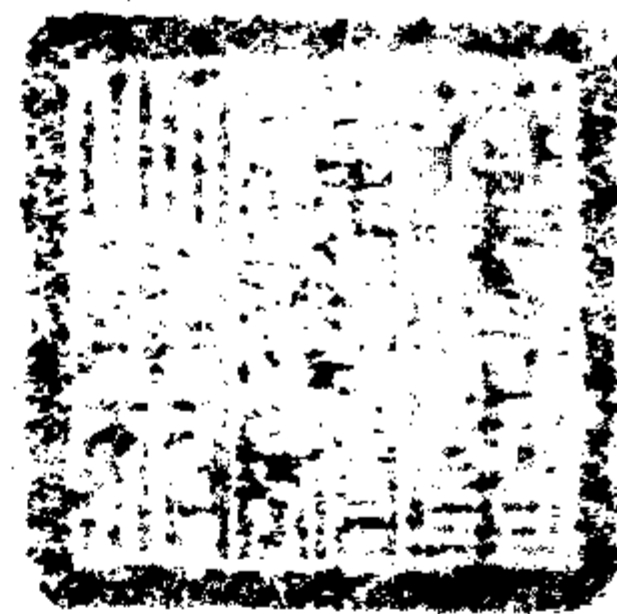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5¹/₂印张 110千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7,300册

统一书号: 3017·283 定价: 0.45元



出版说明

袴田里见是日共老党员，1933年被捕下狱，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释放。出狱后，参与日共的重建工作，曾任日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副委员长等职。1977年同宫本显治闹翻，被日共开除出党。

本书叙述他参与战后日共的重建工作，参加国际共运的活动，来我国访问等情况，可能对研究日本现代史、日共历史、国际共运史等有点参考价值，故翻译出版，内部发行。本书翻译所根据的版本，是由他口述、日本《朝日周刊》记者川口信行整理并在该刊1978年3月10日至9月1日各期连载的文章。本书引述他与我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的谈话，未经核实，也无从核实，谨请读者注意。

D. B. 44
b

目 录

- 第一回 出狱前后,唯恐被秘密杀害…………… 3
- 第二回 为查问特务事件,早就和德田激烈争论…………… 12
- 第三回 介意野坂回国,德田心情复杂…………… 21
- 第四回 追踪伊藤律的“阴影”而被贬职…………… 31
- 第五回 “二·一罢工”,开始揭穿“共产党神话”…………… 38
- 第六回 一九五〇年分裂后,终于逃离日本…………… 45
- 第七回 偷渡中国,险些出事…………… 53
- 第八回 出席斯大林主持的决定命运的会议,被
迫接受“武装斗争”纲领…………… 60
- 第九回 在莫斯科亲身感受到斯大林逝世的冲击…………… 71
- 第十回 继得知贝利亚处决后,又获悉伊藤律被
开除出党…………… 78
- 第十一回 苏斯洛夫在关键时刻插一手…………… 85
- 第十二回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冲击烈度…………… 91
- 第十三回 偷渡日本海,帆船遇风浪……………100
- 第十四回 暴力革命论从党的路线中一笔勾销了……………106
- 第十五回 一九六〇年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后,党
的力量迅速扩大……………114
- 第十六回 胡志明和我竭力调停“苏中关系”……………121
- 第十七回 能言善辩的苏斯洛夫同我在莫斯科的一

| | | |
|------|------------------------------|-----|
| | 场争论 | 130 |
| 第十八回 | 在天安门上获悉印尼“九·三〇事件”时的冲击 | 139 |
| 第十九回 | 日中两党决裂的原因,毛泽东的“苏联法西斯论” | 152 |
| 第二十回 | 证明我对党中央批评意见的内部资料 | 159 |

第一回 出狱前后,唯恐被秘密杀害

要写《我的战后经历》，就得重提一下我的《狱中日记》。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写过日记，此前此后都没有写过。从战争结束那年，即昭和二十年^①元旦起到我出狱前一天十月八日止，我在仙台宫城监狱里，搓搓冻僵的手，写了十个半月日记。

一九四四年年底，我当面向典狱长提出了写日记的要求，他挖苦我好一顿后，才准许我买一本大学生用的笔记本。如何更好地使用这本笔记本呢？

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一直坚信在战争中日本必败。从狱中高音喇叭传来的新闻广播（每晚七点一次）中，也能清楚地知道形势正朝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我写日记就是想把战况的变化记录下来。

尽可能把字写得小一些，这样，一本笔记本便可记下更多的内容——心里虽这么想，但冷天冻伤的手指不听使唤，字越写越大，真叫人着急。

一月一日

早七时起床。整天无事。昨夜降雪一寸左右，但今天天空晴朗，气候温和。元旦盛餐：糙米饭、萝卜酱汤、煮牛蒡、外加两个用花扁豆粉做馅的年糕团子。往年照例的大锅菜不见了。

^① 昭和是日本天皇裕仁的年号，昭和元年为一九二六年，昭和二十年即一九四五年。本书作者时而用昭和年号，时而用公历年号，译文都折算成了公历年号。——译者

世人说，男子四十二岁交厄运。我正好迎来了四十二岁。但是，今年不仅是四十二岁的男子流年不利，而且全日本人民都交厄运。

被捕至今正满十年，服苦役已过两年。健康情况甚佳，痔疮也在好转。

五月三日

苏联公报宣布，苏军五月一日下午完全攻克柏林。这是四月二十一日向柏林发动总攻后的第十天。

虽还有低烧，但从今天起白天不再卧床了。

独居十年多，我已成苍老。

卧病三周余，树又添新绿。

八月十五日

阴。昨夜两次空袭警报。

早、午喝粥。十天腹泻，体衰无力。体重大概不足四十一公斤。

使数亿人民遭灾的战争今天结束，但我仍幸存人间。

呀！死伤于战争者何止几百万！我也曾有思想准备：或死于轰炸，或死于炮轰。

我不但担心空袭时被炸死，而且经常害怕不知什么时候就被宪兵杀害。

典狱长警告：“安分守己于你有利”

一九四三年九月，意大利无条件投降那天，当喇叭中传来这一消息时，我朝隔壁的竹中恒三郎（现党中央名誉委员）大声说：

“喂！竹中，听见了吗？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了。不久德国也会投降，日本也要垮台。我们不会老呆在这种地方！”

这引起大家一阵议论纷纷。象是被狱卒听见了。晚饭后，狱吏走了过来。例行检查不是已经完了嘛，我正在纳闷。

他怒气冲冲地吆喝一声：

“袴田，出来！”

我弯腰走出低矮的房门。他说，跟我来。我被带到了空空荡荡的未宣判的犯人拘留所前面。

“打开第十六号牢房！”

说着就把我推了进去，咯当一声上了锁。在寂静的监狱里，这种上锁声最令人讨厌。

“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我大声抗议，他们置之不理。我按牢房的电铃开关，他们也充耳不闻。接着，竹中、春日庄次郎（前中央委员，已脱党）相继被带到这里，关进离我五、六间外的牢房。此后，虽然一天三餐还能吃到饭，但是既不让运动，也不准洗澡，而且还没收了书籍。

不久，典狱长调动工作，临走前把我叫去警告说：

“今后战争将越打越激烈。安分守己于你有利。这次就放你回原来的地方，以后得注意。”

他这句话使我马上想起“龟户事件”。大正十二年^①关东大地震时，一片混乱，南葛工会的一些会员在龟户警察署被杀害了。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②夫妇也死于宪兵队之手。当时我在钏路，得悉这一事件后非常激动，决心继承死难者的未竟事业，无所畏惧地前进，抱着仿佛自己已经当了英雄似的心

① 大正是日本天皇嘉仁（裕仁之父）的年号，嘉仁在位十五年，大正元年为一九一二年，大正十二年即一九二三年。——译者

② 大杉荣（1885—1923），东京外语学校毕业后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几次被捕，后成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关东大地震时，被宪兵大卫甘柏正彦杀害。——译者

情，来到东京。

就在那个时候，我见到了建党时期的领导人渡边政之辅^①，随后又认识了德田球一^②。

不久以后，我知道他们在一九二三年六月“第一次共产党事件”^③中被捕，这时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我的脑际萦回着“龟户事件”，几个念头一闪而过：如果美军在盐崎一带强行登陆，宪兵队就可能大批闯进监狱；他们认为共产党人如果活着，就会同美军合作，进行报复，为了消除这种隐患，不如乘着混乱……。

七月十日，仙台也遭到美机的狂轰滥炸。在那样密集的炸弹爆炸下，自己并不感到恐怖。身在狱中，既无远走高飞、逃之夭夭的目标，又无确有把握的前途。很奇怪，这种时候的担忧往往缺乏真实感。但当想起自己可能被弄到某个角落去干掉时，心情就不同了。

十五年的监狱生活，历史性的十月四日

八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虽然写着“我仍幸存人间”，但释放

① 渡边政之辅(1899—1928)，日共初期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三年六月被捕，出狱后继续从事重建党的工作和工会运动。一九二八年二月在台湾基隆受警察凌辱，被迫自杀。——译者

② 德田球一(1894—1953)，日本大学毕业后当律师，早年信仰共产主义，是日共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八年被捕，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获释，在狱中坚持斗争近十八年。出狱后重建日共，成为日共主要负责人。一九五三年病故北京。——译者

③ 一九二三年六月，日本统治阶级对日共发动第一次大规模镇压。翌年二月，日共被迫宣布“解散”。——译者

我们政治犯的日子却一拖再拖。狱中政治犯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如当面向典狱长要求改善伙食，把四等餐提高为三等餐。

监狱内的伙食分成五等。无职业的未宣判犯人吃得最糟。在有职业的人中，政治犯待遇最低，吃四等餐。提高一等的差别，就在于碗里的饭稍微盛得满一点。

就在这种情况下，迎来了历史性的十月四日。我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

十月五日

雨。阴雨连绵。用间苗拔下来的萝卜做的酱汤，熬萝卜。

昨天，同盟国军司令部命令日本政府废除“治安维持法”^①。对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镇压，在同盟国军司令部命令下宣告结束。念及许多同志在这个恶法之下牺牲，想起自己囚禁长达十五年，(总计)真是无比愤慨。

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一下政治犯都能获释了。但前来说明司法省通知的典狱长却向我宣布：“犯有双重罪者，还没有得到司法省的释放命令。”我吃了一惊。我的心早已飞到了东京，决心在重建党的工作中大干一番。我一阵火上来，义正词严地说：

“岂有此理！我是‘治安维持法’的受害者。所谓双重罪，只不过是借口而已。”

我缠住典狱长不放，但没有结果。众所周知，一九三三年

^① 日本政府一九二五年制定的法律，后来又几经修改，成为镇压革命斗争和群众运动的主要依据。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以变革国体、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结社和运动”。——译者

底，我在和宫本显治^①等人一起查问混进党内的特务，造成小畑达夫死亡的事件^②中，确以“伤害致死”等罪名，被判处十三年徒刑。但我认为，那个事件基本上仍属于违反“治安维持法”。

“如果不服，你可以要求复审。”

这样，要求复审，不是一、二十天就能了结得了的。要求复审，就会被解送东京，而且，即使打上两、三个月官司，也未必能够获释……。想到这里，自己才平静下来。

据我调查，那时宫城监狱里押着四十二、三个政治犯。犯违反“治安维持法”及其他罪者，连我共四人。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暗杀过特别高等警察^③，抢劫银行时枪杀过一个人。从前和现在几乎都不例外，无政府主义者也好，投掷炸弹的人也好，工人出身的很少，大都是中上或中等家庭的子弟。

我找典狱长为出狱的同志交涉一些事情：

“他们出狱后连一件合适的衣服都没有。他们没有干任

① 宫本显治(1908—)，在东京大学读书时从事学生运动，毕业后即以文艺评论家的身份从事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一九三〇年加入日共，不久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和女作家中条百合子结婚。一九三三年被捕，囚禁十二年。一九四五年出狱后和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人一起重建日共，后担任日共书记长、委员长等职，至今掌握着党的领导权。——译者

② 日共几经镇压，受到重大损失。一九三三年，中央委员宫本显治、袴田里见等人对混进日共的特务小畑达夫、大泉兼藏产生怀疑，乃进行内部审查。小畑在挣扎中被打死。当时日本反动政府即利用此事，大加渲染，说日共私设刑堂，打死同志，并以“伤害致死”为由，判宫本无期徒刑，袴田有期徒刑十三年。战后，日本一些反共势力还常常抓住此事，进行反共宣传。宫本等人不敢正面说明历史背景和事件经过，而是躲躲闪闪，常常造成被动。——译者

③ 特别高等警察是日本在三十年代前后的特务组织，简称“特高”。——译者

何坏事，只因为从事共产党的活动，就被捕并关进这里来。难道不应该发一套西服和衬衣、领带、鞋子，以及可供几天食用的大米和旅费吗？”

那时，典狱长已经非常客气了，仿佛主客颠倒过来似的，居然叫我先生了。

“袴田先生，话虽这么说，可您也许不知道，现在走遍仙台市，也找不到一家西服店呀！不是挨了轰炸，就是疏散走了，到哪里去买呢？”典狱长喃喃地说。

我说：

“那就请你们从各自的衣柜中拿出一套来吧。”

现在看来，这等于是故意出难题，但后来他们还是送来了尚未穿过的用灯芯绒缝制的看守工作服。

竹中、春日等都出狱了。出狱前，都被美军反间谍部队调查了一番。询问的问题是：战争期间干了些什么，今后有什么打算，等等。记得竹中后来曾对我说过：

“吃到了多年没有尝过的巧克力，味道不错。抽烟时抽得脑子晕乎乎的。”

我因双重罪而不能获释，心情焦躁

我未能获释，心情明显地焦躁起来。从新闻广播中也可以知道，监狱外的“战后”生活已经开始了。

十月十日

全天暴雨。午后两点，领到一大碗青火豆，十几年没有吃过了，味道极美。

今天，竹中同志出狱。一九四三年五月以来，我和他一直生活在

这里。

早晨，我俩获准单独交谈。我谈了许多问题，给他交待了工作方针。

从今晚七时的新闻广播中得知，敬爱的德田球一同志和志贺义雄^①同志等从东京预防拘留所获释了。他们出来时，五百多名同志冒着倾盆大雨，举着红旗前往迎接，德田同志向他们讲了二十分钟话。

社会形势变化多大呀！昨天共产党被看作奸党中的奸党，我们共产主义者被认为十恶不赦，受到血腥镇压，现在获得自由了。

十月十七、十八日，后来当选为中委的伊藤宪一等人来监狱探望，说是德田球一派他们来的。那时我第一次听说，宫本显治十月九日从网走监狱获释了。我十分惊讶，对监狱当局大发雷霆说：

“我和他是同一罪名。他判无期，我判十三年。罪重的先释放，罪轻的仍扣押着，这是什么道理？我和他不但罪名相同，而且从事完全一样的活动。你们打算怎么办？赶快放我出狱！”

此后，我几乎每天都去找典狱长讲理。一次，我大喊大叫说：

“好吧，再不放我出去，我就揭你典狱长丑事的老底。你贪污配给物资。大马哈鱼罐头你自己拿了二十来个，而只给一般看守三个。这种丑事一传出去，你准得受撤职处分。”

典狱长对这一下子也感到十分棘手。

^① 志贺义雄(1902—)，日共初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八年被捕，下狱十八年。出狱后和德田等人一起重建日共，并历任要职。一九六四年因在国会里投票赞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被开除出党，同年底在苏联支持下另立日本共产党(日本之声)，目前已无多少影响。——译者

我在宫本之后出狱的心情

“我认为他们把宫本错放了。至于你，我已派看守长去东京司法省商议，请稍等等吧。”典狱长这样向我解释。

我宣布进行绝食斗争：“不释放，我就不吃饭！”

“那就以我个人名义释放吧……。”

十月十九日，象送瘟神似地，终于同意我出狱了。现在回想起来，从法律上看还有不少问题，但我坚持一条：“为什么释放宫本，不释放我？”

在这点上，宫本先出狱对我也有好处。估计宫本能够出狱，也是网走典狱长想法找到理由，同有关当局多次交涉的结果。宫本是取得“因病难于服刑”的诊断书而获得释放的。事后，他曾对富士真奈美说过：“我吃了不少土豆，恢复了健康，体重达到六十公斤。”可见他的身体不错。

十月十九日，我从宫城监狱获释；两条腿软弱无力，如果要走路，真是寸步难行。当时我骨瘦如柴，体重只有四十一公斤上下。大腿最粗实的部位，还不到一围，没有膝盖那么粗。战争行将结束前，狱卒陆续调到部队上去当兵，因为无人负责看守，也就很少让犯人到运动场去了。

出狱时无人来接，我强求典狱长派车送我，由戒护课长——地位仅次于典狱长的警备负责人——开车送我到火车站，并替我买好车票。记得他还给了我一些钱。

我没有回故乡青森县，只在山形县外甥家里耽搁了一夜，便到东京去。

阔别十余载的上野车站，在眼前展现出一片废墟，连品

川周围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马路边只有几家当铺依稀可见，其余就是几幢楼房的空荡荡的钢筋水泥架。一切都烧毁了。

我曾从广播中听到，共产党事务所设在代代木，我便径赴那里。但附近的人告诉我：

“听人说过，可没有见谁来过。”正当我不知所措时，偶然碰见了春日正一（现政治局委员），他也刚从监狱出来。不知何故，他身上穿着一套专门为押送犯人穿的服装。听说同志们都在国分寺“自立会”，于是我们两人便一齐冒雨前去。

在那里，高高兴兴地见到了阔别十八年的德田球一和十二年的宫本显治。这时，我正满四十一岁。

第二回 为查问特务事件，早就 和德田激烈争论

“自立会”位于国分寺车站向南步行约十五分钟的地方，象是一所细长的二层木造宿舍楼，楼中间是条走廊，两边各一排四叠半^①大小的房间。

这幢房子原先是属监狱的，犯人刑满释放后，到这里来接受训练，以便能“自立”生活。从府中监狱获释的德田、志贺等人把这幢房子也“解放”了，并把它作为聚会的场所。我到的那天（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可能已有三、四十人聚集在这里了。东京附近有家的人每天来这里上班，无家的则晚上也住在这里。“自立会”既是党的临时本部，又是临时招待所。

我在这里最先见到的是志贺义雄。他是东京帝国大学

^① 铺四张半日本席的房间。——译者

“新人会”的成员，战前曾经见过几面，工会集会时谈过话，但从未一起工作过。这一回也只是相互寒暄了几句，虽然久别重逢，但气氛却非常淡薄。志贺比我大三岁。我现在还记得那时感到他爱装腔作势，摆老资格。

说实话，我可以算作一个“后来者”。多数同志是十月九、十日出狱的。我听说，其中俗称“府中帮”，即被关押在府中监狱的预防性拘留所的德田球一、志贺义雄、西泽隆二^①、黑木重德、松本一三等人，在十月十四日盟军总司令部公布“不得限制自由的备忘录”后，在狱中行动已经自由了，并和盟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他们甚至准备好了决定战后党的方针的声明“告人民书”。

我赶到“自立会”时，这些“干部”正奔赴各地开展工作。德田也到大阪去了，他是为了出席十月十九日在中之岛公会堂举行的“欢迎出狱同志人民大会”，大会情况刊登在十一月七日《赤旗报》^②复刊后第二期上。大会后，游行队伍通过占领军司令部前，发生了由德田带头三呼“麦克阿瑟元帅万岁”的事件。

现在想起来很滑稽，但当时党是把占领军看作“解放军”的。《告人民书》第一条就说：

“由于为了把全世界从法西斯及军国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同盟国军进驻日本，揭开了日本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对此，我

① 西泽隆二(1903—1976)，早年从事进步文艺运动，一九三〇年任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总书记。一九三一年入党，一九三四年被捕，在狱中十一年，出狱后协助德田球一重建日共，并历任要职。一九六六年被宫本集团开除，同年和大塚有章创办“毛泽东思想研究会”。——译者

② 日共机关报。——译者

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因为美国接二连三地提出民主化政策，所以对它产生了某种幻想，但“占领”毕竟不会发展成“革命”。

我虽然觉得情况不正常，但并未就此和德田等人争吵过。我算是曾和德田吵得最厉害的人了。不过从整个气氛看，我总是被他那快速而沉重的嚎叫所压倒。

说到争吵，我第一次和德田发生争吵，是在他从大阪回到“自立会”以后。那是因为刊登在折叠散页《赤旗报》复刊后第一期（十月二十日付印）封里上的《复刊词》中的一段内容引起的。《复刊词》的结尾这样写道：“最后，希望各位注意，不要让本报落入敌人手里。”

仔细读读，这句话不妥。我们是盟军下令释放的，已经取得了合法的权利，而且重建了合法的党；但这个合法的党却似乎在出版非法的机关报。这不合情理嘛！我先问志贺，志贺表示“也有道理”，但德田硬是拒不接受。

他照例又是大叫大嚷：

“不要再说蠢话了！有朝一日我们也许又要处于非法地位。”

我针锋相对地顶他一句：

“谁也不知道遥远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但现在不是刚刚承认我们的合法权利嘛！”

“随你的便吧！”他生气地愤然而去。

战前非法时代的恶梦以及监狱生活造成的不清醒状态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这场冲突。

《赤旗报》第一期已在街头销售了，结果是把还未售出的报纸上的那一段话，都用墨汁涂掉了。

宫本说：“只有你和我”

至于说晚到一步，宫本显治也是一样。他是十月九日离开网走监狱的，比“府中帮”早一天，但十月中旬才到“自立会”露面。那时重建工作已经开始，而且大家和他并不熟悉。宫本自己在他那本《我的五十年经历》（党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出版）中写道：

“（国分寺党的事务所）人来人往，但除袴田里见等人外，德田、志贺都是初次见面。”

宫本入党时（一九三〇年），德田已经入狱。宫本是在几乎没有经历过非法活动的情况下被捕的，所以他说“初次见面”也有道理。宫本有一点是很自负的。他常对我说：

“战前的党中央委员，只有你、我两人了。”而且他也这样写过：

“市川正一^①死于狱中是一大损失，至少在这次出狱的人中，有几个没有‘转向’^②的中委呢？后来知道，实际上还不到三个人。”

“不到三个人”就是“你和我”，这是他很想吐露出来的。

德田和志贺是一九二八年“三·一五事件”^③时被捕的。

① 市川正一（1892—1945），早稻田大学毕业，初期日共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八年一度成为党的主要负责人，一九二九年四月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他在法庭上的申辩词后来以《日本共产党小史》的书名出版。——译者

② 意为转变方向和立场。日本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日本反动当局威逼利诱下，不少人先后“转向”。实质上是一种变节和叛变行为。——译者

③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镇压日本共产党的事件，被捕者达一千余人。——译者

野坂参三^①是一九三一年保释后去莫斯科的。此后为重建党而奔忙的党中央指导部领导人中，不是被捕后死于特别高等警察之手，就是在狱中“转向”，或者堕落成特务。从一九三三年底到一九三五年，党中央指导部被摧毁了。

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以现任中委身份被捕，并坚持不“转向”者，确实只有宫本和我两人。我们是战前最后一届中委。因此，在宫本看来，从组织形式上讲，我们两人应该成为重建党的核心。

但是，我在狱中时就曾预想过，尽管德田被捕时已被罢掉中委职务，但他很可能是重建党的领导人。他是“三·一五”、“四·一六”^②两大事件共产党被告团的法庭委员之一，而且下狱十八年没有“转向”。从这些实际功绩出发，也只能推他当领袖。我托比我早几天出狱的竹中恒三郎给德田捎信，就战后工会的组织工作提出个人意见，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但是，宫本的看法也有一面之理，因为在重建工作的核心中，混进了一些可疑的人物。在重建党的大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月一日举行）上，以下七人当选为战后第一批中委：德田球一、志贺义雄、金天海、袴田里见、神山茂夫、宫本显治、黑木重德。

这些人中，有哪几个是被战前共同从事地下工作这一强

^① 野坂参三(1892—)，学生时期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一九一九年留学英国时，参加英共建党活动，一九二二年被驱逐出境，回国后加入日共，并创办产业劳动调查所。“三·一五事件”中逮捕，一九三一年保释后去苏联，在共产国际任职。我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到达延安，领导反战同盟。一九四五年回国后，和德田等人一起重建日共，一九五八年任日共主席至今。——译者

^②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再次镇压日本共产党的事件，被捕者达七百余人。——译者

韧的纽带联结起来的呢？神山茂夫那时已经失掉党员资格，金天海和黑木重德这两人更为我所不知。记得曾有人提议中西功为中委。至于选出这七个人，并未就资格审查的标准等作过仔细研究，而是让事态放任自流地发展。

再把话题回到“自立会”上来吧。我出狱后，就是在“自立会”里和宫本重逢的，但已记不清楚相互交谈些什么了。我也许说过这类的话：“由于你先出来，我才获释。”我们两人之间没有相互邀请喝茶的交情。我只记得，当时我骨瘦如柴，而宫本看上去倒很精神，比较结实。

我住在“自立会”，而他是从文京区驹込林町百合子^①家到临时本部来上班的。记得后来宫本百合子请我吃晚饭时，拿出陈葡萄酒招待，我曾感叹过：“真阔呀！”

我对德田批评查问事件难于接受

提起我和宫本的关系，就会涉及那次查问特务事件。战后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六年二月召开）前后，也在干部会上争论过。德田严厉批评因那次查问而出了一条人命。他大叫大嚷说：

“因有可能发生不测事件，就不该进行那种查问。那两人是否真的特务，也搞不清；即便是，只要和他们切断联系也就行了。那种查问岂有此理，实在岂有此理。”

我反唇相讥：

^① 宫本百合子（1899—1951），日本著名作家，旧姓中条，宫本显治之妻，年轻时期在苏联生活过几年，回国后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曾多次被捕，著有《贫穷的人群》、《播州平野》等许多作品。——译者

“你说岂有此理，只不过结果如此而已，但查问本身并没有错。许多证据说明他们是特务。你说只要切断联系就行了，但大泉兼藏掌握着群众团体，死者小畑达夫负责财政和组织部门。光切断联系是无济于事的。不把他们扣留一段时间，难免又有同志受害。你不了解情况，却在大发议论。”

我们吵得险些动起武来。查问事情发生时，报纸大肆渲染，说什么共产党私设刑堂，杀害同志。这种印象直到战后还没有在国民中完全消除。德田可能担心这会给重建工作造成困难，但我就是接受不了他的批评。

物资丰富的“自立会”生活

在“自立会”生活，有一点很不错，即食品相当丰富。当然不象现在这样富足，但能吃到大米。德田等人从府中预防性拘留所出来时，用卡车把那里的大米全部运了回来。好象还搞到了一些犯人穿的衣服——类似咔叽色国民服那样的服装——衬衣和药品等东西。德田以前当过律师，他用他那套独特的道理制服了典狱长。即使是最古老的法律，也不会有使这种行动合法化的条文。不过当时的局势就是如此，这样干也能行得通。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不用买米，但“自立会”终究是一个大杂院，人来人往，乱哄哄的。就在这时，住在阿佐谷的德田的堂兄故去，留下寡妇和两个姑娘。寡妇看上了德田，一再劝我们搬去。德田、西泽和我三人觉得那儿可能比“自立会”多一点家庭气氛，就搬到了阿佐谷。

那时，我们三人都是单身汉。不久，德田和那位寡妇同

居，西泽和寡妇的长女结了婚。两人从此建立了继父和女婿的关系，这一家庭关系后来就造成了灾难。顺便提一句，那时志贺也在阿佐谷我们的前面租房住下，同与他一度分居的妻子恢复了关系。

在我们搬到阿佐谷时，党本部也从国分寺迁到了代代木。那里的房子过去是一所电气熔接学校，该校负责人把它捐献给了党。房屋非常破烂，似乎有十五、六人就能把它推倒。我们匆匆修理了一下，不致漏雨，就把党本部设在这里。

关于党本部，还有一个小插曲。书记处负责财政的黑木重德打算找一所比较象样的建筑物，就跑到当时执政的币原内阁^①的藏相泷泽敬三家里，并大力吹捧他一番说：

“你祖父泷泽荣一对社会主义者是持同情态度的。”泷泽差一点把在新桥的东洋柘植公司的房子给了他。币原内阁如能再执政半年，那么凭泷泽的一个图章，党本部就有可能不是设在代代木，而在新桥了。

一九四六年四月战后首次大选时，黑木成为东京一区的议员候选人参加竞选，在日本桥的三越公司一带发表竞选演说时，突然脑溢血，倒下逝世。币原首相、榎桥渡法制局长官还给追悼会送了花圈，而这是史无前例的。

听涛克巳^②在德田紧逼下改变主意

我除了往返于阿佐谷和代代木之间，还要去支援战后最

^① 币原内阁(1945年10月—1946年5月)，首相为币原喜重郎。——译者

^② 听涛克巳(1904—1965)，关西学院大学毕业后进《朝日新闻》，战后成为该报和报业印刷工人的工会领袖。一九四七年入党，先后任中委和政治局委员等职。后因指导罢工不当被贬职。——译者

大的工会斗争——第一次《读卖新闻》斗争，还到群马县去出席建党大会。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关于《读卖新闻》斗争的情况，还能记起几件事情。

十月以后，这场斗争日趋尖锐。要求报社内实现民主化的铃木东民等人，提出正力松太郎社长以及局长级干部等负责人必须承担战争责任，并要求他们全体下台。正力社长对此要求不但不予置理，而且宣布开除工会领导者铃木等人，于是，矛盾更加激化。事态发展到铃木等人组成最高斗争委员会，在报社内进行自主的生产管理了。

为了支持《读卖新闻》的这场斗争，十一月十日，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民主团体在东京日比谷公园音乐堂举行大会，我带领游行队伍来到《读卖新闻》社，当时报社设在现在的有乐町附近。我向马路上挤得满满的群众发表演说后，又煽动大家说：

“现在就去《朝日新闻》社！”

到达《朝日新闻》社大楼正门后，我又大声喊道：

“《朝日新闻》的工人代表赶快出来！”

这时，听涛克巳（当时的产别会议议长，已故）悄悄出现在二楼阳台上。

“《读卖新闻》社处于什么状况，大家都清楚，你们《朝日新闻》的工人就在旁边，却袖手旁观，这象什么话！”

“你说得完全正确，我们工会一定全力支援。”

我们在正门前同阳台上的听涛这样一呼一应。

那天晚上，不知听涛从那里搞到一桶啤酒，用车拉到阿佐谷家里。

我的酒量不大，但德田颇有酒量，而西泽则是见酒不要命的人，听涛也能喝上几杯。几个人喝上几杯，越醉就吵得越凶。

听涛追问德田：“共产党到底要不要搞暴力革命？到底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请你明确回答。”

但是，这个问题连德田也似乎感到无言对答，只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搪塞过去。在酒席上，德田要比听涛高一招。

饮到凌晨，醉意越来越浓的德田力劝听涛入党。醉醺醺的听涛最后嚷道：

“行！到今天为止，我听涛克已决心要和旧的听涛决裂，要成为新的听涛！”

一九四五年最后三个月，对党、对我个人，都是一段黎明时期。在那急风暴雨式的日子里，人们都在注视着另一个人的动向。他就是已从中国延安启程回国的野坂参三。

第三回 介意野坂回国， 德田心情复杂

战败后的第二个月——九月，野坂从中国延安启程回国。他经过满洲（现中国东北地区）、取道朝鲜，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从釜山乘船到博多。其间，报纸、广播逐一报道了他的动向和讲话。到达博多后，抢先报道有关他的消息达到高潮。港口会见记者、在开往东京的列车上的谈话、东京车站的盛大欢迎……整个气氛犹如欢迎一位“凯旋将军”。

德田是以很不愉快的心情看待这件事的。他在十二月党的重建大会上刚当选为书记长。当时，我和德田同住在阿佐

谷的一套房子里。一次，他问我：

“袴田，你看我该不该去东京车站迎接野坂？”

我无言对答，便说：“这得看你自己了。”他听后，嘴里老是在喃喃自语。

当时我患湿性肋膜炎，发高烧。病因可能是狱中营养不足和释放后疲劳过度，因而未能参加公开的党的重建大会。

我在病床上呻吟时，听见德田在发牢骚。

野坂参三是在堺利彦^①、山川均^②、荒畑寒村^③、德田球一等一起建党(一九二一年)时入党的，后来创办过产业劳动调查所。一九二八年“三·一五事件”中，和德田、志贺等一起被捕，但以健康为由保释出来了。说是“眼病”，但当时不可能光凭这种理由就能保释的。我且不在这里多谈此事。

保释期间，他接受党的指示，越过苏满边界^④，前往共产国际所在地莫斯科。此后他就来往于莫斯科和美国之间，一九四〇年起，在中国延安从事反战活动。

眼看野坂即将回国，德田内心仿佛闪过如此想法：“野坂，你算老几！”

① 堺利彦(1871—1933)，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曾把《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译成日文。他也是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并担任第一任委员长。一九二三年被捕，保释后退出日共，从事文艺活动。——译者

② 山川均(1880—1958)，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七年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服，脱党。战后同向坂逸郎等人一起组织“社会主义协会”，并从事文艺活动。——译者

③ 荒畑寒村(1887—)，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被捕释放后和山川均同时受批判，不服，脱党。战后以社会党左派身份参加竞选，当了国会议员，一九四八年又离开社会党。一九五一年曾一度参加“社会主义协会”，后因和向坂逸郎对立而退出。——译者

④ 指我国东北地区和苏联的边界线。——译者

德田发牢骚说：

“野坂虽说住在延安，但总吃了几年中国菜吧。而我们在这期间蹲了十八年监狱，过着非人的生活。可是现在却渲染得这么热闹，真可笑！同时，战前他也只搞过一些调查工作。让这种人当党的领袖，我怎能在他手下工作！”

但是，尽管德田一肚子不满，到两年前为止，野坂一直是共产国际（一九四三年解散）的执委，又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一起生活过。因此他可能是领会了世界共产党领袖们的意图后回来的——不能无视这种客观情况。所以德田又觉得不能不向野坂让一、二步。

正因为这样，德田老是拿不定主意，几次自言自语道：

“看来没有必要去东京车站接他。”

我不耐烦地顶他一句：

“你这么不想去接，就不要去好了。”

他说：“对，现在共产国际也解散了，不能因为报纸一渲染，我就得去接他。相反，野坂倒应该主动来表示一下，‘长时期内，你们辛苦了！’”

这样，他终于下了决心，派志贺前往车站，自己则以书记长的身份在代代木党本部等候野坂到来。

把天皇与天皇制职能分开的《联合声明》

一月十三日，野坂回到东京，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这次就该轮到我不高兴了。德田、志贺、野坂三人秘密开会；有人说是开了三分钟，也有人说是开了三十分钟，会后立即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说什么“我们之间没有意见分歧”。

《声明》结尾是由日共中央和野坂联合签署的。包括我，当时共有七名中委，但德田和志贺究竟同哪个中委就这个声明商量过呢，至少没有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过，但却以正式文件发表了。

即便是野坂，那时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党员，战前也没有当过中委。我因卧病在床，这一切都是事后才知道的，实在令人生气。

这个《联合声明》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到共产党建党二十三年来一直坚持的“废除君主制”，或曰“打倒天皇制”这一根本问题。

战后，美国国务院在如何处置天皇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意见。一种坚持把天皇作为战犯加以审判，一种则主张以某种形式让他为日本战后民主化和复兴服务。在共产党内，德田大体代表前者，而野坂则代表后者。

野坂的奇妙的天皇制理论，早就通过各种方式传到日本，这同出狱后高喊“打倒天皇制”的德田以及志贺之间，显得调子很不和谐。出狱声明《告人民书》上就写道：

“我们的目标是‘打倒天皇制’，建立以全体人民意志为基础的人民共和政府。”

现在打开复刊初期的《赤旗报》，就可以知道，“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是当时共产党最重要的口号。十二月八日举行的“追究战犯人民大会”上，志贺的演说指出：“天皇是最高的战争罪犯。”这句话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诚然，客观地考察一下当时的国民感情，有不少人接受不了以德田为代表的那种对天皇制的明确批判。在和社会党组

织共同斗争时，天皇制问题也是一个障碍。因此，有人对野坂的主张寄予期望确是事实。野坂认为，应把天皇制和天皇个人分开，天皇个人的存废，以后应由人民投票来决定。

野坂和德田的性格差别对这种期望也起了一点作用。和易动感情的德田不同，野坂具有英国绅士的风度，举止非常和蔼。因此，人民战线派的荒畑寒村和山川均等认为，如果是野坂，也许能够一块合作干下去。

荒畑和德田虽是老同志，却老是针锋相对，事事对立。荒畑也是火性子，总是认为比他小七岁的德田“这小子……”；而德田更是寸步不让，在荒畑主持“欢迎野坂参三国民大会”时，毫不留情地对他说：“这里不是你亮相的地方，你不是已经抛弃共产党了吗？”

⑤ 野坂就在这种乱哄哄的气氛中受到了欢迎，但在《联合声明》中，是德田等人向野坂作了让步。

“在承认打倒天皇制方针的正确性方面，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所谓废除天皇制，就是要排除天皇制作为国家制度；至于今后皇室的存在和延续与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应在将来日本民主化实现后，由日本国民的意志来决定。”（见一月二十日《赤旗报》）

接着在党本部举行的“归国欢迎会”上，野坂强调必须建立一个“得到日本人民群众爱戴、支持的共产党”和“受人敬爱的共产党”。但我对《联合声明》中的“天皇分离论”^①持反对态度，而且至今不变。

如上所述，我们为“打倒天皇制”奋斗了二十三年，现在却

① 按即把天皇与天皇制分开的论调。——译者

把天皇制一分为二，变成“作为统治者的天皇”和“半象神主似的天皇”，前者应该废除，而后者可以保留。这真是半途而废。两者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天皇必须以某种形式承担战争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清除长期存在于国民当中的模糊认识和半封建思想。

我在病床上对德田说：

“你想顺应形势发展，那也可以，但必须在会议上充分讨论。”但应该承认，那时我虽反对这种观点，但斗争很不彻底。

野坂走到枕边，握着我的手说：“长期的监狱生活，一定很艰苦吧！”那时我还不掌握任何情况，后来听说，野坂回国前，在延安就和美国战争情报局的约翰·埃默森（战后担任盟军总司令部的政治顾问）有过接触，不知道这一接触对占领军的“天皇政策”有无影响。

战后共产党所犯的 error 之一，就是这个“天皇分离论”，并天真地把占领军说成“解放军”。我还想起和这“解放军”有关的一件事。

那时，盟军总司令部内部的民主力量相当大，因其中还有一些美共党员。由于他们这些民主人士的努力，才使组织工会及其活动自由等进步的占领政策成为可能，而且他们还向我们提供情报。

那时，一个美国人在内幸町日本广播协会三层或四层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坐镇，姓名已经记不确切了。他是美国产联^①（与美国劳联合并之前）的会员，共产党员。他自豪地说

^① 美国产联的全称是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劳联的全称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合并，成为最大的工会组织，全名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译者

过：“我常常驱车一、二千公里，去各地帮助工作。”东京广播系统象是处于他的领导之下，盟军总司令部正在研究什么政策等消息大都集中到他那里。我经常同他接触，取得情报。

一次，他驾吉普车来到德田、西泽和我居住的阿佐谷家里，车上带来一个和尚用的行囊，这个行囊从车上取下后，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熟牛肉罐头、啤酒等食品和衣服。

他笑着说：“物资短缺，你们这些党的领导人也够呛吧。”

这种关系虽不会影响党对占领军的评价，但却能说明某种气氛的一个插曲。

德田沉浸在“某种感慨”之中

德田、志贺等人，再加上野坂，战后的共产党开始了新的运转。德田虽在形式上对野坂作了让步，但领导权一直掌握在自己手里。一九四六年二月底召开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其目的之一就是安排野坂。

我也带病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选举了二十名中委，德田连任书记长，野坂也名列中委。

为了慎重起见，根据当时《赤旗报》发表的中委次序如下：

德田球一、志贺义雄、袴田里见、宫本显治、神山茂夫、黑木重德、金天海、野坂参三、伊藤律、伊藤宪一、春日正一、春日庄次郎、绀野与次郎、西泽隆二、松崎久马次、内野竹千代、水谷孝、藏原惟人、冈田文吉、长谷川浩。

组织上发生重要变更的原因，是德田新成立了“组织活动指导部”，自任负责人。臭名昭著的“组活”^①就此问世，德田

^① “组活”是“组织活动指导部”的简称。——译者

通过它,开始了家长式领导。

德田站在合法共产党的顶点,一定沉浸在“某种感慨”之中。现在直接知道此事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有必要多费几笔。

话题可以追溯到战前。一九二六年春天,佐野文夫、渡边政之辅、福本和夫、德田球一等人相继秘密出境,前往莫斯科。他们都是头年十二月在山形县五色温泉公开亮旗的共产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为重建党的报告事,共产国际把他们召去了。

我当时正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学,知道共产国际此举目的在于批评“福本主义”^①。我不仅了解情况,而且那时还和同时留学的相马一郎等三人联名给跟着福本和夫走的党中央写了信,批评“福本主义”。

只不过在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担任教授的福本和夫,登上左翼论坛后,颇为神气活现。他炫耀留德时期获得的知识,用唯物辩证法,横扫河上肇^②和山川均。当时,福本特有的那一套说法相当流行。许多人都学福本在演说时常用的八股调“我们不仅必须怎样怎样,而且可以怎样怎样。”

山川均主张把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转变成更广泛的群众性运动,而福本则鼓吹总罢工论,“应该把局部地区的罢工推向整个地区,把一个企业的罢工推向全行业”,重视少数

①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七年在日本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潮,一度被认为是党的指导思想,后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译者

② 河上肇(1879—1946),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九一六年写的《贫乏物语》闻名世界。一九一九年创办《社会问题研究》,一九二九年和大山郁夫等创建劳农党,一九三〇年解散。一九三二年参加日本共产党,被捕释放后一直从事写作和教学活动。——译者

先锋队的作用。福本还胡乱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话，呼吁揭露天皇政权。

当时，许多共产主义者完全拜倒在“福本主义”的脚下，只有荒畑寒村等顽强地顶着。德田甚至把福本吹捧为“日本的列宁”。

因此，他对我们东方共大派把“福本主义”批判为唯心的左倾机会主义非常不满，一到莫斯科车站，就朝着去接他的我们大发脾气。

“你们在莫斯科学了些什么？”

由于渡边政之辅劝解，他总算平静下来。在同我们讨论过程中，德田、福本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当他们得知共产国际不支持福本的立场后，就完全认输了。

当时共产国际主席是布哈林。日本问题是在西欧局讨论的，并向日方提出了取代“福本主义”的新纲领（二七年纲领）；还预定由渡边政之辅当书记长，德田和福本则被排除在中委以外；并且决定“由于德田是野心家，今后不能当党的领导人”。

一天晚上，在共产国际任职的片山潜^①请日本的同志们到他住处喝酒，目的是想劝他们言归于好，但喝几杯之后，越醉气氛越紧张，德田向渡边猛烈开炮说：

“你真不是玩意儿，在日本时拜倒在福本脚下，但一到莫斯科就迅速改变主张，说大话。这算什么！”

^① 片山潜（1859—1933），日本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革命家，十月革命后信仰马列主义，一九二一年到苏联，后担任共产国际常任执委，死后骨灰放在克里姆林宫里。——译者

也许和酒醉有关，最后双方动起武来，手臂有力的渡边一下子把德田推得老远。

我说德田沉浸在“某种感慨”之中，是因为我想起一九二六年他非常狼狈，既挨了渡边一拳，又被共产国际指名不能当领导人，而现在却当了书记长，心情一定很复杂。

野坂回国前，他逞强说：“野坂不过是个调查员，算老几。”如果结合上述情况考虑，他的用意也就容易理解了。

德田是一个罕见的鼓动家。战后初期，曾在宫城前广场上搭台，召开过几次群众大会。那时，德田每次都背向二重桥^①，侧身指着宫城，狮子般地大吼大叫。几十万听众都盛赞他那无所畏惧的风度。在雄辩这点上，他是首屈一指的。（顺便提一下，我曾说过，把这个广场说成宫城前广场是可笑的，应该叫人民广场才对。）

这是德田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缺点。从和荒畑的对立中可以看到，他对自己讨厌的人恨之入骨，而且不能控制自己。领导人的这种性格也是使共产党在战后群众运动、工人运动中陷于孤立的原因之一。

德田的这种火性子和老子天下第一，通过“组活”，暴露得淋漓尽致。这里，一个可疑的家伙出场了。他就是伊藤律，象天使下凡似的，一下子被提拔为中委，并居于“组活”的中心，成为德田的帮手。

^① 从广场通向皇宫的架在护城河上的木桥。——译者

第四回 追踪伊藤律的 “阴影”而被贬职

战败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二月，召开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那时，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如下：

政治局 德田球一、志贺义雄、宫本显治、野坂参三、袴田里见、金天海。

书记处 德田(书记长)、志贺、野坂、伊藤律、黑木重德。

以上是《赤旗报》发表的名单次序。引人注目之处有两点，一是比起刚刚回国的野坂，宫本所说的“只有你和我”这两名战前的中委——我和宫本——被排挤出书记处，二是可疑人物伊藤律反而进入书记处。

伊藤不仅当了中委，而且擢升为书记处成员，从而巩固了他作为德田心腹的地位。

不言而喻，书记处是具体发指示、贯彻党的政策的执行机构。德田还进一步创设了直属书记处的“组活”，派新当选的中委长谷川浩为副部长(部长由德田兼任)。

长谷川和伊藤都说自己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五年间曾参与重建党的工作。但他们究竟搞过什么工作呢？特别是伊藤，几次出入监狱，其间还在极右的“国策公司”满铁^①调查部任过职。

^① “国策公司”是日本在战时统制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半官半民的企业形态，国家垄断资本的典型象征，目的是把重要物资的生产和配给一元化。满铁即设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南满铁路公司。——译者

战后，他遇见我时，客气得很，奉承地说什么“长期的监狱生活，一定吃苦了”，真令人讨厌。

两人共同之处是，一个在东大肄业，一个在一高^①肄业，聪明伶俐，办事能力很强。如同不破、上田兄弟^②深受宫本重用一样，他们都得到德田的宠信。

德田经长期监狱生活后，至今犹有“隔世之感”，所以更觉得他们能干。他常常信口开河地说：

“光依靠狱中释放出来的人，解决不了问题。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是狱外的人顶用。”他竟认为我们在狱中坚持多年不“转向”的党员起不了作用。这种看法太肤浅了！党是要靠久经考验的人来维护的。

总之，有人就象个高利贷者，攒了一点钱就要放债，当对方无力还债时，就逼人家偿物。与此相同，有了一定的地位后，还想继续向上爬。他们不惜把别人当作垫脚石，来讨取德田的欢心。伊藤是这样，志田重男^③也是这样。他们从大阪来东京时，肯定要带二瓶威士忌送给德田。

书记处除伊藤外，还有志贺、野坂等人。志贺摆出一副德田发言人的架势，野坂处处迎合德田。实际上党的实权操在

① 第一高等学校，战前最著名的高等学校之一。——译者

② 不破哲三(上田耕二郎)和其兄上田耕一郎。不破哲三(1930—)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一九四九年参加日共；上田耕一郎(1927—)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一九四八年参加日共。兄弟二人深受宫本重用，乘直升飞机似地破格提拔，不破现任日共第一副委员长及书记局长，上田现任日共副委员长，掌握了日共的实权。——译者

③ 志田重男(1911—)，小学毕业后做过车工，后参加工会运动。一九三一年参加日共，两次被捕入狱，在战后重建党的工作中受重用，并实际在国内主持工作。后因玩弄艺妓的丑闻揭露而被开除出党。——译者

德田、伊藤、长谷川和德田女婿西泽隆二手里。可以说是“德田家族”。

德田起初似乎把我看作他的“部下”，所以当我顶撞他时，他就发脾气说：“你别翘尾巴！”我比他小十岁，又同住在阿佐谷一套房子里。但使他形成这种看法，更重要的是战前我和他的关系。

一九二五年，我到莫斯科东方共大学习，也是根据德田和渡边政之辅指示去的，而且临行前，还向他要钱买了生平第一套西服。

后来，我还在浅草德田地下工作的隐蔽处居住过。

因为这种关系，他对我越来越凶了，仿佛我的所作所为是在反抗“长辈”；而且我又是莫斯科共产国际宣布“德田今后不能当领导人”的活证人，这也是使德田疏远我的原因。

从“特高”调查表上对伊藤律产生怀疑

但德田和我关系严重恶化，还是在我开始调查伊藤律的历史以后。

我在五大后看到一份“材料”，它保管在党纪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战前、战时，警视厅扣押了共产主义者的各种资料、图书。战后，自由法曹团^①的律师们、受迫害的党员，如酒井定吉等跑到警视厅，拿回许多东西来。其中夹着一份有关伊藤律的调查表。

我记得那是一份“口头调查表”，由“特高”官下警部提问，

^① 日本有影响的律师组织之一，长期处于日共的控制之下。——译者

伊藤作答，和纸^①上面写着毛笔字。其准确内容我已记不清楚，象是因从事非法活动而被捕的伊藤，不经考虑地谈到了同“索尔格事件”^②有关的某个妇女(北林友)。以此为起因，开战前的一九四一年，尾崎秀实和索尔格被捕，这个“赤色间谍组织”被一网打尽。

日本可能和德国一起进攻苏联——把在此设想下的日本的准备情况通报给共产国际，这就是他们的任务。

因为我当时担任党纪委员会主席，所以看到这份“材料”后就决心立即着手调查伊藤的历史，并同椎野悦朗、冈田文吉商量，不让这份“材料”扩散。

说实话，我在巢鸭监狱时，曾见过索尔格两次面，也见过尾崎秀实一次面。当时(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已经报道他们是共产国际的“赤色间谍”，但尚未判刑。

见尾崎那一次，是我因去书信室写信时同他擦肩而过。他头戴草笠，正在挨看守训斥：

“写一张明信片要花那么长时间，别人还得伺候你！”

尾崎默然无语。两年之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节那天，被判处死刑。

看到伊藤那份“自白书”后，我开始监视他的行动，而椎野悦朗却把这件事向德田透露了。德田可能认为“你竟敢把我的

① 日本纸。——译者

② 日本反动政府制造的一起镇压事件。索尔格是德国驻日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东条内阁说他是共产国际安插在外国外交机构的间谍，目的是“盗窃日本的军事情报”。一九四一年他和尾崎秀实等二十余名日本进步人士一起被捕，一九四三年五月开庭审判，一九四四年十月革命节那天处死。东条内阁企图利用这个事件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译者

得意门生打成间谍”，便在后一次中央委员会上，剥夺了我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并把我贬到地方上去，当北陆地方^①委员会主席。

我在北陆地方一直呆到一九四八年底。那时，宫本和德田也合不来，他当过《前卫》^②主编，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处境很一般。

“母亲长眠”，使我受到极大的打击

我是一九四六年九月去北陆地方前结婚的。德田和他堂兄的遗孀结婚以及西泽和这位寡妇的女儿同居后，我难于在阿佐谷住下去了，便搬到前面不远的志贺家住了一段时间，随后迁到三鹰。

那时，我现在的妻子菊枝在党本部妇女部任职。战争一结束她就来到东京，主动到党本部来要求工作，我给了她一些帮助。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她住在下北泽党本部集体宿舍，不久，就开始照料我的生活。

所谓产生感情，也仅此而已，当然我们是举行了正式婚礼的。由于经常停电，新房内点了蜡烛，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华烛之典。婚礼场地设在党本部附近的日进馆，德田、志贺、宫本等人都来参加了。财政部长龟田幸三不知从那里搞到一点酒，大家边吃干鲑鱼边干杯。

谈到个人私事，这里顺便再提一句，我十三岁失掉母亲。

① 东京西北方向面临日本海的新泻、石川、富山和福井四县为北陆地方。
——译者

② 日共机关杂志。——译者

一天早晨，陪母亲住在八户医院的二哥派人给家里（青森县上北郡下田村）送回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母亲长眠。准备担架和请两位抬担架的人。”当时我正在高小一年级念书，不懂得“长眠”这个词的含义，心想大概是一直睡下去的意思吧。但担架抬回的母亲，脸上蒙了白布，取开一看，脸色发青，冷冰冰的。这时我才知道“长眠”就是“死亡”，便嚎啕大哭起来。

母亲生前常对我说：

“里见，我一定不让任何人挪用供你上学的存款后才闭目。”

我家过去是个颇有资产的地主，但大哥日夜狂赌，性格温和的父亲未予管教，眼看这个家就破落下去了。重病缠身的母亲更是无能为力。因此，在我离开家乡时，家里已经没有什么财产，只弄到一张火车票和五元钱。大哥让我到横滨的一家贸易公司去当学徒，但我幼小的心灵深处却另有打算：

“去你的！我要刻苦学习，上东京大学，当总理大臣！”

我父亲是一九三九年我还在巢鸭监狱坐牢时去世的。

所以，我在八户已经没有留下任何家产了，对故乡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但是战后，大约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间，我从老家的下田车站下车时，还是颇有一番感慨的。亲友们会如何接待我呢，阔别二十八年的故乡又处处令人感到亲切——这两种想法交织在一起。党的地区委员会的同志们，举着“人民解放战士归来”的标语牌欢迎我，真使我感动。

我参加青森市的演讲会后，在归途中顺便转到故乡去。一个会场很快就布置起来了。村长、邮局局长、车站站长和村民们都来参加会，小学礼堂里挤满了身披草席的人。

“我是十五岁那年离开这个村子的，现在又回来了。在那段期间，报纸上把我说成是杀人犯，我还蹲过很长时间的监狱。但那次所谓查问特务事件，实际上是……。”

我讲了两个来小时，好象大家都明白了。一个男子突然从人群中跑出来，递给我一张纸条，并呜呜地哭起来了。他在小学里比我低一班，是个半哑巴。纸条上写着：“聚在这里的人都好象以十分钦佩的表情听你讲话，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过去他们都说你的坏话。”

我不能把这张纸条给听众看，拚命控制自己不要流出眼泪来。

东奔西走的北陆生活

我被任命为北陆地委负责人后，最初十来个月，在新泻、长野、富山、石川、福井等地，都无固定住处，背个帆布包，到处流浪，活象一个青年旅行家。后来有人提供了事务所，我就把窝安在直江津，在那里住了一年左右，但还是东奔西走，忙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加强党的组织。

我身体不好，党同意我携带家属同行，她的工作是指导地方党组织的筹建，去县委听取汇报，等等，遇到难题时则由我来决定。我们住过温泉，但更多的是麻烦党内同志和党的支持者。

其间，我曾几次回党本部，出席一些重要会议，但依然和德田等人处不好关系，特别在领导工人运动问题上，和德田严重对立。

简而言之，德田没有完全摆脱战前无政府主义工会运动

的影响。他的战略战术是，罢工万能，通过罢工使工人觉醒，并在工会内部建立党支部(党小组)，党通过领导这些党支部来直接推动工会。由此而产生的弊病和付出的牺牲是难于计算的。一九四七年“二·一罢工”^①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它是怎样筹划的呢？

第五回 “二·一罢工”，开始 揭穿“共产党神话”

德田曾经偶然说过：“得想法搞个总罢工。”

这次总罢工计划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举行。以国铁^②、全递^③为中心约二百六十万政府公用事业机关职员工会，加上共产党系统的产别会议^④、社会党系统的总同盟^⑤等民间工会，总共六百万工人同时发动总罢工。停顿全部交通，中断电报电话，关闭学校、邮局和市、町、村^⑥政府办公室……日本有史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事态，都要在这一天发生。

当时，共产党抓住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时机，到处呼吁：

“把经济斗争推向政治斗争，打倒反动的吉田内阁^⑦，建立民主人民政府。”

① 日本战后一次规模空前的未遂总罢工。——译者

② 国营铁路工会。——译者

③ 全国邮政工会。——译者

④ 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的简称。——译者

⑤ 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的简称。——译者

⑥ 町、村是日本县以下的地方行政机构。——译者

⑦ 自由党党魁吉田茂(1878—1967)组织的内阁，战后他曾先后五次担任首相。——译者

然而，现在回忆起来，那次“二·一罢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不打算介入的盟军总司令部，理所当然地介入了，它命令中止罢工，于是，全国总罢工一瞬间就成了泡影。罢工前夕，九点多钟，全国官公厅共同斗争委员会主席伊井弥四郎通过广播，作了《退一步，进两步》的“痛哭失败的宣言”。这次失败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那时，我作为党的北陆地委主席，为建立地方组织，每天都从新泻到敦贺去。由于正处于重要的斗争时期，其间我曾出席过几次中央的会议。党本部以德田书记长为中心，“组活”的伊藤律、长谷川浩等厕身其中，包办一切，情况很不正常。

那时，德田很容易得意忘形，而且非常自信。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群众就沸腾起来。他便抓住这一点进行煽动，党内没有人提醒他刹车。

我到东京，也跑了几个地方，总担心搞得太勉强了，但又无能为力。“二·一罢工”的主要力量是国铁，我住在交通要地直江津，那里，工人们对于积极组织斗争委员会参加罢工的气氛并不浓厚。

关于上述情况的原因以后再谈。我曾想过，即使发动了总罢工，也不可能持久，因为日本处于占领之下。一旦出现罢工可能持久的局面，并威胁到占领政策时，美军肯定要出动武装镇压，甚至使用坦克，而共产党及工会都无力进行反抗以坚持罢工。

幻想松本治一郎^①出任共和国首任总统

在谈到“二·一罢工”时，使人联想起那时广为传播的传说：共产党为了要成立“民主人民政府”，已经秘密拟定了内阁成员名单。我并不相信这种传说，至少我作为党的领导人之一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如果真象传说的那样，德田等曾考虑过首相由松本治一郎担任、外相由野坂参三担任、内相由德田球一担任、农相由伊藤律担任……，那就是一大笑柄。这里只想提一点，松本治一郎虽是社会党左派，但在共产党内也素负盛名。他主张同共产党一起搞联合斗争，我们也认为“他在社会党内起了良好作用”。因此，在此两年之后，即一九四九年，当共产党在众议院一举取得三十五个议席和德田等人鼓吹“九月革命”时，曾经议论过，如果成立共和政权，首任总统可由松本治一郎……。

但在“二·一罢工”时，并不存在建立人民政府的可能性。那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下面的问题上：是盟军总司令部让步呢，还是我们退却呢。所以当听到伊井弥四郎广播讲话时，就陷入那种难于形容的情绪中：“不幸！我们退却了。”

但我认为，这次失败并非偶然。因为德田及其左右手对工人运动实行了错误的领导，我和德田之间最尖锐的意见分歧也正在于此。

也许有人觉得奇怪，日本初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相当

^① 松本治一郎(1887—1969)，长期从事处于贱民地位的部落民的解放运动，战后参加社会党并当选为参议员，任参议院第一任副议长。松本对我友好，一九五三年被推选为日中友好协会第一任会长。——译者

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明治^①末年“大逆事件”^②的幸德秋水^③是这样，同他有过交往的荒畑寒村本来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德田以及其他知名的社会主义者，多少都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当时容易搞到手的书籍，大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我最初读的就是大杉荣写的小册子。

俄国革命冲击了这股无政府主义思潮。

一九一七年，邻邦俄国这个大国的革命成功了，其领袖是共产主义者列宁。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性事件。于是，就发生了要布尔什维克，还是要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争论结果，无政府主义成为少数并孤立了。

但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残余还存在。他们发动罢工，破坏工厂机器，殴打资方人员，闹得不亦乐乎，从而不少人被关进监狱。

这种无政府主义工人运动的影响，在“坐过几年监狱”的战后共产党领导人中，还没有完全消除，德田球一就是其中之一。他常说要发动罢工，并认为关键在于能否发动起来。对于成败如何，工人要求罢工的程度是否迫切等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则是次要问题。他似乎认为，通过罢工斗争，工人就能革命化。

① 明治是日本天皇睦仁在位时期的年号(1868--1912)。——译者

② 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事件。天皇政府以阴谋刺杀明治天皇的罪名，即大逆罪逮捕了几百人，最后处死了幸德秋水等十二人。所以又称“幸德秋水事件”。——译者

③ 幸德秋水(1871—1911)，记者，先信仰社会主义，后成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日俄战争，组织平民社，创办平民新闻。——译者

党操纵工会，群众往哪儿走

党的另一个严重缺陷是，党的领导直接搬进工会组织并发号施令。这是一种双重性的错误。

不言而喻，工会是工人群众的组织，应该从群众中选举领导人，并根据多数工人群众的愿望开展工作。工会执行机构内部的党组，也只能根据这个原则行事。但在工会领导作出决定之前，却把党的方针强加于工会，自然很快就会失掉群众的支持。

例如，即使罢工斗争失败了，但如果罢工是根据多数工人群众的愿望进行的，工人们就觉得自己已经全力以赴，没有什么可后悔的；相反，如果罢工是受党小组煽动、鼓动、操纵的，工人们就会议论还不是失败了，还不是被解雇了；于是，工人群众就会离开党和党员领导的工会。资方也会乘机进行分裂活动，为产生第二工会创造了条件。

战败初期，共产党一面重建组织，一面优先抓建立工会的工作。由于当时工人尚处于无组织状态，所以这样做是正确的。那时，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者常常利用午餐休息时间，来到工厂食堂，等工人吃完饭后，就站在长椅子上号召建立工会，而且几乎都受到热烈欢迎。那时，只要说声“共产党员”，工厂门房的警卫人员就会举手敬礼，说声“请”。

所以，工会就这样陆续建立起来了，其结果是许多共产党员进了工会执行机构。诚然，如果这些执行机构能通过工会会员的充分讨论来决定斗争目标和方法，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大都是由党操纵，而且采用了党本部直接指示

这些党小组的形式。

说它双重错误，是因为这种形式不但会轻视会员群众的意愿，而且还使那里的党支部形同虚设，让工会执行机构中的党小组越过党支部，直接同党本部联系，这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党进行直接领导的参谋本部就是每星期三在代代木本部举行的“星期三会”，我也曾出席过。一到星期三，产别会议及各行业工会的党员领导人就来到党本部二楼的大会议室。其中有国铁的铃木市藏、伊井弥四郎，全递的高原晋一、电产^①的竹内七郎、产别会议的听涛克巳、龟田东伍等，他们围着德田一起研究战术。

这次是否从电产下手，先使信浓川发电厂停工？关闭电闸，把水放掉，停止发电。以此为信号，继而火车停开，工厂罢工……，但常常把工厂的情况、工人群众的意愿置诸脑后。

党也常常把政治局、书记处撇在一边，只有德田、伊藤、长谷川和二、三名“组活”成员出席会议，并作出决定。

德田内心可能洋洋得意，认为工会是由他推动的，但这个方针是错误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被工会内部的反共势力利用来搞分裂活动，“二·一罢工”后，在资方支持下，成立了“民主化同盟”^②。

麦克阿瑟发出中止“二·一罢工”的命令后，德田等人慌慌张张地赶到现场，把罢工停下来。如果这次罢工是自下而上酝酿发动的，就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被麦克阿瑟压下去。

① 日本电器产业工会的简称。——译者

② 简称“民同”，是反对日共的势力组织的工会。——译者

盟军总司令部一定是这样分析形势的：共产党的德田在拚命煽动，太不自量力了，只要命令一出，就能毫无阻力地予以制止。

德田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一般来说，共产党干部中，大都有一种唯我正确的宗派主义情绪，而这种自以为是的毛病常常恶化党群关系。

从外面操纵工会这个缺点，虽经过“二·一罢工”的惨痛教训，但也没有什么改进。在许多工会斗争中，依旧强行煽动，从而使大量的基层党员和积极分子被开除、起诉和吃官司……。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产别会议系统的团体会员工会中，社会党系统的活动分子，即所谓“民同”进行的分裂活动是正确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幕后都有资方或资方代理人，甚至盟军总司令部。

温和的路线——党本部嘉奖

“跳舞的共产党”

然而，颇有意思的是，德田等人一面煽动罢工，一面却鼓励唱歌、跳舞。在这个领域里，德田的女婿、中委西泽隆二（《青年们，锻练好身体》一歌的作词者）曾经大显身手。

“二·一罢工”前，西泽一本正经地说，共产党人、包括出狱者在内，太呆板了，必须更加温和地接触群众，于是，动员工会青年部和年轻党员，在党本部等地举办舞会。德田说：“我不会跳西洋舞，但会跳家乡冲绳民间舞。”他表演了琉球舞蹈。查阅一下当时的《赤旗报》等，可以见到他跳华尔兹或其他什

么舞的照片。德田出席的那次舞会就是在临近“二·一罢工”的一月二十五日举行的。

党本部鼓励舞会一事不久就在地方党员、特别在共青团盟中传开了，人们对此加以冷嘲热讽，说党是“跳舞的共产党”。一些青年男女党员的道德观念也曾出过问题。我和宫本都看不惯这种现象。

这么一说，仿佛我和宫本处得很融洽。其实不然，我们两人既不情投意合，观点也常常相左。对宫本夫人宫本百合子的评价，我也持怀疑态度。在这点上，宁可说我更接近德田。

我认为百合子和小林多喜二^①不同，百合子缺乏群众生活的基础。德田更从感情上厌恶她，事事贬低她。德田说：“那种小说，一读两、三行就令人头痛。”

一九四九年，宫本被解除了《前卫》主编的职务，德田、西泽等人对百合子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这种感情对立，也是导致一九五〇年分裂的因素之一。当然，那样不幸的大分裂不是一、两个原因造成的。尽管如此，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日共的批评，来得太突然了。

第六回 一九五〇年分裂后， 终于逃离日本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评，都

^① 小林多喜二(1903—1933)，日本著名无产阶级作家，小樽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从事创作活动，初期作品有人道主义倾向，后投身革命斗争，成为最有成就的无产阶级代表作家之一。作品有《蟹工船》、《党生活者》、《不在地主》等。一九三三年在狱中遇害。——译者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首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个名词，逐渐从人们的语汇中消逝了。

战前有过一个叫做共产国际的国际组织。它是列宁一九一九年创建的，曾被译成共产主义国际和国际共产党，以革命胜利不久的苏联为核心，曾发挥过坚强的领导作用。

共产国际在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宣布解散。战后不久，在一九四七年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的情报联络机构，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其主要任务虽说是“交流经验”、“协调工作”，实际上幕后由斯大林控制，这是为了确认他的国际性领导权。

情报局最初的“权威性表现”，是批判南斯拉夫铁托总统。一九四九年，把不服斯大林的南斯拉夫，作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现在很难想象，当时对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斯大林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形象。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赤旗报》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时，在头版头条位置用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平政策的伟大旗手”这类赞词。现在读起来，真有点肉麻。

依仗斯大林权威的情报局在一九五〇年一月突然指名批评野坂，攻击他的“和平理论是错误的”。党受到极大的震动，就象被捅了马蜂窝似的。最早从布加勒斯特（情报局所在地）传来这一消息时，大家都认定它是“为了搞乱党而散布的谣言”，不予置理。

对这种越顶批评，我也感到不愉快，但反应最强烈的不是野坂，而是书记长德田。他大声叫嚷说：

“肯定是谣言，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即使日本党犯了错误，也可以采取别的传达方式嘛！给人当头一棒，这算什么？不允许越过我去批评野坂。”

最初，不仅不深入研究批评的内容，而且在感情上产生了强烈反感。

志贺这个时期的动向是令人费解的，他经常出入于苏联驻日本代表团的大门，并且不断地放出风声：“不久就要来啦，就要来啦。”所谓“来啦”就是“批评来啦”的意思，但至今我也不了解他当时究竟知道多少。

最初的激动过去了，当得悉果真是批评后，我们又对批评的尖锐性感到惊讶。

否定占领下能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

题为《关于日本的形势》的批评，刊登在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上。文章一开始谴责美帝国主义把占领下的日本变成反苏、反民主化运动的“军事冒险的主要基地”，接着就把矛头指向野坂。

“例如，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野坂在分析日本国外国内政治形势时，曾力图证明，战后的日本具备着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一切必要条件，即使处在占领制度的条件之下；他还进而硬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本化’。

“至于占领军，野坂认为这种军队对于日本共产党的目的绝无妨碍，相反，在它执行其使命时，有利于日本的民主化。

“野坂的‘理论’是美化帝国主义对日本占领的理论，为美帝国主义吹嘘的理论，因而也是欺骗人民群众的理论。可以

看到,野坂的‘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形式上是批评野坂个人,但目的显然在于抨击日本党的战后路线。

如何对待这个权威的“国际批评”呢?德田、野坂、伊藤等人发表的政治局声明《所感》中说:

“野坂理论的缺陷已在实践中得到克服,不为友党着想的批评是难于接受的。”

我和宫本等则主张“国际团结的必要性”。所谓“所感派”和“国际派”这个词,也是由此产生的。这种分类大体是正确的。当然,对情报局批评的反应,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

被说成是“国际派”的我、宫本、春日庄次郎、志贺、神山、龟山、藏原等七名中委,观点很不一致,此后的行动也是各不相同的。首先在我思想中,就没有意识到“国际派”这一派别。和病魔缠身有关,我只出席过他们的两次会议。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出狱只不过四、五年,有关国际形势的知识也很贫乏。但真正的原因在于没有理论领导人,而且我们自己也并未对路线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

关于通过议会来进行的和平革命论,在最后关键时刻该怎么办这一点,没有统一的见解。前一年,德田鼓吹过“九月革命论”,那是因为一月大选中取得了三十五席,乃使他产生了这种幻想。然而,当时麦克阿瑟司令部还在,反动的吉田内阁还很有力量,国民意识也不能说非常民主化了。

在共产党要夺取政权时,反动势力会不会束手待毙?何况因为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还在。和平革命在关键时刻准会翻

船。看一下禁止“二·一罢工”命令的例子，是应该懂得这一点的。

干部对革命路线的认识在思想上并不统一，下列情况就是明证：在情报局批评后，党决定各人谈谈自己的意见。中央委员们发表的观点真是千差万别，从认识当前的革命性质和国际形势到评价土地改革^①，等等，都是各有一套。因此，理应借此机会进行充分讨论，并在这个基础上就斗争路线提出一个方向。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以主流派自居的“所感派”却片面地排挤起少数派“国际派”来了。

秘密传阅的《志贺意见书》

情报局批评后，中国共产党一月十七日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

“在革命斗争中，议会只能作为辅助的手段。对野坂的错误，必须作出坦率的自我批评。”

到此，德田等人也顶不住了，只好全面接受情报局的批评，但并未停止对“国际派”的排挤。首当其冲的是宫本显治，一月底解除了他党纪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派他去当九州地方委员会主席。

我当时担任“松川事件”^②的特别辩护律师，经常要到福岛去办事，临时居住的地方总是在一家理发店的二楼，有时一呆就是十来天。一天，福島县委的同志送来《志贺意见书》，并

^① 美国占领军在日本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土地改革。——译者

^② 一九四九年八月，松川车站发生列车翻车事件，日本警察当局断定是日共党员反对解雇而搞的破坏活动，并逮捕了有关人员。经过日共和日本人民多年斗争，一九六七年日本最高裁判所宣布全体人员无罪。——译者

问我如何处理。阅读之余，不禁使我吃了一惊。

所谓《志贺意见书》，就是志贺在情报局批评之后，于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为批评“所感派”而写的文章。当时他又撤回了这篇文章。如果这个非正式文件秘密散发，就可能被视作派别活动，以致成为开除的对象。不行！我匆忙赶回东京去。发现东京附近也已广为散发。主流派正在议论关于开除志贺和被认为同志贺一鼻孔出气的宫本的问题。我立即到宫本家里，对他说：

“志贺真不象话。在不搞派别活动这点上我们要统一意见。”

宫本表示同意。于是，我们两人便到志贺家去。志贺对我们的严厉批评作如下辩解：“那是野田弥三郎瞒着我散发的。”不知道真相到底如何！这件事在主流派（“所感派”）和非主流派（“国际派”）之间留下了疙瘩。

就在这种对立的不愉快气氛下，麦克阿瑟发布了解除共产党干部公职的命令^①。事情发生在六月六日，理由是“共产党轻视法律和秩序，企图用欺骗和煽动制造社会混乱。”虽然还没有完全宣布共产党非法，但二十四名中委都不得担任国会议员、政府机构的官员等公职，不得从事政治活动。

而且，当时德田等人犯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他们没有同对他们持批判态度的七名中委商量过，就自作主张，转入地下，并专横地成立了进行公开活动的组织“临时中央指导部”

^① 一九五〇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前夕，为巩固日本这个后方基地，同时为了遏制中国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影响，驻日美军司令部撕破“民主”假面具而采取的一个反动措施。——译者

(临中)，其成员大都是看德田眼色办事的人，即椎野悦朗(书记)、轮田一造、杉本文雄、多田留治、铃木市藏、听涛克巳、河田贤治、谷口善太郎。结果，党的干部被一分为三：潜入地下的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伊藤律、志田重男、西泽隆二等人组成的秘密组织，在这个组织领导下公开活动的“临中”，以及我们七名挨整的中委。好不容易才达成的“不搞派别活动”的协议，也被德田等人一脚踢开了。

重病准备偷渡中国

分裂之后，主流派极力压制反主流派，甚至基层党员也受株连，对他们横加咒骂、盯梢、排挤、查问、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和直到开除出党，等等；从而使党陷入了无可救药的对立状态。

“六·六”解除公职前，我在福岛因感冒而患肺炎，一度呈稳定的结核病又再次恶化，肺部出现直径二公分的空洞。于是，我卧病不起，生活凄惨。但他们竟用停发工资来惩罚我。

那时，我每月从本部领取五千七百日元干部工资。当我妻子去取工资时，“临中”的椎野悦朗、河田贤治竟声称：“没那么便宜！”

我妻子反驳说：“什么叫便宜？袴田是中委，而且卧病在床，你们竟停发工资。这算什么？”但毫无结果。同时，共产党系统的代代木医院也宣布不给我治病。我的“松川事件”特别辩护律师的职务也被他们解除了，他们甚至还用明信片通知我，说什么“本部将取消你的党籍”。对我这个重病在身的人，他们就这样不顾道义往死里整。

遗憾的是，中国党在九月三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表示支持德田主流派的党中央，强调反对派也必须团结在它的周围。和苏联党一样，中国党也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们从这个呼吁中受到很大震动，“国际派”建立的“全国统一委员会”不得不宣告解散。

十月，我迁到山形县外甥家去养病。在此前后，“国际派”干部曾在浅草聚会，我大约出席过两次。与会者还有宫本显治、龟田幸三、春日庄次郎，不记得是否包括神山茂夫。志贺这时已和我们分道扬镳了。

会议没有固定的主席，只是互相交换情况。首先成为话题的是：

“德田、野坂等人好象已经到中国去了。”

“看来他们准备开始武装斗争了。”

但是我们的立场并未得到中苏的谅解，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应该派代表到中国去，充分说明我们的观点和德田主流派如何任意整人。大家都同意这样做。

我的结核病虽然日趋恶化，但环顾四周，没有能去中国的人选。我战前曾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过学，搞国际活动也较内行，所以便主动表示愿意去。我心想，这种健康情况留在日本也无济于事。万一出现不幸事故，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这样，一九五〇年初，我就准备摆脱警察监视，秘密离开日本。当时，和约^①尚未缔结，朝鲜半岛一片火海，战争越打越烈。

^① 指对日旧金山和约。——译者

只能靠偷渡去中国。为了化装，我首先刮光了自己特有的胡子。

第七回 偷渡中国，险些出事

“德田、野坂等人好象已经秘密前往中国，我们也得派代表去。”

我们这派有宫本显治、春日庄次郎、龟田幸三和我，不记得是否还有神山茂夫。这些受德田等人排挤的中委(国际派)一九五〇年秋在浅草聚会，决定派我去中国。但怎样去，走什么路线，这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

日本处于占领之下，当然尚未和中国恢复邦交。不，即使有了外交关系，外务省也不会给我这个正受解除公职处分的人颁发护照。相反，公安部门一直在注意我的行动，担心我是否转入地下。

朝鲜战争出现了新的局面，突然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压倒了麦克阿瑟统率的联合国军。可以说，日本及日本近海的政治形势都处于激烈动荡中。

那时，主流派(“所感派”)德田等人已经组织了“人民舰队”。说它是“舰队”，太言过其实了。他们搞到几艘不到二十吨的渔船，开进了小渔港，准备趁黑夜偷渡中国。

他们和我们“国际派”不同，中苏都承认他们是“党中央”，只要偷渡工作准备就绪，就可上海一带上岸，此后听从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便行了。德田、野坂、西泽都是一九五〇年秋天，用这种办法离开日本的。

与此相反，我们被视作“分裂派”或“反对派”，和中国党之间没有联系的渠道。因此，我偷渡中国，也无法事先通知对方，只能设法到了中国以后再说。

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六·六解除公职前一直担任党的财政部长的龟田幸三，为我秘密找船离开日本。办法是通过神户的华侨的协助先去香港。听说当时为此花了十万日元。

临近离开日本前，我必须首先瞒过公安人员的眼睛。那时，便衣每周都要来我家好几次，确认我的去向。他们在门口问：

“袴田先生在家吗？”当时我在世田谷区豪德寺安了家，因肺结核病，便住在家里。

我的妻子便出去回答说：“在里屋躺着呢。”

“夫人，是真的吗？”

我的妻子也常常这样回答他们：

“那么不放心，就请进屋瞧瞧吧。不过他性子急，说不定会朝你们扔夜壶。”

解除公职的人禁止从事政治活动，但只要所在清楚就可以了。即使法务省特别审查局命令到该局报到，只要照办，也不会有什么問題。我们不打算转入地下，所以几乎每次都去报到。该局对转入地下的德田派九名干部，以不去报到为理由，发出了逮捕令。

当然，在公安当局看来，“国际派”干部也不知什么时候会转入地下，所以不能放松监视。

用胡编的中国话蒙混过关，安全上船

记得为了从神户上船，我是十二月一日离开家的。那天

黄昏，天色渐暗，我们夫妇两人佯作上街买东西，走出家门。先拐进涉谷的中国饭馆吃饭，一面吃一面从包袱内取出呢礼帽戴上，然后穿上大衣，取下近视眼镜。接着就去理发店把头发剪成短平头，刮光胡子。胡子就象我的标记似的，战争结束那年的年初，我对监狱理发员说：“今年我要出狱，一定不要把胡子刮掉。”尽管看守不同意，我也坚持没有让步。

刮光值得纪念的胡子后，我们故意拐过丸善、高岛屋^①，并去书摊上买了几本下流杂志，最后还请人擦了擦皮鞋。这一切都是为了瞒过可能跟踪我的便衣。

八点零几分的快车即将开车前，我们赶到东京站，我和我的妻子并排穿过地道。在我的妻子看来，可能这是今生最后一次离别。我发现，离开车时间越近，她越发难过。

我边走边说：

“就在地道分手吧。你不要上阶梯了，直接往前走，也不要回头看。我沿着阶梯上去后速即上车。当心盯梢的！”

只听见她回答一声：“是”。后来我知道，我的妻子说完“是”后便往前走了，但走了一段路后实在不忍心，又转身急忙上了阶梯，但是，这时火车已经开行了。

我手中只有到大船的车票，事先说好从大船到神户的车票由负责保卫兼联络的小岛功（前宫本秘书，现政治局委员）在车上交给我。行李很简单，就是一些盥洗用具。

我记得第二天清晨在神户附近东海道线的一个车站下车后，就前往党的财政部一个工作人员家里等船，住了三个晚上。后来又被带到山手六甲山附近的屋敷町一个华侨家里，

^① 均东京的大百货公司。——译者

预定和我一起去中国的翻译兼向导秋山良照也是在那儿碰头的。战争结束前，他曾和野坂在延安从事反战活动。

我不清楚这个华侨是否和党有关系，还是单纯的掙客。我们在他家商定：第二天早晨，一艘九千吨的英国货船进神户港，一装完货就开往香港，所以这天夜里得设法上船。和船上司务长已经谈妥，十点左右中国船员上岸喝酒，等他们回船时，准时插进他们这群人中，就可以骗过海关上船，而且船员们也一定会帮忙。中国人和日本人长相酷似，只要不出岔子，就不会被识破。

——这就是那个华侨教给我们的“上船战术”。

俗话说，知难行易，开始非常顺利地混过了海关，夹在船员当中，一下子就通过了狭窄的海关通道。同他们一样把手一举，表示我们是刚从这里通过的。

问题却发生在这之后。从码头到船舷，挂着细长的舷梯，人们只能排成一行，挨个上去，梯子上面的两侧站着两个海关人员。

这时，切忌胆怯，只要若无其事又不引人注目，一下就能溜过去。战前我搞过地下工作，所以心中不会太紧张。

我和秋山爬着梯子往上走，但从甲板到走廊时，迎面来了一个海关人员。我们擦肩而过时，他显得有点愕然，我也吓了一跳。我低声对秋山说：

“不要回头去看！”

我们走进厕所，接着又迅速走进事先约好的那位司务长的舱房。他这间西式的舱房靠近甲板，有六张日本席子那么大，里面有把椅子。我不会讲中国话，只能同他握手致意。就

在这时，有人敲门。

司务长一打开房门，刚才那个海关人员便把脑袋伸了进来，并朝着我们问道：

“你们会说日本话吗？”

我们装作完全听不懂，他又用英语问：

“你们会说英语吧？”

我们只能仍旧装作不懂，但光是这样不行，于是，我们便用听来象中国某种方言的腔调和司务长乱扯起来。也许司务长感到危险，设法把那个海关人员请出舱房。不知道他们在房外说了些什么。不久，司务长回来说，“不用担心了”。他还耸肩笑了一笑。

战前偷渡，必须混过鸭绿江海关的关口

九千吨的英国货船，预定第二天中午启航。早晨起床后到中午这段时间实在太长了。船离开神户港时，如果稍微夸张地说，我感到自己好容易才摆脱了绝境。

船穿过濑户内海，沿丰后水道南航。我在感到船身微微地摇晃的同时，回忆起战前逃离日本的种种情景。那时偷渡并不那么困难。

党在战前和战时的活动完全是非法的。党员一旦被识破，就会被捕，但只要躲过敌人眼睛，乘普通客船就可以去中国。那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地位，既不要护照，也不用签证。

我一九二五年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学时，就是从门司乘船到上海的，再从上海乘苏联租用的荷兰货船去海参崴，然后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直达莫斯科。

共产主义者去莫斯科，大都走这条道，问题是回程。虽然可以按原路线走，但多数人都越过苏联—满洲边界，再过鸭绿江，经朝鲜半岛返日。

走这条“满洲路线”的最大难关，是从满洲（现中国的东北地区）过鸭绿江进入朝鲜那一段。鸭绿江满洲这边的安东^①和朝鲜那边的新义州，都有日本“特高”，检查非常严格，对每个人都详细盘问。

你是哪里人？为什么去满洲？住在哪里？现在去何处？门牌号码多少？

回答这些连珠炮似的问题时，稍有迟疑就会出事。当时我是这样回答的：

“原籍北海道钏路，父亲在札幌开酒馆，所以我也进了札幌农科大学预科班，也就是说，我现在还是学生，这次预科班的森教授带……。”

不言而喻，这是事先编好的台词，回答很流畅，其中有些他们并未问到。此外，行李中放一些法国香水之类的东西，也可以转移“特高”的视线。

和我一起从奉天^②乘安奉线火车到达安东的中川诚一同志，在“特高”追问下露出了破绽，就被抓走了。

“噢，你是从长春叔叔家回日本，那么你叔父住在长春哪条街上？”

中川在这里卡住了，一打奔儿就乱了套。“特高”突然提高嗓门吼叫：

① 五十年代改称丹东。——译者

② 即沈阳市。——译者

“鸭绿江不是你们这些赤色分子随便能混过去的！真他妈的！”

我站在一边听着，心中忐忑不安，但又无能为力。

一过铁桥就听到解放军军歌

言归正传。我乘坐的船一离开神户港，约十二月十日前后，有位同志给东京我的妻子打了暗号电话。

“是夫人吗？我是西服店，西服已经做好了。”我的妻子接到电话后，知道我已经平安上船。但后来听说，我走后她的日子很不好过。

公安人员照例常来询问：

“袴田先生真的在里屋躺着吗？”有一次甚至企图闯进房内，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打发走。但到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宫本百合子逝世前后，已经知道隐瞒不住了。殡葬第二天，公安人员就来打听：

“真奇怪，百合子女士逝世，先生也不去烧香。他身体难道这么坏？”

我的妻子估计船已远离日本，便下决心回答说：“他有事去广岛接外甥了……。”

“那他不在家？真的不在家？”说着便飞奔而去。当然我此时并不在广岛。他们分析我已经潜入地下，便发出了逮捕令。

这时，我已到达香港，由住在香港的台湾籍人带着我，从九龙乘火车来到新中国边境附近的罗湖。举目望去，前面是一个广场，三、四十米远处有一坐铁桥，桥侧站着一排中国警

察。带路的台湾人说,你就一直过桥去吧。

我们事先没有和中国党联系,所以拿不出任何证件。但过桥未遭阻拦,来到深圳,深感松了一口气。这时从高音喇叭中传来了人民解放军军歌,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共产主义的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还不满一年两个月。

我和秋山当即走到象是深圳驻军办公室的地方去说明情况:

“我是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局书记袴田。现在日本党分裂为两部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希望得到中国党中央的同志的帮助。书记长德田球一等人已经去北京了。听说叶剑英同志在广州,希望首先能够见到他。请你和北京联系。”

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明白了,但就是迟迟不给答复。这时,我们被安排到一所象营房一样的宿舍里,等了五天(或一周)。后来,来了一位黑黝黝的长相很象侠客的男子。

第八回 出席斯大林主持的决定命运的会议,被迫接受“武装斗争”纲领

对中国来说,我和秋山都是“不速之客”、“闯进家门的客人”。其理由之一是,我们未打招呼就直接来到;但更大的原因在于受德田等人排挤的“国际派”,被中苏这些“国际权威”看作“派别活动”。

中国党的负责人和斯大林虽然当我的面注意不用“分裂派”这个词,只说“反对派”,但无疑他们不承认我是“党中央”的代表。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主张“必须以国际团结”来对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批评的我们不承认；而抗拒批评、并策划分裂的主流派（“所感派”）却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了承认。

话虽如此，但中国党也没有无视我这个吃尽苦头来到这里的偷渡者。在新中国边境城市深圳等了五天（或一周）以后，出现一个黑黝黝的侠客式男人。我估计他是公安机关的人。他很少说话，只是领着我们走。我们听他的安排，从深圳乘火车到达广州。

在广州又等了两、三天（住在一家相当高级的旅馆里），才通知我们去北京。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达北京，所以我估计乘坐京广线列车是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后。

被称为“红军三骑士”之一的名将叶剑英，当时在广东兼任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广州市长，但最终未能见到他。北上途中在武汉停留一个晚上，绰号“独眼龙”的刘伯承将军（当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设晚宴招待我们。

理应当翻译的秋山的中国话讲不好，所以未能充分交谈。我记得我曾站起来祝酒说：

“我是好不容易来到武汉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满意。感谢你们的好意。”那时，中国党解放全中国不久，在党的干部的周围，充满着热烈的气氛。

列车越过黄河，经过保定，向首都北京进发。城镇到处都贴着“抗美援朝”的大标语，但从车窗向外眺望，可有些扫兴，山上树木很少，只感到仿佛在原野上奔驰。也许是叶剑英的好意，车上伙食很丰盛。

在中国吃饭，一般都把吃剩的东西，如鸡骨头等都放在桌

布上，饭后收拾完碗筷，就用桌布兜起来倒掉。吃饭给无聊的旅行生活多少带来一些乐趣。

中苏两党期待我们有所作为

我到达北京后，同中共中央联络的窗口，是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和副部长李初梨。王稼祥和我一样，也曾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过学，是中国的首任驻苏大使，中央委员，由于解放战争期间中弹负伤，所以常常患病。李初梨在日本留过学，会讲日语，他帮了我不少忙。我就是通过他们，把自己的意见转告中共中央的。

那时，德田、野坂、西泽等人已经到达北京，但我并不想去见他们。说实话，连看见他们也感到别扭。他们本来就把我看作“分裂派”，所以大概也不打算看我。

我的身体情况依然如故，到北京后吐过一次血。王稼祥担心地劝我到北京医院去看病，那是一所党的干部看病的医院。此后我就成了那里的常客。

东走走，西跑跑，我在北京已经过了四月中旬。在这段时间，日本的派别斗争日趋激化。二月，主流派玩弄诡计，召开第四次全国协议会，决定了军事方针，还通过了“反对分裂主义者斗争的决议”。这里所说的“分裂主义者”，就是指对德田主流派持批判态度的“国际派”党员。

四月地方选举时，主流派、反主流派各自推荐候选人，表明党处于名符其实的分裂状态。如在东京都知事选举中，“临中”推荐社会党人加藤勘十，“国际派”则抬出哲学家出隆。

北京可以听到日本广播，王稼祥等也多少告诉我一些日

本形势，但对党的这种分裂抗争，知道得并不详尽，都是回国后才得悉的。一九五〇年分裂后的日共组织分成好几层，一般群众也很难理解。德田主流派就有三个领导机构：

海外组织(北京)——德田、野坂、西泽等人。

国内地下组织——伊藤、志田、绀野与次郎、春日正一、长谷川浩等人。

国内公开组织(临中)——椎野悦朗、多田留治、铃木市藏、听涛克巳、河田贤治、轮田一造、杉本文雄等人。

与此相对抗，反主流派也有各种名堂。不论怎样，共产党是重视铁的纪律的，如果党成为一盘散沙，就会抵消了力量。中苏两党最担心这一点。

同日趋激烈的朝鲜战争这一国际形势联系起来考虑，这种担心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战局一直在三八线附近拉锯。四月，杜鲁门总统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由李奇微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这时，美国轰炸机以日本为基地，轰炸北朝鲜，并从日本或通过日本补给战争物资。因此，派出志愿军赴朝鲜参战的中国，不用说希望日本党能在背后有所作为，就是苏联也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它们期待日本党破坏基地、军需工厂等，是同德田主流派的军事方针及武装斗争有联系的。

我是反对武装斗争的，并把这一点告诉了中国党。

从北京乘专列去莫斯科

王稼祥有一次对我说：

“日本党的分裂和路线斗争事关重大，不能在北京作出决定。可能要到莫斯科，让斯大林同志最后解决。”

对此，我也已经略有所感。四月中旬，正式决定去莫斯科。这时，王稼祥来我住处轻声问我：“袴田同志，去莫斯科时，可以和德田同志等人坐一节车厢吗？”

我表示：“不行，看见他们就叫人生气，搞不好在火车上就会闹翻的。”

也许担心我们闹翻后不好收拾，专列多挂了一节车厢。德田、野坂和西泽坐一节，王稼祥、李初梨和我在另一节，此外就是中国保卫人员的车厢和物品车厢。专列共四、五节车厢。

车厢非常豪华，一半是会客室兼餐室，周围摆着食品和饮料，中央是一张铺着桌布的桌子。另一半是寝室，有十个小房间。

记得路上走了九天，其间只和德田等人打过一次照面。专列到达边境城市满洲里后，中国保卫人员换成了苏联保卫人员，苏共中央国际部派一位副部长来接我们。在这里，主要的客人（我和德田等人）和中苏两党的干部一齐吃饭，但我和德田等人连招呼也不打。

离开北京时，我对中国党说：

“希望你们告诉宫本显治也来参加，到北京后请立即安排他乘飞机赶到莫斯科。”但宫本最终没有来，不知中国党是否传了话。

在莫斯科，我们住在中央电报局附近的大楼里，离红场很近，面向高尔基大街。王稼祥住五楼，我住三楼。我住的房子不是单间的，而是五间一套的。一名厨师、一名保姆、外加国

家保安部的一名警卫和一名服务员，共四个人专门伺候我。

不知道是不是斯大林的方针，那时对兄弟党的客人，接待工作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还经常去医院治病，并到大剧院欣赏芭蕾舞。一次，我表示想看电影，他们就拿来一张电影节目单让我挑选，又把影片拿到我房间里放映。

不知道德田等人住在哪里，受到什么样的接待。在莫斯科，我们也毫无接触。

为了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我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交给苏共中央。我强调了以下三点：

一、对武装斗争的批评。听说日共主流派已经开始准备武装斗争，如果这是事实，就将给日共造成严重的局面。美军在日本驻扎着，而且日本也建立了警察预备队，他们的力量足以镇压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特别是美军，既然他们正把日本作为基地发动朝鲜战争，就一定会设法排除各种障碍。在这种形势下开始武装斗争，将会犯一个大错误。

二、关于德田鼓吹的“地区人民斗争”的错误。日本的中央地区受到麦克阿瑟和反动势力的控制，党的力量很小，因此必须在他们政权比较薄弱的地方组织斗争，壮大力量，夹攻中央。这就是“二·一罢工”失败后德田开始提出的“地区人民斗争”战术。它显然受到中国人民战争理论的影响，但日本不是中国。和中国不同，日本城乡差别不大，农村附近就是城市，城市之间就是农村，交通和通讯也非常发达。因此，组织农民包围城市这种后进国家的战术是行不通的。如果重视这种战术，势必要出现极左的危险。日本的革命状况并不处于这一阶段。

三、关于对农村情况认识不足。德田及伊藤律等人在土地改革实施三、四年后的今天，依然认为农村还继续由地主统治，还保留着半封建的阶级关系。他们认为，农民依然处于“出卖马匹、出卖儿女、出卖耕作权、乃至深夜外逃”的境地（一九五〇年德田纲领）。

这种描述企图说明农村等于战前、战时一样，依然是地主和佃农关系占统治地位。然而，实际上土地改革后已经出现了许多自耕农。农民依靠外出打短工等，现金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德田等人这一认识上的错误，后来导致派“山村工作队”这种脱离实际的极左错误。

上述三方面是我批评主流派方针的论文要点，它译成了俄文，苏共有关人员也是看过的，底稿至今保存在苏联。

但是，我的这些批评并没有被采纳。

强迫我表态：同意或拒绝

在莫斯科呆了近四个月。一九五一年八月初，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突然来到我的住处，这个人我过去从未见过，他猛地取出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

“袴田同志，希望你表明是否接受这个文件。”他说：“如果接受，那我们就一起去见斯大林。”和以往不同，态度完全是强迫命令式的。翻开文件一看，就是后来的《五一年纲领》（《日本共产党当前的要求——新纲领》）。

我的观点已向苏共提出了，这个副部长当然也是知道的，但他却根本不予置理。而且这个文件连手续也不完备，即没有让我和德田等人一起讨论后再作决定，只是苏联党单方面

和德田等人以及中国党商量后写成的。

在这里，我也是一个“不速之客”，也许他们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听取我这个“派别代表”的意见。对副部长那种不容别人分辩的高压态度，我感到非常不快。

这份《五一年纲领》中，下面一段话是阐明武装斗争的“战略方针”的：

“认为新的民族解放民主政府不会受到阻挠，依靠和平手段就能建立起来；或者认为反动的吉田政府在让位给民主政府时不会进行抵抗，而会主动交权，都是极端错误的。

“……相反，吉田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使美国占领得以继续下去，同时为了使国民永远处于奴隶状态，一定会竭尽全力进行挣扎。”

又说：“以为依靠和平手段就可以实现日本的解放与民主变革的认识，是错误的。”

战败后共产党一直主张的和平革命论，一瞬之间遭到否定，换成了暴力革命论。

后来知道，那时除了《五一年纲领》外，还决定了阐明具体进行武装斗争的战术方针。这就是第五次全国协议会（一九五一年十月）通过的指针：“我们必须开始武装准备和行动。”那篇小文章不久即以《球根栽培法》为题秘密出版。

我在莫斯科时，后者没有让我过目。《五一年纲领》同我的观点也是完全不同的，但现在却要我立即回答：“同意或拒绝。”拒绝斯大林亲笔修改过的这份《五一年纲领》，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当时的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存在。他是“伟大的领袖”、“和平的旗手”。

我苦恼极了，同时对强迫我表态的苏共的大国主义，感到愤慨。但是最后我不能不领悟到，自己处在一种只能违心地表示“同意”的境地。在我勉强同意后，这个副部长便催我：

“那就马上去见斯大林吧。”

当着斯大林的面批评德田

时间已近晚上九点。斯大林一般要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所以九点正是他开始工作后不久。我们立即乘车离开饭店。那时，斯大林住在离克里姆林宫约十五公里的西郊孔采沃。人们说这是他的别墅。他除了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外，几乎都生活在这里，遇事则把党政干部召来开会和吃饭。

别墅坐落在幽静的森林中，周围是围墙，重要地点都有武装士兵警卫；莫斯科河从旁流过，林木郁郁葱葱。

德田、野坂、西泽和我几乎同时到达。入口处有内外两重大门，第一重门关闭后第二重才能打开，开关都由国家保安部的警卫人员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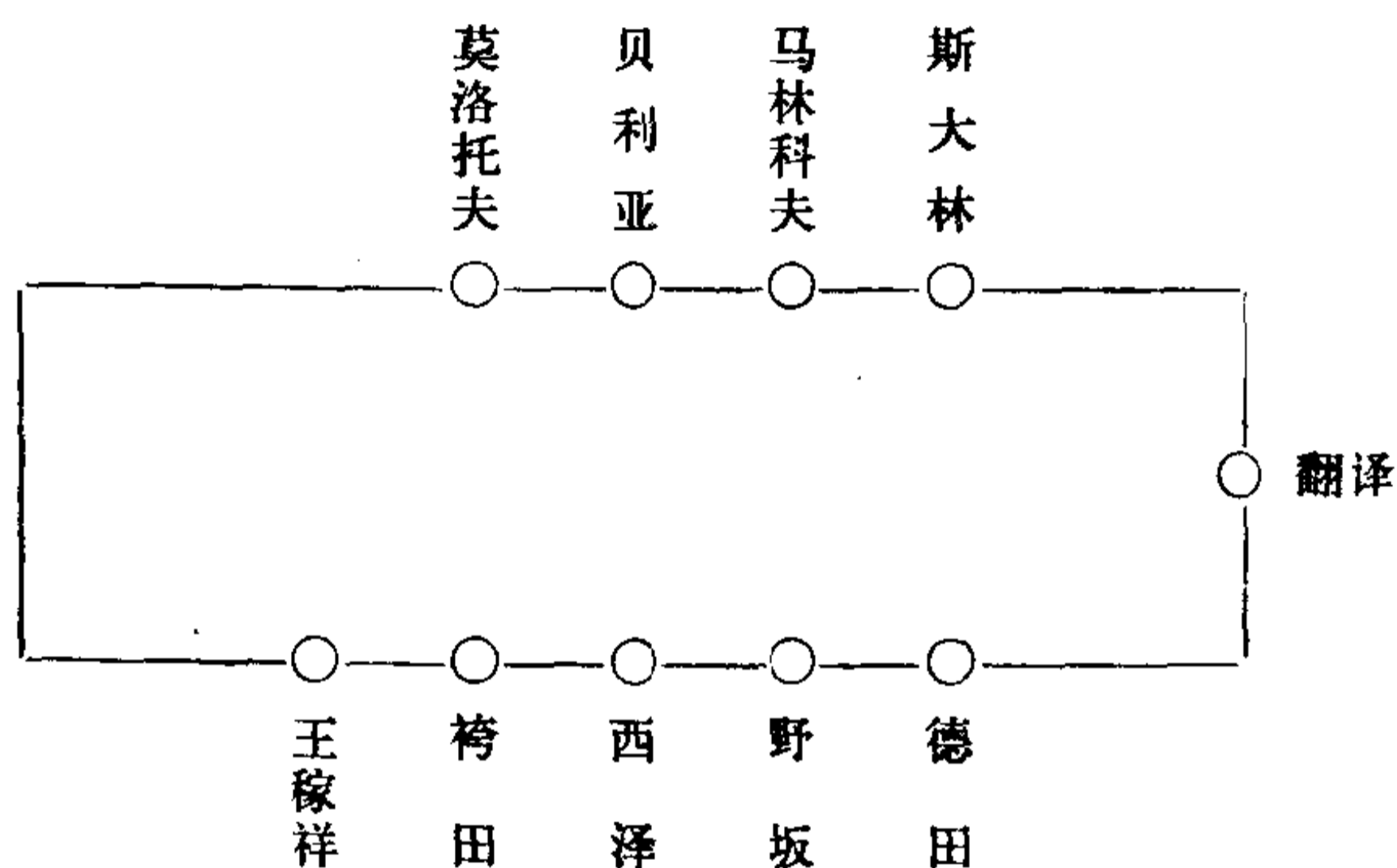
我们被引进一楼宽敞的大厅，厅的正中放着一张大会议桌，没有什么装饰品，眼睛可见的只有挂在天花板上的吊灯和铺在地上的厚地毯，空荡荡的大厅显得非常朴素。

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已在大厅里等我，他们是当时苏联党政最高首脑。斯大林是部长会议主席兼党的总书记，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负责对外事务，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马林科夫掌管党务工作，副主席贝利亚控制内务部和国家保安部——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头子。

我能见到斯大林，既高兴，又紧张。

苏日两党代表一一握手后，分别在会议桌两侧就坐。苏方次序是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这明确表明，马林科夫接班的可能性最大。马林科夫胖而结实，象个优等生；贝利亚把眼镜架在鼻子上，长相阴险；资深的莫洛托夫最老练，给人一种亲切的印象。

日方德田坐在斯大林对面，旁边是野坂、西泽（他们次序可能相反）和我。我的左侧是王稼祥。翻译坐在斯大林和德田之间（坐位见图）。



双方平心静气地进行交谈。一开始，斯大林就说：

“情报局提出批评是有其相应的理由的，也是正确的。”但他未作任何具体说明。他的语调非常柔和，使我感到意外。

我站起来发言，把情报局批评后德田等人的分裂活动告诉斯大林。我说：

“德田同志很容易冲动，动不动就发脾气、拍桌子，所以日本党无法冷静地讨论问题。尤其严重的是，当麦克阿瑟发出“六·六”解除公职的命令后，他竟把我们一部分经过正式选举的中委撇在一旁，擅自行动，于是使党陷于分裂状态……。”

我说到这里，德田马上跳起来大喊大叫：“小子，你胡说些什么！”我接着讲下去：“请看，他当着你们面还采取这种态度，可以想象，在日共政治局会议上，他会多么放肆。”

会场一片寂静。我继续说明与德田的分歧所在。接着，野坂指摘我说：

“袴田君，这一年你究竟做了些什么？难道你不是无所事事吗？”

对此，坐在我对面的莫洛托夫低声但坚定地说：“不正是你们不让袴田同志工作嘛！”翻译没有把他这句插话译成日语，但我懂俄语，知道他说的什么含义。不知为什么，莫洛托夫是保我的。

斯大林说：“纲领是我们帮助起草的。”

斯大林一声不吭，在面前一张纸片上作笔记，但不知道写些什么。他要发言时，总是站起身来，嘴里衔着烟斗，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背后踱来踱去，话说得很慢。

“袴田同志，你们向党中央组织了一个反对派，这不好。你不是金属工人出身吗？因此应该懂得，工人不团结就无法取得胜利。然而你们却组织了反对派，这怎么能取胜呢。这个纲领（《五一年纲领》）是我们帮助起草的，希望日本党在这个方针下前进。”

不知何故，斯大林三次提到我是金属工人。战前我曾在金属厂工作过，肯定他指的是那一段。

对《五一年纲领》，我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既然在见斯大林之前，就已向国际部副部长表示过“同意”，我当然不能自食其

言了。

当我心情烦躁地想点火抽烟时，王稼祥急忙按住我的手说，别当着斯大林抽烟。仔细一看，果真如此，只见斯大林面前放着烟灰缸，其他人面前都没有。

我无可奈何地把烟装进口袋。斯大林讲的下面这段话，使我大为震惊。

第九回 在莫斯科亲身感受到 斯大林逝世的冲击

在斯大林别墅里举行的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因为是饭后，所以既无食品，也没有酒，只有男服务员送几次用高脚杯盛的红茶。别墅四周的森林一片宁静。

会议几乎是斯大林一个人唱独脚戏。他一面来回走动，一面慢条斯理地、逐字逐句地发言。语调虽很柔和，但内容并无商量的余地。他说：“这个纲领(《五一年纲领》)是我们帮助起草的。”紧接着的下面这段话使我大为震惊。

“袴田同志，日本同志们告诉我，日本国内派别斗争十分激烈。这不好，必须立即停止。希望在这次决定的方针(《五一年纲领》)下，把党统一起来。因此，袴田同志应该作自我批评。现在就写，再寄给日本的同志们。”

和斯大林并排坐着的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一直看着我。德田、野坂、西泽脸上露出这是“理所当然”的样子。这时，除了回答“是”以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现在，党内干部中某些见识肤浅的人，责怪我当时挨斯大

林训一顿就缩了回去。首先，“训一顿”与事实不符。即使不说这点，也只能认为这种看法太无视当时的情况了。

我重复过多次，斯大林的伟大对我们共产主义者来说是绝对的。他使俄国革命成功，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阻挠下，创建了社会主义苏联。这些严肃的事实，都是无法否认的。

宫本现在也讲“独立自主路线”，但当时他也强调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是“最好的导师”。只有在这之后的五年，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人们才能自由地议论斯大林。

作为右的代表，背上“派别活动”的黑锅

斯大林要求我作“自我批评”，自己虽然勉强同意了，但总是一个耻辱。

制造分裂的德田等人没有受批评，而深受其害的我们却被当作“分裂派”。公理何在！何况我在日本时就因肺病卧床不起，几乎没有出席过“国际派”的会议。当我在中国和苏联这段期间，宫本显治、藏原惟人、春日庄次郎及龟田幸三等人加强了“国际派”的活动，和德田主流派的临时中央指导部、国内地下指导部（志田重男、伊藤律等）唱对台戏。而现在却把我当作右的代表，一个人背着“派别活动”的黑锅。

那份《自我批评》，现在读起来，也是不愉快的。

“……经过深刻反省自己的行动以后，我得出了如下结论：和我有关的派别这个时期的活动，同共产党的原则，即列宁、斯大林的教导是根本对立的。因此，我声明：抛弃过去使自己的派别活动正当化的想法，今后和一切派别断绝关系，并为根除派别而奋斗。”

这是和斯大林会谈后在旅馆里写成的。《五一年纲领》也好，《自我批评》也好，都是违背我的本意的。

同斯大林的会谈，是在深夜十一时以后结束的。好象结束得较早，又似拖得很晚。在这次会谈中，代表中国党参加会议的王稼祥一言不发。

告别时，斯大林对我说：

“袴田同志，听说你身体不好，可以在苏联好好疗养一个时期。”

德田、野坂、西泽、王稼祥等人，会谈后不久，就回北京去了，看来好象是为了请求苏联批准在中国拟订的军事方针才来莫斯科的。

后来听说，德田等人在回北京前夕，曾经半真半假地对苏联党说：“袴田搞派别活动，可以把他送到西伯利亚或其他什么地方去。”我对他们如此缺乏同志感情，感到愤慨。

我的病情比预料的还要严重。克里姆林宫五名医生会诊后，说我肺上出现了一个大空洞，并宣布：“为了适应手术，也得先去克里米亚疗养，恢复体力。”

一九五一年九月，我从莫斯科前往克里米亚。

疗养生活失败，急性酒精中毒

克里米亚是伸向黑海的一个半岛，冬天也很暖和，是苏联有数的几个疗养区之一。我住的那所党的负责人专用的疗养院，原来是尼古拉二世的叔父的别墅，非常豪华。

只有我是日本人，院长关心地说：“米饭要比面包更香一些吧。”厨师也来征求意见，问鱼怎么做才合口味。我知道，他

们都在努力帮助我恢复体力。但我在疗养院里，发生过一次大的事故。

苏联有一个习惯，年除夕的晚上，时钟一敲十二点，大家都要聚在一起会餐。疗养院也早就通知说，一到十二点就请大家入席。我本来已经很注意了，但还是迟到了十分钟。我是唯一的外国党的负责人，我这个和院长平排入席的客人不到场，晚宴是无法开始的。大家都饿着肚子等我，当我进入食堂时，有的鼓掌，有的讲怪话，引起一阵骚动。院长给我取了个俄国名字：“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他致词说：

“米哈伊尔同志到了，让我们为祝贺新年痛快地吃吧！”

他一讲完，许多人就走到我面前。

“迟到者得罚酒！”有的倒伏特加，有的斟香槟，有的劝葡萄酒。在苏联，熟人之间都以你我相称。

“你喝！”他们拚命喝，也要我干杯。我也来了劲。

“行，我干给你们看。”

我平时很少喝酒，何况那天中午一点钟左右吃完午饭后也没有吃点点心，一直空着肚子。我记得接过好些人递来的酒，一饮而尽，并站起来致了新年贺词，接着就躺倒了。

大家都吃了一惊，不晓得急性酒精中毒竟如此厉害，三、四小时一直处于昏睡状态。大概接连注射了五、六针樟脑液，才勉强醒过来，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冷、冷！”其实卧室有暖气，可能由于心脏功能减弱，才觉得仿佛光着身子躺在雪地里。我举目看见女医生一面替我量脉搏，一面扑簌扑簌地掉眼泪。她看见我已经能睁眼说话，才放心。

除了这次事故外，疗养生活是很舒适的，四个月体重增加

了十公斤。

新年后不久，即一九五二年一月，我回到莫斯科，随后又转到莫斯科以西约六十五公里处的党中央疗养院。这所疗养院从前是帝俄时代大地主格鲁津公爵的别墅，位于莫斯科河畔，建筑非常讲究，莫斯科河的这段河面很窄，卡车可以在河上通过。冬天克里米亚暖和，夏天这里凉爽。

一天深夜，苏共中央日本处处长加里宁突然来访，并把我从床上叫醒后问道：

“袴田同志，身体好吗？”

我觉得有些反常，便反问说：

“我的身体情况你还不清楚吗？”

“哦，斯大林同志深夜二时左右来电话问起你的健康状况，向他汇报前有必要先来看看你的实在情况。”

知道斯大林还把我挂在心上，实在令人感动。

听到斯大林突然逝世的广播， 不禁热泪盈眶

德田同年夏天因患高血压来到莫斯科疗养，这是令人难忘的一桩事。在苏联同志的安排下，我到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区去看望他，那时他看上去还很健康。

尽管分裂成主流派和反主流派，尽管我们之间一直不和，但总是战前以来的老相识。战后一个时期，又同住在阿佐谷的一套房子里。可能是这些往事引起了旧谊，我们一起在树林中散步时，德田低声说：“相信不久就能和你一齐干。”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在我经常往来于疗养院和莫斯科这段期间，迎来了一九五三年。

其间有关日本的动向，由于经常阅读苏共中央给我送来的日本报纸，大体知道一些。遗憾的是，正如我担心的那样，日本党的武装斗争受挫，受到国民的严厉批评。

“流血的国际劳动节”、“五·三〇袭击东京板桥派出所事件”、“六·二五大阪吹田骚乱事件和东京新宿骚乱事件”……^①

日本共产党在离我遥远的地方。

在莫斯科，一九五三年也相继发生了两起世界性事件，即斯大林突然逝世和处决贝利亚。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引人注目的事件。

我是在莫斯科住处得悉斯大林逝世的。当时我住在高尔基大街北面、通向列宁格勒大街的莫斯科运河畔的一所房子。

三月六日凌晨，一打开床头收音机的开关，就传来又庄严又悲哀的乐曲，我感到一阵伤心。两天前，有消息说斯大林患脑溢血病倒了，也许是斯大林发生了意外……。

我的预感符合事实。八点新闻节目一开始，著名广播员尤里·列维坦在重复了一句“我们是莫斯科电台”以后说：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列宁意志的继承者、苏联人民的英明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在三月五日晚上九点五十分逝世。”

“斯大林的遗体安放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苏联公民可以在那里向亲爱的斯大林告别。”

^① 均系日共发动的群众斗争和武装行动，无一例外地受到镇压。——译者

列维坦特有的抑扬顿挫、清晰的声音直刺我的耳膜，不知不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了。

广播后，工会大厦前面的大街上，人山人海，悲痛欲绝，争相向斯大林同志告别。因为拥挤不堪，不少妇女的高跟鞋、手提包都散落在大街上。

六日下午，斯大林的遗体从克里姆林宫移到工会大厦，接受市民的告别。这座建筑物从前是贵族会馆，贵族们就在圆柱大厅里举行舞会。现在，著名的人物逝世后，遗体就被安放在那里。天井两侧挂满了豪华的吊灯，灯光耀眼。

斯大林的遗体两侧面对面地站着党政领导人，他们后面是外国代表。我也站在里头。市民们从我们背后穿流不息地过去，许多妇女泣不成声。

不到三个月的三驾马车体制

当时，斯大林对苏联人民来说，完全是一位英雄。托他的福，苏联才打赢了卫国战争。这种观念在大家心里扎了根。

莫斯科郊外我所在的疗养院附近，为卓娅·科斯莫杰米杨斯卡娅立了一个铜像。纳粹德军侵犯那里时，刚满十七岁的姑娘卓娅，被德军士兵在雪地里拖来拖去，市民们流泪目睹这种情景，但又爱莫能助。

卓娅忍着剧痛大声喊道：

“同志们，不要哭，斯大林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不久，德军终于被击退，但卓娅牺牲了。

斯大林的形象就这样刻印在人民的脑海里。

就我而言，两年前的莫斯科近郊和斯大林会见时，他的模

样现在还历历在目。那时他已七十一岁高龄，但身体很结实，看上去要年轻得多。

九日在红场列宁墓前举行了国葬。在此之前，公布了接班人。不出所料，采取了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三驾马车方式。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任副主席兼内政部长(国家保安部和内务部合并而成)，莫洛托夫仍任副主席并重新兼任外交部长。

在列宁墓的一侧，我一直注视着国葬的进行。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先后在列宁墓上发表了演说。他们的讲话通过扩音器传向四方。

贝利亚的演说印象最深。他吹捧马林科夫说：“同我们在一起的马林科夫，是一位富有才华的领袖。”

但是，三驾马车在斯大林葬礼后不到四个月就垮台了。据说，贝利亚玩弄阴谋，被戏剧性地处决了。

在疗养院里，苏联党的负责人向我介绍了贝利亚事件的经过，但内容离奇得叫人难于置信。

第十回 继得知贝利亚处决后， 又获悉伊藤律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逝世后，有一个人的表情明朗起来了，这个人就是贝利亚。

他的表情是怎样明朗的呢，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回忆录里都有叙述，看来当最高权力的宝座出现空缺时，他内心就跃跃欲试了。

在和斯大林会谈时我见到的贝利亚，眼镜架在鼻子上，显得十分阴险。他体格魁伟，颇象一个实力人物。也许是掌握着国家保安部和内务部这种强有力的机构才使他这样的。

对于这个“血腥的清洗者”，不必多费笔墨了。我在苏联就感到过他的影子。记得是一个大晴天，我和苏共中央的同志一起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散步时，鞋带松了，我便停步弯腰结紧，偶尔往两边一看，发现左右大树后面都有人影，时隐时现，好象和我们并排走着。我在苏联受到殷勤款待，同时也处于贝利亚部队的监视之下。

斯大林死后，宣布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三驾马车接班。当时我曾乐观地认为，这三个人如能合作，那就可以弥补斯大林去世后出现的空隙。但不久事实证明，这个估计太天真了。斯大林一死，就开始了权力之争。

关于贝利亚的阴谋、被捕和处决，有许多人写过文章。苏联官方报道说，他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一九五三年七月开除出党，同年十二月以叛逆罪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但是后来有各种说法：有的说是赫鲁晓夫开枪打死的，有的说是米高扬放的枪，至今没有定论。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在他的回忆录中，强调自己是逮捕贝利亚的主角。

事件发生后不久，即六月下旬贝利亚被捕的消息发表之前，我在苏共中央疗养院听到的苏共中央负责人介绍的情况和上面的说法相差很远。我也说不准他究竟告诉我多少真相。不过把当时苏共干部中流传的说法如实记录下来，也许是有意义的。

六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马林科夫等苏联首脑都在大剧院观看新创作的芭蕾舞。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包厢里没有第二号人物贝利亚到场。

据传，同一时刻，贝利亚直接指挥的国家公安部直属的装甲部队秘密地开赴莫斯科。但在莫斯科市内的交叉路口被交警制止了。装甲车进入莫斯科需要特别证明，而这支装甲部队却没有任何证明。于是，双方发生争执。这时，装甲车正在出动的令人奇怪的消息，立刻报告了在大剧院的马林科夫。他当即断定，只有贝利亚才会同自己商量，就把装甲部队调进莫斯科，其目的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马林科夫立刻用电话命令莫斯科卫戍司令员以最高速度把装甲师调到莫斯科来。马林科夫调动了比贝利亚动用的强得多的装甲部队，来制止政变阴谋。

同时，马林科夫马上回克里姆林宫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绝大多数成员都刚好在大剧院看演出，贝利亚若无其事地来到会场。这时，马林科夫立即把手枪对准贝利亚，并当着大家扳起了枪机。

——这就是我在疗养院听说的处决贝利亚的过程。稍稍迟疑，也许是贝利亚把马林科夫等人干掉了。

在朝鲜停战时，重提武装斗争路线问题

斯大林的突然去世和贝利亚被处决形成的冲击性事件，对世界政局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在远东美苏对立的焦点朝鲜半岛，处于胶着状态的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双方决定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签字。虽然人们说这是“没有

和解的停战”，但持续了三年零一个月的战争总算结束了。

我在前面已经谈过，日本党的武装斗争路线和朝鲜战争有密切关系，而且受到期望我们在后方捣乱的苏联党和中国党的强烈影响。在中国，计划在北京以北建立一所进行军事教育的日本人学校，日本也有一些党员秘密出国，前来受训。

由于战火即将熄灭，军事学校很快就改变为培训日本人的马列学院。这以后再叙述。

在战争呈胶状并向停战发展的新形势下，日本党的武装斗争问题又重新被提出来了，武装斗争已陷入了失掉国民支持的无可救药的绝境。我在被迫接受《五一年纲领》前，曾向苏共中央提出过反对武装斗争的意见书。事情竟不幸被我言中了。

执行国内地下组织极左方针的志田重男等人（现在还有些人装出与己无关的样子）日子也很不好过。需要向苏联党和中国党说明日本的实际情况，并请他们提出某种新的方针——于是，从这个愿望出发，一九五四年初，首先派绀野与次郎、河田贤治、宫本太郎三人来到中国。

那时，还没有从一切都得依靠中苏的主义中摆脱出来，而是依然想从北京和莫斯科领到“圣旨”。即便为了让反对德田主流派的“国际派”接受方针的变化，也有必要取得“指令”才行。

绀野与次郎、河田贤治、宫本太郎在北京和野坂参三、西泽隆二会谈后，觉得还有必要同苏共商量，便在一九五四年夏一起前往莫斯科。

他们起初的想法是，反正袴田在莫斯科，可以让他充当同

苏共谈判时的翻译。他们根本不想让我作为正式代表参加谈判。但他们的这一意见被苏共中央拒绝了。苏共中央表示：“绝对不能同意让袴田同志当翻译，而要请他当正式代表，参加谈判。”这使他们感到吃惊。

我对自己曾经写过反对武装斗争的意见书而感到自豪。苏联党和中国党都肯定还记得这件事，所以才让我作为正式代表参与新方针的决策。

结果，野坂、西泽、绀野、河田、宫本和我一起讨论新方针，即起草第六次全国协议会（“六全协”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举行，会上主流派和反主流派基本上实现了和解）决议的《莫斯科原案》。在会议中，我很自然地成了中心。

德田在精神错乱中死去，伊藤受到审查

苏联党安排我们到布尔加宁（接替马林科夫当部长会议主席）的别墅去住宿。别墅位于莫斯科以东四十公里的高尔基村，面积颇大，约一千平方米左右。旁边就是列宁生前居住的别墅，现已成了列宁纪念馆。馆内到处陈列着藏书，书上大都写满了注释，表明列宁学习多么勤奋。

当叙述我们在布尔加宁别墅（共产国际最后一届主席季米特洛夫病逝在这里）居住时的会议和生活以前，我想先交待一下德田的去世和伊藤被开除出党的事。

这时，西泽隆二才告诉我，德田书记长已经去世。我闻讯感慨颇深，正好两年前的莫斯科见到他时，他显得还很健康。好坏另作别论，德田毕竟是我们党战后八年的代表。

据说，死因是糖尿病和高血压症，最后是在精神错乱中离

开人世的。我想起他年轻时曾经说过：“我不会死在‘塔塔米’^①上，要不是干革命被砍头，就是发疯而死。”

他是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六十周岁前夕去世的。此前一个月，他的得意门生伊藤律（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机关报最高负责人）受到处分。直接负责审查伊藤的是西泽。

当时，德田、野坂、伊藤、西泽等党的领导人都集中在北京。从德田病重时开始，善于看风使舵的伊藤就勾结野坂，企图挑拨德田和西泽的关系。伊藤是德田的心腹，但西泽是德田的女婿。德田极为信任西泽，几乎是言听计从。

至于西泽，他对伊藤早就抱有怀疑，只是因为德田十分倚重他，才没有深究。但当伊藤勾结野坂，成功地离间德田和西泽后，西泽终于下决心深究。那时，德田已经失去判断能力，西泽在中国党的协助下，开始彻底追查伊藤，使许多疑点真相大白。

我也认为，伊藤战前曾为“特高”效命，战后又同美国情报机关有联系。过去我曾吃过苦头，当我要调查伊藤和“索尔格事件”的关系时，引起德田反感，被贬为北陆地委主席。

而且，伊藤在男女关系上屡犯错误。听说他是一九五一年秋天偷渡来华的，在北京又和妇女发生纠葛。

后来，即一九五四年秋天，我在莫斯科起草完“六全协”决议草案后来到北京，在那里看到了伊藤写的自我批评，写得很长，我一目十行浏览了一遍。因此，我知道的情况，全是从西泽那里听来的。当我来到北京时，伊藤已经不在了。

我一九五七年回国后，曾几次收到伊藤夫人君子的来信，

^① 日本式的住房内铺的草席。——译者

她当时住在八王子。

来信说：“听说袴田同志很了解我丈夫自那以后的动向，孩子们现长大了，都要求见到自己的父亲。如您知道，就请告诉我们吧。”

处分伊藤的消息发表十天后，即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的《赤旗报》上，刊登了党员君子夫人“和丈夫断绝关系的声明”。听说，那是多次逼她“要党还是要丈夫”后才写成的。

我无法回答她的来信。这次我和党之间发生问题后，给她挂了一次电话。

她拿起话筒就问：

“袴田同志是长期从事革命运动的，为什么现在和党发生了问题呢？”

我坦率地回答说：

“究竟谁是谁非，要你现在作出判断，可能还有困难，然而你将来一定会明白的。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不能让你现在就理解这一点。”

“关于你的丈夫的事，你曾来过几封信，但我连一封信也没有回。这是因为我无能为力。我从莫斯科到北京时，德田已经去世，伊藤也不见踪影，我也不知道他的去向。”

“伊藤在北京时，私生活方面也有许多是可以责备的，他被开除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党的负责人中，只有野坂知道当时的情况。难道是野坂让你来问我的吗？”

她说：

“不，没有。不过情况我已经完全明白了。”

在布尔加宁别墅起草“六全协”决议草案并不顺利。达成什么样的妥协方案，都会影响到选举谁当德田以后的第一把手。我们在不受苏联、中国干涉的情况下进行讨论。

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苏斯洛夫突然闯进我们的别墅。

第十一回 苏斯洛夫在 关键时刻插一手

布尔加宁在高尔基村的别墅非常舒适。虽是夏天，却很凉爽。这一带划为“非开放区”，所以汽车不能进来，人影也很少见。别墅旁边的河水潺潺，又无人垂钓，鱼群悠然在水中游来游去。

我们偶尔划小船沿河而下，途中把鱼饵装在鱼钩上下钩。只要鱼钩一沉，鱼群就来争食，一个半小时就能钓到七十尾黑鲫鱼。有时，我们在夜间撒网。

别墅里配备一个厨师、三个保姆照顾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时，赫鲁晓夫已经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半年后，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也被布尔加宁取代了。

我们在别墅里讨论的最大目的，是对武装斗争进行自我批评，为党的统一和团结拟订新方针。但是分裂的双方各说自己有理，在表现形式上意见不一。我历来反对武装斗争，对这两、三年的“火焰瓶斗争”、袭击警察等极左冒险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野坂参三、绀野与次郎、西泽隆二、河田贤治、宫本太郎等人都是主流派，想方设法为过去的错误方针辩护。

我主张：“必须抛弃这些自我辩解的言词，也有必要摆脱

《五一年纲领》。”

德田一年前已经去世，他的心腹伊藤也被开除出党。国内党的指导部掌握在志田重男手中，武装斗争路线行不通后，他虽然派绀野及河田等人出来，但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办法。

绀野报告了国内情况。他坦率地承认：“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了。”

讨论涉及面很广，从批评军事方针到如何评价“地区人民斗争”、土地改革，以及参与工人运动的方法等。会议还讨论了“国际派”的活动算不算派别活动，“国际派”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德田主流派单方面分裂中央委员会的结果。

我自然而然地成了会议的中心。记得除我外，绀野发言最多，其次是西泽。最初对我持批判态度的西泽逐渐转而同我合作，在达成一致意见上起了作用。

这时，还发生了查问野坂的问题，这是由西泽提出的。他说，在北京时，野坂勾结伊藤，企图离间德田和西泽的关系，因此，应该要野坂对当时的行动作出反省，进而追溯到战前，搞清楚野坂可疑之处。

我也全面赞成查问野坂，但苏共不久就要我们刹车。可能苏联党担心，如果查问野坂的结果象查问伊藤时把他留在中国一样，这回把野坂留在苏联，那就难办了。

也许因为上面这件事，野坂在会上几乎没有讲什么话。

既顾全中、苏两党面子，

又作了自我批评

我们在布尔加宁别墅呆了一、两个月。九月初，终于把

“六全协”决议的《莫斯科原案》写出来了，并及时译成俄文送交苏共中央，让他们充分了解内容。中国党的联络部长王稼祥也看过这份《原案》。

一天下午，苏共中央书记、被人称为理论家的苏斯洛夫突然在别墅出现。记得同来的还有秘书、联络部副部长和日本科科长。苏斯洛夫对我们起草的《原案》只提了一个要求，即加进一项内容，表明《五一年纲领》是正确的。他的神情显得既不是非加不行的强硬态度，也不是可加可不加的模棱两可的样子。他对《原案》没有进行任何评论。

到了关键时刻，苏联党又插手干涉了。本来宣扬武装斗争的《五一年纲领》就是在斯大林的撮合下产生的，而且同中国党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提到《五一年纲领》是错误的，那么中苏两党就丢尽脸了。苏斯洛夫好象希望我们考虑这一点。

那时，苏联党还处于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地位，日本党也还没有执行独立自主的路线，何况我们又还住在苏联的别墅里，吃着他们的饭在起草《原案》呢！

“六全协”是一年后的一九五五年七月举行的，过去相互敌对、厌恶并一直顶牛的主流派（野坂参三和志田重男）和反主流派（宫本显治和我）实现了和解，朝着党的统一方向前进了一步。《决议》第一段说：

“新纲领（《五一年纲领》）通过后所发生的事件和党的经验证明，纲领中提到的全部内容，都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以这种表达形式满足了苏斯洛夫的要求。一面确认《五一年纲领》是正确的，一面又对武装斗争进行自我批评，前

后显得很失调。

采纳了苏斯洛夫的要求的“六全协”决议案——《莫斯科原案》——立即寄给了日本党。记得是寄给志田重男收的，他可能一九五四年十月或十一月才接到。

对它的最初反应，是志田一九五五年元旦在《赤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统一和整个民主力量的团结》的文章。他在文中谈到要同武装斗争诀别时是这样论述的：

“这里，我们愿意进行坦率的自我批评，并向国民群众表明：我们要坚决改正过去犯过的、至今也很难说已经彻底改正了的一切极左的冒险主义错误。

“冒险主义不仅伤害了我们党，而且对整个民主力量的统一方面使国民遭受重大损失负有责任。我们保证今后决不再犯这类极左的冒险主义错误了。

“同时，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和集体主义，同国民群众日益加强公开的联系，顽强持久地、精力饱满地开展党的独立工作，以报答国民的信任。”

来到北京：改革广播和整顿生活

一九五四年九月，我离开莫斯科前往北京。野坂等人坐火车，我和绀野与次郎乘苏联军用飞机。

飞机不大。他们请我坐在驾驶席旁边。景色绮丽，令人心旷神怡，天空仿佛直压过来。我天真地想：

“那儿有一群飞鸟，它们能赶在飞机前面穿过去吗？”

俯视地面，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之间出现许多奇怪的圆形池塘，就象用圆规画成的一样。请教机组人员后，才知道

是冰河留下的痕迹。

在北京，德田已经去世，除从莫斯科来的人员以外，还有听涛克巳、安斋库治、高仓辉、土桥一吉等人。听涛负责自由日本广播，高仓和土桥主管北京郊外的一所日本人学校。

自由日本广播是一九五二年五月在中国党帮助下创办的北京对日“地下广播”，当时不但用短波，还用中波，播音时间也比较长。日方工作人员就达一百人左右，其中有一个被解除公职的 NHK（日本广播协会）前报道部长，他对这个电台付出了很大的力量。

我到北京后作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改革自由日本广播。在此之前，听涛是总负责人。广播的文章生硬，使用书面语言，内容繁琐，令人费解。我首先把它改成口语体，并力求通俗易懂，为人乐意接受。

其次是整顿生活。当时我们住在一所二层楼房里，设备豪华，每人一室，但生活相当散漫，有的深夜还喝茅台酒，有的连组织生活都过不起来。也许是这个原因，不少人常常闹病。

我首先提议生活要有规律。早晨按时起床，做早操，午后休息时间锻炼身体。支部大会之间多开小组会，交换意见时不要有顾虑，然后由小组长汇报情况。于是，生活变得很有规律。那时，我是总支负责人，安斋是书记。

日本人学校有两千名学生

自由日本广播电台设在北京市内，而日本人学校则设在芦沟桥以南。前面已经提到，扰乱朝鲜战争的后方是创办这所学校的目的之一。由中国党对来学习的日本党员进行军事

教育。但朝鲜战争停火休战后，这所学校随即改成进行革命教育的马列学院。

这所学校的学员有：战后继续留在中国的日本共产主义者、党的同情者以及特地从日本派来的党员，共约二千人。有的人成了家，所以还办了托儿所，婴孩和妻子都照发生活费。一切都由中国党负担。

马列学院的院长是高仓辉，副院长是河田贤治，和我一起偷渡中国的秋山负责学院的组织工作。中国党派两、三名国际部副部长级的干部常驻学院，进行监督和指导。教员大都是中国党和苏联党的同志，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革命史等。现在党的负责人中，有好几人曾在那里学习过。

在国内，一九五五年元旦，志田重男在《赤旗报》上发表文章，就武装斗争进行了自我批评后，迅速从分裂走向和解。也有人认为这不是“和解”，而是“凑合”。即使如此，在那种情况下，互不揭对方的老底，而是各自克服弱点，谋求团结，所以是正确的。

三月，公布了包括反主流派在内的新的“中央指导部”，由春日正一（主席）、志贺义雄、宫本显治、米原昶四人组成。地下指导部则有公安部门已经下令逮捕的志田重男、椎野悦朗、冈田文吉等人。在北京的负责人陆续秘密回国。绀野与次郎、西泽隆二、野坂参三、安斋库治等先走，但动身前不久，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要想法请志田重男和宫本显治到北京来。当然，这和中国党也有关系。

第十二回 赫鲁晓夫“批判 斯大林”的冲击烈度

党的分裂长达五年之久。互相敌对、谩骂、厌恶，造成了难于收拾的局面。恶梦般的日子眼看就要结束了。

日本党具有历史意义的“六全协”预定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举行。在此前不久，我们商量是否请志田重男到北京来。我对此最积极，野坂参三、绀野与次郎、西泽隆二也表示赞成。

不用说，志田是指挥国内军事组织、武装斗争的最高负责人。如果说德田的右手是伊藤律，那么左手就是志田。伊藤被开除和德田去世以后，志田就一手控制了党的地下组织。

其间，“火焰瓶斗争”、“山村工作队”等极左行动自然不在话下，就在人事上也大搞宗派主义，他把自己在关西时代培植起来的“近卫队”都安插在周围和全国的重要岗位上。不仅如此，为了确立志田派的领导权，还以各种借口，排斥和清除非志田嫡系的批判派。

一九五五年元旦的志田“自我批评”中，虽对极左冒险主义作了反省，但并未涉及上述为所欲为的行径。以“六全协”为契机，为了使主流派和反主流派团结起来，从而统一党，也必须严厉批判志田以往那种专横行为，并要求他进行反省。

但中国同志不同意我们的这个建议。他们担心“面对面地批评志田，肯定会过火”。

于是，请志田来北京的主张被否决了，但他们也赞成把宫本显治请来。坦率地说，我和宫本之间的意见是一致的，即在

党重整旗鼓之际，反主流派的宫本应该成为核心，因而这时有必要让他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作用，提高作为一个领导人的觉悟。

从这个目的出发，决定请宫本到北京来，但他是从事公开活动的，不能采取偷渡的办法。中国党考虑让他作为文化使节团的成员邀请他访华。邀请书是在“六全协”前发出的，不知后来情况怎样。中国作家协会对包括宫本在内的四位文学界人士发出了邀请书。除他外，还有白井吉见^①、中野重治^②和本多秋五^③。但因外务省不发护照而未能成行。

突然出现的“潜伏三干部”

无论如何，“六全协”终于开成，尽管有点勉强，党还是统一并重新前进了。堪称新方针的《决议》（《党的工作总结和当前任务》），是以我们在布尔加宁的别墅起草的《莫斯科原案》为基础的。苏斯洛夫的要求是以这种形式表达的：“新纲领（《五一年纲领》）通过后所发生的事件和党的经验证明，纲领中提到的全部内容，都是完全正确的。”此外，还有如下二段：

“党在战术上犯了几个大错误。这些错误不仅影响到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而且也给团结整个国民力量加入民族解放民主统一战线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错误中最严重的莫过于极左冒险主义了。”

① 白井吉见(1905—)，著名文艺评论家。——译者

② 中野重治(1902—1979)，著名诗人。一九三一年入党，并从事进步文艺运动，被捕后在狱中变节。一九五五年恢复党籍，后因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被开除。——译者

③ 本多秋五(1908—)，著名文艺评论家。——译者

“我们党内至今缺乏集体领导的作风，而且把残存于日本的半封建思想搬进党内。它同以个人为中心的 leadership 相结合，表现为家长式领导的倾向。党必须同这种倾向作斗争，坚决排除以个人为中心的 leadership 方法。”

一面肯定鼓吹武装斗争的《五一年纲领》是正确的，一面又对极左冒险主义进行自我批评，奇妙之处上面已经提到。新产生的领导集团，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在“六全协”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下述人员被选为政治局常委：

野坂参三、志贺义雄、宫本显治、袴田里见、志田重男、绀野与次郎、西泽隆二。

书记处的成员是：野坂参三（第一书记）、绀野与次郎、志田重男、宫本显治。

“六全协”前，住在北京的“海外干部”绀野与次郎、西泽隆二和后来的野坂参三、安斋库治先后秘密离开中国返回日本。我、河田贤治、听涛克巳、高仓辉等因和日本人学校及自由日本广播电台有关，决定暂时留在北京。

野坂、绀野回国后，再加上潜伏在国内的志田，这“潜伏三干部”在“六全协”结束后的八月十一日晚，于明治神宫外苑日本青年馆举行的“六全协纪念大会”上突然露面，轰动了新闻界。

我在北京迎来了一九五六年，没有想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一年竟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动荡的年头。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接着发生了波兰反政府暴动和匈牙利事件。同时，中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中共八大为契机，开始对“批判斯大林”的批

判。这可以说是中苏对立的萌芽。

很凑巧，我出席了苏联党和中国党的这两次历史性会议。

直接要求“看秘密报告”

二月，苏共二十大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我和河田应邀从北京前往参加，因为我们在潜伏中，是不公开的代表，所以坐在不拍照片的特别席上。

赫鲁晓夫(第一书记)坐在主席台正中央，其右侧是布尔加宁(部长会议主席)、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左侧是伏罗希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和萨布罗夫。

许多外国兄弟党都派了代表，包括中国的朱德(政治局委员)、法国的多列士(总书记)、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总书记)。

大会连续开了十天。说实话，令人感到腻烦。午前、午后各由一、两名外国代表致词，此外都是苏联代表发言。会场上安装着同声传译设备，但苏联国内州委第一书记过分具体的讲话内容，同我们这些外国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常常悄悄地溜出会场，到走廊过道里喝咖啡、抽香烟。四周还放有食物，可以随手取来食用，因而常常很热闹。

大会上，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报告最引人注目，当时曾广泛报道。赫鲁晓夫强调：

一、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能够和平共处；

二、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可以阻止的；

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通过议会道路实现和平转变。

米高扬则首先指名批判斯大林。

实际上,如果仅仅这些,还不足以令人过分惊讶。但大会最后一天,赫鲁晓夫作了那个众所周知的秘密报告。不用说,我和其他外国代表都没让出席那次秘密会议。因此,当时不可能知道赫鲁晓夫那么激烈地批判了斯大林。

大会一结束,我便离开了莫斯科。苏共送给我一件用上等英国料子缝制的上衣和一块奥米茄手表作为纪念。在北京稍事停留后,我又应邀乘专机飞往北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平壤,出席四月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那时,我才亲身感受到朝鲜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连山脚下的小茅屋都遭美国飞机轰炸过。城市、乡村成为一片废墟。

朝鲜党的一位负责人说:

“这些轰炸机都是从日本基地起飞的。”

金日成(首相、党中央委员长)会见我时,万分感慨地说:

“袴田同志,我们认为日本的解放和南朝鲜的解放是一回事,因为都处于美国占领之下。两党必须友好相处。”

从朝鲜回到北京后大约过了两、三天,中国同志告诉我关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事,我吃了一惊。中国党已把秘密报告传达到共青团员一级。由此得知,中国、法国、意大利等兄弟党都从苏共那里得到了秘密报告文本。报告的部分内容被泄露出来,登载在外国报刊上。

我愤懑极了,马上驱车到苏联大使馆。真是奇缘,那时的苏联大使正是一九五〇年起草情报局批评日共的文章的哲学家尤金。一见他我就气冲冲地说:

“太不象话了!为什么秘密报告的文本不给我们日本党

的代表？中国的共青团员都已经知道报告内容了。请你当我的面立即给莫斯科挂电话，准许让我们阅读秘密报告。”

尤金对我气势汹汹的样子感到很为难，他马上挂了直通电话向国内请示。结果只准许我“就地阅读”，不同意给我提供报告的文本。

我一连两天去苏联大使馆，仔细阅读报告，边读边感到极为震惊。

昨天的“伟大导师斯大林”，今天被说成是粗暴、独裁、残忍的化身。起初我曾怀疑是否真有其事。

在斯大林及其同伙造谣、虚构、捏造的罪名下，多少无辜而有才华的同志被扣上“人民敌人”和“叛徒”的帽子惨遭杀害，其中包括在革命战争和卫国战争中党和军队的一些功臣。

报告中有这样一节：

一九三四年苏共十七大上，当选的中委和后补中委共一百三十九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即将近一百人在一九三七到三八年的肃反时期中，被逮捕和枪杀了。

说起一九三八年，正是话剧演员冈田嘉子和杉本良吉一起，越过桦太边界，逃奔苏联的时候^①。他们也被卷进了斯大林残酷的镇压政治中去。

我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在美国国务院公布该报告前六个月，记得那时自己觉得对斯大林的批判过火了，因而必须给斯大林作点辩护。

^① 名演员冈田嘉子和日共党员杉本良吉相爱，并冒险逃奔苏联，曾引起轰动。但他们后来在苏联受到审查，杉本死于狱中，冈田直到七十年代才公开露面。最近几年，冈田经常往返于日苏之间，从事“文化交流”。——译者

值得评价的二十年代的斯大林

在战前一九二五年，我按照渡边政之辅和德田球一的命令，曾秘密出国，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学，一九二八年回国。那时正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尖锐对立的时期。

实际上，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大反斯大林。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立场上，批评斯大林(总书记)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每逢“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等节日时，他常常出现在旅馆的阳台上，对下面游行的人群进行煽动。我们当时也在游行队伍中，从下面朝着上面的托洛茨基发出嘘嘘声。

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站在斯大林一边。与其说是斯大林派，不如说是中央委员会派更为恰当，我当时对他们抱有好感。

但是东方大学的教授中，托派超过半数。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女儿、讲授俄共党史的格雷茨卡娅教授也发表演说支持托洛茨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拉狄克(德国人)也是托派，每次来东方大学讲话时，都要攻击斯大林。当我们起哄时，他就挺起胸膛说：“我参加革命十几年了，才不怕你们这些人起哄呢！”

当时，空气比较自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党代会上发生争论时，《真理报》上同时介绍双方的主张，甚至把争论的部分也发表出来。这仿佛是列宁传下来的习惯。我用俄语直接看《真理报》。

托洛茨基的主张是：

“我们好不容易恢复到了战前的生产水平。要想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推动欧洲各国发生革命，并请他们向苏联提供新技术。恩格斯也说过，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发展社会主义。”

对此，斯大林反驳说：

“恩格斯的时代和现在不同。恩格斯就没有料到首先在俄国发生革命。但是革命已经发生，而且取得了成功。今后需要的正是托洛茨基所说的技术和机器，但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创造呢？”

“托洛茨基的意见是挑衅性的。如果为了从德国取得机器和技术，就要让德国发动革命，那肯定会引起战争。而我们现在才刚开始和平建设社会主义，战争会使我们的努力化为灰烬。”

我从《真理报》上看到这场争论，觉得斯大林的观点有说服力。同时我也知道，要把托派压下去是非常困难的。托洛茨基在我回国后第二年（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境。我至今仍然认为，二十年代的斯大林应该充分肯定。

只是一旦站在权力的顶峰，并持续一个长时期后，就容易陷入个人崇拜和搞个人独裁。这一点已通过斯大林得到证明了，现在日本党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毛泽东含蓄批判“和平革命”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极大地冲击了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但中国党的反应是独特的。我在出席同年八月中共八大时，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

那时，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党的主席兼国家主席)和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副主席)之间已经出现微妙的阴影。大会限制了毛泽东的独裁权，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刘少奇一面否定个人崇拜，一面又强调“领袖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

大会连续开了十来天，其间休息一天，外国代表应邀出席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我乘车前往，一进门便是大厅，毛泽东站在大厅门口，身旁是一个年轻的服务员。我们握手时，毛泽东老拉着我的手，并开始说：

“袴田同志，共产党员或者共产党，希望一切问题都能和平解决，革命也不例外。我们希望和平地进行革命。

“但是统治阶级不听我们这一套。顽固的反动政府会用武力进行镇压。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对血腥的镇压，我们必须用实力进行斗争。难道不是这样么！我认为说清楚这一点是上策。”

毛泽东是说“实力”，还是“武器”，我已记不清楚了，反正都意味着“武力”。他仿佛想强调，当反动政府用机枪进行镇压时，赤手空拳是无法与之较量的。

我的手一直握在毛泽东厚实的掌心中，心里马上联想起就在半年前，赫鲁晓夫曾在苏共二十大强调过革命道路的多样性，有可能通过议会实现和平过渡。毛泽东可能就是影射那个报告，批评赫鲁晓夫。

苏联派米高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出席了这次大会。

我在北京度过了这个世界性动荡的年头，一九五七年六月才决定回国。

党在“五〇年分裂”后，我于那年年底从神户出发偷渡中国，在北京和莫斯科生活了六年半。离日时患的重结核病已经痊愈，党的统一也勉强实现了。此时此刻，百感交集。

中共中央可能察觉到这一点，于是，便为我举行了欢送宴会，地点就在中南海刘少奇的住所（兼办公室），除毛泽东以外，中国最高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康生等都出席了。宴会很丰盛。席间，刘少奇提到一件意外的事情。

第十三回 偷渡日本海，帆船遇风浪

中国的要人都住在北京的中南海。毛泽东住在那里，刘少奇过去也住在那里。

刘少奇的住宅，有办公室和会议室。

我快要离开北京时，刘少奇在中南海住宅为我举行欢送宴会，出席者都是大人物：

最有可能接毛泽东的班的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新中国建国以来一直担任总理的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召开八大时擢升为总书记的邓小平，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此外，还有党的领导人康生等。

这反映出他们对我 and 日本党抱着很大的期望，也表明他们对以“六全协”为转机的日本党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分裂后走向统一的评价，尽管这个统一还是很初步的。

刘少奇多少有点以权威自居，强加于人，言谈举止也很生硬，有时甚至十分武断。

宴会上，刘少奇提起一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事情。他说：

“袴田同志，你回国之际，我有一个要求。听说日本正在出《刘少奇选集》，请设法劝阻，中国还没有《刘少奇选集》这本书。”

但他没有说明任何理由。我感到很意外，我想，出单行本大概没有问题吧，便说：

“刘少奇同志，你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在日本拥有许多读者，对党员也起了好影响。出版这本书不会有**问题吧？**”

刘少奇回答时只说：

“很难办。”

当时，日本三一书房已经出了全三卷《刘少奇著作集》，形成了同《毛泽东选集》平分秋色的局面。该书的译者、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都是党员，并已把书寄到北京。

刘少奇为什么表示“很难办”，我不得而知。我想可能那时毛刘的关系已经恶化，如同缺少润滑油的机器一样嘎吱嘎吱响。

中国的唯一权威是毛泽东思想，见诸文字就是《毛泽东选集》。刘少奇的“著作集”如果挤进去，会出现什么结果呢？与其说是刘少奇对毛泽东有顾虑，不如说毛泽东或其左右的人已对《刘少奇著作集》提过某种异议。

我表示明白了，并问刘少奇：

“此外，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邓小平把话接过去回答说：

“没有了。日本的情况，你们最清楚。凭点一知半解的知识就来指手画脚，是错误的。我们就是因为听了斯大林的话

而栽了大跟头。如果我们对日本党重犯斯大林的错误，那就太愚蠢了。”

邓小平说得完全正确，但此后中国党并没有照此办理。重新掌权的邓小平(现在党的副主席兼副总理)不知现在是怎样想的。

十二吨的机帆船路遇台风

一九五七年六月下旬，我和河田贤治乘专机离开北京，飞往北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飞机是苏联制造的，机舱内有谈话室和卧室。

赴北朝鲜，是为了搭从日本来接我们的偷渡船，但等了几天也一直不见踪影，只好在东海岸一所面临人工湖的别墅里呆了个把星期。实在闲得无聊，每天只得以钓鱼来消磨时间。因此，皮肤晒得黑黝黝的。后来回到党本部时，党员们都觉得奇怪，问我为什么皮肤变得这么黑。由于我去莫斯科和北京是极端秘密的，只好应付说，那是吃药引起的。

盛夏七月初，我们才离开东海岸新浦港。六年半前我从神户港偷渡出国时，是混进一艘九千吨的英国货船，而这次只是一条十二吨的机帆船，船上既无航海罗盘，又无航海图。这是下关的党员向人家借来的，几位船员也是临时找来的。一遇大风浪，船舱里就进水。

小船上一共六个人，四名船员和我们两人。为了避开耳目，晚上约九、十点钟出港。船舱里铺了两张席子，大家轮流睡觉。第二天早晨，天气很好。

这时才偶然发现，船长正朝太阳升起的地方掌舵。这样，

船就是朝着新泻方向。我担心地问道：

“你要把船开到哪里去？”

船长若无其事地回答：

“日本。”他看上去才二十八、九岁。

“我知道是日本。但预定靠岸地点不是出云吗？现在这个航向，会去新泻的。”

“不会的。你就交给我吧，我是专家。”

这个“专家”颇为玄妙，我一面同他争吵，一面几次要他掌舵向右方面转。据说，船长是党员，所以他不能无视党的领导人的意见。但如果只是稍向右转，小船就有可能开到舞鹤去，而那里设有海上自卫队，海上保安厅的船只也日夜监视着海面的动静。一进这道警戒线，就一切都完了。所以我一直要他右转船舵。

正觉得这样才放心时，第二天晚上就碰上了强台风。我们的小船象一片树叶飘浮在海面上，被大浪举到浪尖上又飘下来时，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山谷，葬身其中。河田贤治把能吐的都吐光了，死人般地躺在船舱里。

我自己也几次觉得完了。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偷渡船，不少都被大风浪所吞没，许多人牺牲了生命。

台风刮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晚上十一时左右，小船到达兵库县城崎附近的一个小渔港。

幸好防波堤伸到海上，小船熄灯后立即往前靠，靠上后我们两人便迅速跨过去。我们也没有带任何随身行李，所以即使被人发现，人家也不会怀疑。船员们直接驾船回下关去了。

“袴田”，这两个字怎么写？

我和河田顺着防波堤来到街上，首先跑进寿司^①铺，填饱了肚皮。快有七年没有吃过日本寿司了。我们口袋里装着中国给的二万几千日元。两人当晚就乘夜车赶回东京。

最困难的是不了解物价情况，当然可以向人打听，但我们正处于潜伏中，让人产生疑问就糟了。在纸烟摊上买了一包和平牌香烟和一盒火柴，付完一百元一张的纸币就要走时，主人嚷着要找钱。我说不用了，便迈步走开。烟摊老板娘一定认为我们不正常。

回到东京后，我们又潜伏了十天左右，最后三天住在高井户宫本显治的家里。百合子已经逝世，他同百合子的秘书大森寿惠子结了婚。我们和她初次见面，互不相识，而且在去党本部和大家见面之前，又不能把名字告诉她。大森寿惠子觉得我很可疑，一次曾在楼下抱怨说：

“那个人真不象话，对宫本讲话也是粗声粗气的。”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语言有失礼之处，可能是到这里来的党员太温顺了吧。

我七月二十二日才去党本部公开露面。在去代代木的路上，我顺便到新宿旧衣铺里买了一件上衣。我没有和宫本一道走，是因为怕万一在途中被捕。

党本部传达室里坐着一位老妇，我自我介绍叫袴田后，她还是不明白。

① 日本特有的一种点心，把米饭先用醋或盐调味，然后再拌上或卷上鱼肉、青菜、海带等而制成的食品。——译者

“袴田？是哪两个字，请写一写吧。”于是我就写了“袴田里见”几个字，她还是搞不清从哪儿来了这么一个人。

我说：“这里有电话，你向里面报告一下，说政治局常委袴田里见回来了。”

这时她才若有所思，表示“失礼了”，并让我进了门。

第二天《赤旗报》上是这样发表消息的：

“因为养病，在‘六全协’后一直未能参加党第一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袴田里见，二十二日早晨来到党本部，他已经恢复了健康，精神很好。”

“办完丧事就回去”的复电

到了党本部，我才和妻子菊枝联系。碰巧她离开东京到广岛去了。我便发了一个电报。不久就收到了回电：

“办完丧事就回去。”

后来听妻子说，在我离家后的六年半内，她的境况非常困难，当然这是意料之中的。

起初，因为我们一直被德田主流派看作“分裂派”而挨整，这直接连累到家室，不准她出席支部会，并被迫搬了家。

他们还停发我的工资，经济上也弄得很困难，她只得靠替人缝补衣服，勉强糊口。一次，她打算去维尼纶公司宿舍当管理员，并当面谈妥了条件，最后由于暴露出身份是潜伏中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就被毫无道理地除名了。

一九五五年后，党本部对我妻子的态度大有改变。因为他们知道，德田主流派（德田死后的代表人物是野坂参三和志田重男）同反主流派（宫本显治和我等）开始和解，“六全协”时

我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我在国外期间，没有和妻子作过任何联系。她时而提心吊胆，时而非常生气，曾经这样说：

“在分别的一年和一年半内，老是惦着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但是一过四、五年，反觉得无所谓了。进入第七个年头，心想即使回来，也得看你怎么表态，弄不好还不会便宜你呢。”

人情世故，也许就是这么一回事。

党虽然实现了统一和团结，但由于过去发生过那样激烈的斗争，所以留下了各种后遗症。一个方面的中心人物志田重男(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在潜伏期间玩弄艺妓的丑事被揭发出来后，于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式开除出党。分裂时期的公开组织“临时中央指导部”第一任主席椎野悦朗(中央委员)也因为和女党员的丑闻而犯了错误。因此，我回国时政治局常委为以下六人：野坂参三(第一书记)、志贺义雄、宫本显治、袴田里见、绀野与次郎、西泽隆二。

分裂的后遗症在我回国后仍有表现。一九五八年党召开七大前，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件”，党迎来了“百家争鸣”的时代。

第十四回 暴力革命论从党的 路线中一笔勾销了

很久没有到过代代木的党本部了，其内部比预料的还要混乱。不是设备，而是人事关系。上了几天班，一切就明白了。

“六全协”已经开过两年，但空气仍很紧张。谁是旧国际派，谁是旧主流派，分裂时期互相谩骂和拆台所造成的感情创伤，隐藏在大家的内心深处，时机一到，又剧烈发作了。

本部各部门的工作也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党员的人数和党的机关报及机关刊物的发行量一降再降。一九五〇年分裂前夕，我曾让人统计过，那时有十五万几千名党员，现在只剩下三万几千名了。党的收入也因此相应减少，造成财政恶化，常常发不出工资。而《赤旗报》编辑部里，却有人要求预支工资。还有象山边健太郎（前党纪委员会委员）之流，自己无精打采，尽给别人添麻烦，还大言不惭地攻击党的领导人。

还发生过这种事：我刚从本部工作人员身旁通过，背后就传来一阵戏弄人的怪叫声，回头一看，原来大家都在朝我笑。不知是谁低声朝我说一句奚落话，大家便哄堂大笑起来。

党的领导人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并不打算认真解决这种无政府状态。谁心里都有某种不满情绪，说不定遇到什么事就会发作一通。同时，谁心里又都有某种内疚。而作为主流派和反主流派妥协产物的“六全协”，又扩散了党内的消极情绪。

当时最高领导人是党的第一书记野坂参三，他过去属德田主流派，而且曾片面地为极左冒险主义捧过场，因此而有短处。

分裂后遗症表现得很突出。我觉得长此以往，指导部就难于发挥作用；于是，我下决心整顿党内，把一些屡教不改的工作人员，果断地从本部清洗出去。如保坂浩明，他在党的六大（一九四七年）当选为后补中委，但他过去曾因移动安在桥

上的一块标语牌而同警察发生冲突，他便纠集和煽动群众占领平市警察局。这件事后来发展成为“平市事件”（一九四九年）。由于这个肇事者惹祸，一百多人被起诉，其中有些人被判罪，结果很悲惨。

奇怪的是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到我回国时，他还担任了经营局副局长的要职。也许是为了保全自己并使自己高升，他常常把难以控制的某些本部工作人员，带到新宿酒馆去吃喝以拉拢他们。

我在本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批评说：

“把他安排在这一岗位上是个错误。”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党的七大后，我终于把他赶出了党本部。我对他说：

“你得到基层去从头做起！”

由于我干得大胆利落，所以也听到一些非难：

“袴田一回来就翘尾巴，他为什么那么威风！”后来知道，还有人背后骂我是“刽子手浅右卫门”^①。我扪心自问，其实真是忍无可忍才下手的。

审查秘密入境问题时佯作不知

这时，党的处境也很严峻。

志田重男作为旧主流派的代表，和旧反主流派的宫本显治合作，召开了“六全协”；但他由于潜入地下时期玩弄艺妓而身败名裂，接着椎野悦朗（分裂初期临时中央指导部的主席）也因男女关系的丑闻而被清除出党。群众本来就因为搞“火

^① 日本幕府时代专门执行处决任务的著名刽子手。——译者

1
焰瓶斗争”而对党失去信任，再加上这些事件，简直就是火上加油了。与此前后，又发生了“卡车部队”问题。

我起初还以为“卡车部队”可能是指那些用卡车偷盗、贩卖物资的人。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地下工作时期主流派搞“后门财政”的一支特别部队。他们用十分恶劣的手段，向中小企业搜刮资金。

就在东忙西乱时，警视厅通知我去随意报到。理由是“我有秘密入境的嫌疑”。我早有思想准备，可能到党本部一露面，警察就会找上门来，而实际上在我回国后四个月，即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底才接到通知书。因为到北朝鲜新浦港来接我回日本的那艘机帆船，有一位品行不好的船员（非党员），他在下关喝醉酒后闯祸被扣，警察审讯他时，他说曾经从北朝鲜把日本共产党的两名干部接运回国。

警察对这个船员的自供感到惊讶，他们经过调查，弄清这两名干部就是袴田里见和河田贤治，并就在那天通知我们去报到。

在警视厅，我以不知道为理由推得一干二净。他们企图将这件事搞成刑事案件。我先发制人地说：

“一九三二年，我们的同志岩田道义就是在警视厅三楼审讯室里惨遭杀害的，现在你们又想搞逼供吗？”

和战前、战时不同，我采取了强硬态度。

4
四个月后，又以违反检疫法嫌疑为理由，要我作为可以提供参考材料的人去报到。我的黄皮书虽被拿去检查，但此后也就不了了之。

一生廉洁奉公的市川正一

我回国后十个月，即一九五八年五月举行了大选。自民党得二百八十七席，社会党得一百六十六席，出现了“自民党—社会党对峙”的局面，共产党只有志贺义雄一人当选，而且一百一十四个候选人的总票数刚过一百万张。

对“火焰瓶斗争”的批评之声未息，“卡车部队”事件和志田重男垮台等等暴露了党的消极面，使党在社会上的形象降低了。特别是志田事件不禁使人想到，作为党的领导人，必须洁身自好。

战前，也发生过党的领导人在酒馆里和艺妓鬼混的事。一九二九年，锅山贞亲和三田村四郎就是在赤坂酒馆里同艺妓过夜时被捕的。

在洁身自好方面，“三·一五事件”后成为重建党核心的市川正一，就一直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战前，为了避开“特高”耳目，党常常在料亭^①里召开会议。但市川在这时也都自带果酱面包，绝对不吃料亭的饭菜。

“四·一六事件”被捕时，他把身上带着的二千元（现在约值四、五百万元）立即转给了救援委员会（锅山没有这样做）。

我在宫城监狱时，再次见到在网走监狱和千叶监狱来回囚禁的市川正一，遗憾的是战败那年三月，他因营养失调而在狱中逝世。那时他已极度衰弱，牙齿松落，只剩下几颗门牙了。

市川如能活到战后，那他就会取代德田成为党的领袖。

^① 一种高级日本饭馆。——译者

果真如此，战后党的性格也就大不相同了。

上面这段话多少有点离题。当时党内外严峻的情况当然会引起全党进行激烈的争论。在党本部占支配地位的气氛如实地扩散到党本部以外，一发生什么问题，党本部就受到指责。

被批判为“家长式的个人领导”的德田已经去世了，党内没有出现弥补这一空隙的权威中心。虽然“六全协”后宫本显治起了这一作用，但离权威中心还差得很远。

批判斯大林，开辟了和平革命的道路

从国际上看，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令人震惊地批判了斯大林，这也影响到日本党，要求重新评价“六全协”决议和《五一年纲领》的意见，成为广泛议论的对象。

强调武装革命的《五一年纲领》中有如下一段话：“认为依靠和平手段来实现日本的解放和民主变革，是错误的。”前面已经提到，这个暴力革命论的背景是朝鲜战争，是中苏两党插手日本党的产物。因此，“六全协”时，一面宣布极左冒险主义是错误的，一面又要顾全中苏两党的面子，把“实践证明，纲领（《五一年纲领》）所阐明的各种规定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段很不协调的话塞进了决议。

然而，苏联一下子就改变了方向。“六全协”后半年开始批判斯大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多样性，强调了和平革命的可能性，而且速即走上了和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道路。

日本党也不能对造成许多问题的《五一年纲领》和“六全协”决议听之任之了，于是，决定起草一个象样的党的纲领，并

以《党章草案》的形式提交党的七大。我回国两个月后，就发表了这个《草案》。其中有一段说：

“……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势力积极地占据国会议席，并同国会外的群众斗争结合起来进行战斗，具有重要的意义。如能在国会里拥有稳定的过半数，就有可能把国会由反动统治的工具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使革命获得更有利的条件。”

这就是重视议会主义，暗示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宫本显治后来曾批评我：

“苏斯洛夫要求把‘《五一年纲领》是正确的’这句话写进决议，而你接受了，看来这是一个错误。”如果这么说，那就请问：我、绀野与次郎、野坂参三、西泽隆二等人在莫斯科起草《六全协原案》的这段内容，为什么身在东京的你宫本显治也照样接受，并写进了决议呢？在“六全协”上，宫本甚至这样说过：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一新纲领（《五一年纲领》）所指出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纲领是这次决议（六全协）的指路明灯。”

“敌人如何行动论”取代武装革命

《党章草案》（包括政治纲领、行动纲领在内的党的综合性宪章）宣扬了重视议会及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那时并没有完全否定革命中“暴力”的作用。我和宫本当时都主张“敌人如何行动论”。

革命最好能够和平进行，但谁也不知道革命斗争究竟会怎样发展。战前那种对共产党实行镇压的政治虽然不会重

演，但随着民主势力的发展，必将出现彻底的反共攻势。这时应该怎么办？问题的性质取决于敌人如何行动，不能让和平革命必然论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这就是党中央多数人赞成的“敌人如何行动论”。

仅和平过渡这一问题，就使争论沸腾而起，至于围绕日本社会的“现状分析”和“革命性质”，党内争论更是不可开交了。而且在争论过程中，发现旧反主流派（国际派）内的意见也很不一致。

表现之一是，东京都党委员会“反对”中央的言论公开化了，其核心人物是过去和宫本显治亲密无间的原“全学联”^①委员长武井昭夫^②。

一九五八年初，宫本和我代表党中央出席东京都党的会议，主要由宫本说明《党章草案》，会场上大都是受武井昭夫、片山悟、芝宽、山本正美等“反中央派”影响的人，他们大声起哄，乱蹬地板，杀气腾腾地敌视中央。

在东京都党的会议上表现的这种激烈的对立情绪，照样在党的七大上出现，使大会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混乱局面。

祸不单行。紧跟而来的，便是“全学联”的造反。

① 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的简称。——译者

② 武井昭夫（1925— ），高中时入党，并开始写文艺评论，被宫本看中，在东京大学成为学生领袖，后激烈反对日共，一九六一年被开除出党。——译者

第十五回 一九六〇年反对日美安全 条约斗争后，党的力量迅速扩大

党中央和“全学联”指导部(成员大部分是党员)之间发生决定性的对立,是在一九五八年“六·一事件”^①以后,在此之前,我曾出席过一、两次“全学联”的党员会议。

在“全学联”的那几次会上,也象东京都党的会议乱七八糟一样,充满了向党中央造反的气氛。虽然都是一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但个个能言善辩。嘴里叼着烟卷,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也朝他们大发脾气说: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马上给我离开会场!”

“你别盛气凌人!”一片喧叫声。

反正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无法收拾。

他们之起来“造反”,是受到批判斯大林和匈牙利事件的影响。

那时,欧洲有些党出现不信任苏联党和共产主义的倾向,而且有许多党员脱党。比较之下,日本党员脱党的为数不多。但“全学联”所受的影响是很大的,出现了批判党中央的托派倾向。

由于党指导部没有看出这个变化,无法给予恰如其分的引导,所以一旦发现时,也就无能为力了。

^① 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日共中央召集“全学联”的党员开会,“全学联”党员大闹会场,几乎发生武斗,并作出要求罢免全体中央委员的决议。——译者

他们认为，代代木党中央里也充满着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他们叫嚷要和斯大林主义作斗争，并主张暴力革命和世界革命。他们还反对我们提出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肆意大搞极左行动。

“六·一事件”是导致党中央和“全学联”主流派之间发生决定性对立的事件。由于发生这一事件，绀野与次郎被认为失职而解除了政治局常委的职务，降为东北地方的组织员。使人感到佩服的是，他完全能够忍受下来。

是向美帝争取独立，还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因为出现上述情况，“六·一事件”后召开的七大自然也就发生了纠纷。首先，在中野公会堂集中的全国各地代表的态度就很不好，争吵不休，互相喝倒彩。更有甚者，当前排席位上无人时，就把双腿往上一搁，肆无忌惮地乱喊乱叫。我从主席台上看到这种情景，确实感到非常不愉快。

一九五〇年以来，分裂骚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在一九五五年的“六全协”上似乎已基本解决，但实际上并没有完结，大家都怀着一种受到挫折的感情。

向党中央提出的《党章草案》，众议纷纭，最大的分歧是集中在“现状分析”和“革命性质”上。这是战后党第一次自己制订的《纲领》。超越历来的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的分野，讨论沸腾地进行。

概括起来说，就是党中央多数派主张的“民主主义革命论”（草案是根据这个观点写成的）和少数派主张的“社会主义革命论”之间的对立。前者由宫本和我，后者由春日庄次郎、

内藤知周、龟田幸三等人代表。从这个阵势也可看出，在讨论《纲领》这点上，旧国际派已经分成两种对立的观点。

关于“现状分析”，我们的主张是：

日本处于垄断资本统治之下，这点无可非议，但在背后鼓励和支持垄断资本的是美帝国主义。美国在日本驻扎着军队和设有基地，有左右日本政府的力量。日本处于美国的半占领状态。不打破这种从属关系，就谈不到日本的独立和建立民主政府。

但春日庄次郎等人认为：

美国在日本确实设有基地和驻有军队，有影响力量，因此必须同它斗争。但更重要的是日本已经勉强地取得独立。如果重视这一点，那么当前的敌人就是日本垄断资本。

“现状分析”的意见分歧必然会影响对“革命性质”的见解。我们主张首先从美国半占领下争取独立，为此就要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政府，并逐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我们的设想是革命得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党章草案》的基本点也在于此。但春日等人坚持，日本已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当前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至于粉碎“旧金山体制”等民主改革，可以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来进行。

讨论没个完。我们虽是多数派，但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的代表反对《党章草案》。如强行表决，又会重新出现对立关系。还是以不勉强通过为好。所以把《党章草案》中《政治纲领》部分搁下，没有进行表决。三年后经过局部修订，才提交党的八大，正式通过为党的“纲领”。七大到八大这段时期，

是决定现在党的路线的重要时期。

大会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选举了新的领导人。春日正一、听涛克巳、藏原惟人、志贺义雄、铃木市藏、野坂参三、袴田里见、松岛治重、宫本显治等九人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第一次采用主席和总书记制，野坂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宫本当选为总书记。对野坂当选主席，我是有疑问的，这里暂且不去提它。

这时，我五十三岁，宫本四十九岁，野坂六十六岁。

红地毯不合我的性格

一九五八年秋至一九五九年，紧接着党的七大，修改日美安全条约问题，作为一个突出的政治课题提上日程。

一九五八年十月，藤山爱一郎外相和麦克阿瑟驻日大使开始正式谈判。第二年十月，以社会党、总评^①、原水协^②等为中心，成立了“阻止修改安全条约国民会议”，共产党作为观察员参加了这一共同斗争组织的干事会。由被开除出党的人掌握领导权的“全学联”，也以“青年学生共斗会议”的成员参加共同斗争组织，从而形成经常发生纠纷的根源。

规模空前的“一九六〇年反对安全条约斗争”开始之前，在六月举行了参议院选举，我第一次从东京地方区参加竞选。我在这里说“第一次”，但更确切地说，战后不久举行大选时，我曾向故乡青森县选举委员会表示要当候选人，他们也一度

① 全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的简称，据称有四百三十万会员。——译者

② 禁止原子弹氢弹日本协议会的简称，后来分裂为两个组织，一个支持社会党，一个支持日共，最近又有联合的趋势。——译者

受理过，但两、三天后因那个复权问题^①而被取消了资格。作为党的正式候选人参加竞选，此前此后再也没有过。

本来就不可能取胜。我没有进行任何活动让东京都的人民熟悉我的名字，而且自己又曾离开日本六年半，加上“火焰瓶斗争”中丧失的党的威信尚未恢复，所以这次参议院选举中，共产党只有须藤五郎一人在全国区当选。

坦白地说，我并不那么想当国会议员。一本正经地走在红地毯上，不合我的性格。而且议会实际上是一个大搞秘密交易的地方，这也和我的兴趣不同。有些人还抓我这一点，批评我“轻视议会”。

“一九六〇年反对安全条约斗争”开始了。

反对修改安全条约，我们的组织工作进行得最早，在“阻止修改安全条约国民会议”中的动员力量也最大。我们着重组织有秩序的游行示威和去国会请愿。一旦采取过激的行动，共产党准会首先挨整。

通过“一九六〇年反对安全条约斗争”，党员 人数和机关报发行量成倍增长

六月十五日晚上，我在国会附近，从宣传车上得知，桦美智子被警察打死了。我们现场指挥者当时曾力戒感情用事，以免上当，绝不冲进国会。如闯进国会，不但会有许多人被捕，而且反动政府可能出动自卫队。这样，游行队伍就会马上被冲散。反动政府还会以此为借口，制订各种镇压法案，甚至可能搜查党本部。这些都是它的拿手好戏。

^① 使小畑达夫“伤害致死”而被判十三年徒刑的问题。——译者

我担心的是，苏联《真理报》记者一味报道“全学联”的“勇敢”行动，并大量拍他们的照片。他们好象也认为，革命斗争就得这样轰轰烈烈地干。后来我去苏联时，就这种报道态度曾向《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提出抗议。

在中国，也出现了同样的误解。六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以野间宏^①为首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新华社报道了他讲的下列一段话：

“主席认为，日本的独立和自由是很有希望的。取消‘日美安全条约’，取消美国军事基地，日本的独立和平就会有保证……。

“毛主席祝贺日本人民在反美爱国正义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对于桦美智子的英勇牺牲，毛主席表示尊敬。毛主席说，桦美智子已成为世界闻名的日本民族英雄。”（《人民中国》一九六〇年第六期）

把托派称赞为“民族英雄”，我们感到非常不愉快。

我们的运动方式是正确的。其证据是：通过反对修改安全条约的斗争，党员人数和机关报的发行量都成倍增长。我们根据“阻止修改安全条约国民会议”的方针，在搞“统一行动日”时，在全国范围进行动员，轮流派大轿车到各个县县委会去接人，来东京参加激烈的斗争。在送他们回去的车上，党的组织员动员他们入党。

这种方式收到了效果。“一九六〇年反对安全条约斗争”

^① 野间宏(1915—)，著名作家，京都大学毕业，一九四六年入党，战后民主主义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一九六四年因和日共不和，被开除出党。作品有《真空地带》等。——译者

前,党员人数不到四万人,《赤旗报》的发行量不到四万份,但在斗争高潮过后的九月,党员人数增加到八万人,党报发行量增加到十万份。

壮大党的力量终于有了办法。宫本显治(总书记)也尝到了成倍增长的甜头,从此便积极地采取这种方式,即制订目标,发展党员和增加机关报发行量。

在莫斯科亲眼见到中苏对立的情景

九月,我和宫本带着“一九六〇年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成果,从羽田机场启程去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我们乘坐的法航班机,正巧是这条航线的最后一班螺旋桨飞机。广播员解释说:

“喷气式飞机飞行高度达一万米,螺旋桨飞机只能达到这个高度的一半。速度虽然慢得多,但却能看见地面的景色,请大家尽情欣赏吧。”

确实如此,地面看得非常清楚,特别是格陵兰,冰河保持缓慢的倾斜角度流入海洋,美丽极了。在海面上露出顶端的冰块,肯定是冰山的一角。

到北极时,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了极光。窗外闪耀着紫色亮光,真是美不胜收。

我们一到莫斯科,苏联党就送来一份打印的《速记录》,约有十页左右,密密麻麻的,要求我们过目。这是八十一党会议前夕,苏共代表苏斯洛夫和中共代表邓小平的谈话记录。看来是匆忙搞成的,一半已经译成日文,一半还是俄文。

我感到意外的是,苏中两党面对面地交锋。《速记录》中

有一段对话,说明双方感情如何冲动、争论多么尖锐。

会谈开始时,不抽烟的苏斯洛夫提议,在会谈中,双方都不抽烟,邓小平表示同意。但当争论白热化时,爱抽烟的邓小平无意识地去掏口袋。由于过度兴奋,终于取出香烟来并准备点燃。这时苏斯洛夫指着邓小平诘问:

“邓小平同志,我们不是刚刚达成都不抽烟的协议吗?”

邓小平突然想起来,勉强把香烟扔在烟灰缸里。

当我看到这一段时,简直有点目瞪口呆了。中苏两党关系已经恶化到如此地步了吗?不久,就在八十一党的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上,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第十六回 胡志明和我竭力 调停“苏中关系”

苏斯洛夫和邓小平的会谈,可以说是八十一党代表会议的“前哨战”。

看来,苏共似乎是希望在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前夕,两党先谈谈,多少调整一下不同意见。但结果适得其反,双方感情冲动,互相非难指责。

邓小平因过于激动,正想拿出香烟来吸时,苏斯洛夫马上责难说:

“不是已经约定在会谈中都不要吸烟吗?”

这种态度很不寻常。此外,双方讨论的议题也是多方面的,从路线问题到中印边界冲突,直至朝鲜战争时期两国不同

的处理方法。

一九六〇年九月底，我们一到莫斯科，他们就给我们送来这次会谈的“速记录”，看来这是苏共中央的一种事前工作。他们肯定希望我们“事先知道一点情况，了解一下中国多么蛮不讲理”。但我们对苏中两党毫不隐讳地争论，只感到大惑不解。

实际上，这年的六月，苏中两党已经在兄弟党面前把对立公开化了。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苏联召集了一次紧急秘密会议，赫鲁晓夫发表了谴责中国的演说。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当然没有沉默。

各兄弟党代表目击发生的情况，大吃一惊，逐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这次公开冲突后，苏中关系进一步恶化。七月，苏联发出通知，全部撤回派到中国工作的技术人员。于是，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就发展成国家间的对立。

我一九五九年访华时，曾参观过一个电线厂。该厂生产一种比头发还细的铜丝。厂长对我说：

“感谢苏联提供技术合作，使我们掌握了这种技术。”

在中国，不仅电线厂，建设发电厂和建筑桥梁时，也使用苏联机器，并由苏联技术人员担任指导。中国为这些技术人员新建了高级宾馆，免费招待，工资也和他们在国内领取的数额差不多。

苏联突然撤走这些技术人员，并撤销了其他援助协定。中国在一年前开始连续遭到旱灾，农业情况也很坏。正因为如此，苏联这一手是刺心彻骨的。

苏中路线斗争：是和平共处， 还是暴力革命

上述情况，也是苏斯洛夫和邓小平发生冲突的背景之一。本来苏中对立既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之间的“大国主义”较量。

在历史性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偶像位置上拉了下来，提出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苏中对立起源于那次大会。

我出席苏共二十大后，又出席了中共八大。在招待会上，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

“我们也希望以和平方式进行革命，但统治阶级不会听从我们的，在他们进行武力镇压时，我们也只能用武力来战斗。”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毛的这段话是影射赫鲁晓夫的。事实上，后来苏中两党的路线分歧就逐渐明显起来了。苏联主张，在社会主义这一和平力量增强的情况下，即使帝国主义还存在，也有可能避免战争。中国则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并未消失，战争根源依然存在，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

关于和平共处，苏联主张，这对加强和促进社会主义体制是必要的。而中国则反驳说，这是散布和平幻想，并断言暴力革命才是革命的主要形式。苏联强调，革命形式因各国的情况不同而不同，通过议会的和平革命也是可能的。

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中国党认为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肯定作用”也加以否定。

这些路线分歧也表现在实际行动上。一九五九年九月，

赫鲁晓夫访美，在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了会谈，以示和平共处的事实。中国对苏联的这场表演当然不会感到高兴。

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马上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建国十周年紀念活动。他在北京和毛泽东会谈得很不顺利。在那次会谈中，赫鲁晓夫要求使用中国的国内基地，但被毛泽东断然拒绝了。

之后，是西藏叛乱和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但苏联不是站在中国方面，而是站在印度方面，说什么“朝鲜战争结束才几年，现在不是进行国际战争的时候”，影射中国“好战”。在此之前，苏联还拒绝向中国提供生产原子弹的技术，中国的愤懑情绪到了极点。而现在又发生了苏斯洛夫和邓小平的争论。

争论白热化的格奥尔基大厅

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带着苏斯洛夫、邓小平会谈的余音，在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大厅召开了。全世界八十七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有八十一国的党的代表出席了这个大型国际会议。首先召开一个月的预备会议，审议苏联党提出的《声明草案》。十月革命节纪念活动结束后，于十一月十日正式会议开始。

宫本显治在预备会议结束后就回国了，由我担任出席正式会议的日本党的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成员有常驻捷克布拉格的米原昶（中央委员）和从日本来的西泽富夫（调查部副部长）。

十一月初，中国派刘少奇副主席（国家主席）为代表团团长。作为副团长的邓小平和团员的彭真，都是铁中铮铮的人物。

苏联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上阵。

其他使人难以忘怀的代表中，有法共的多列士（总书记）、匈牙利的卡达尔（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意共的陶里亚蒂的代表隆哥（副总书记）、东德的乌布利希（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北越的胡志明（劳动党主席、国家主席）、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劳动党第一书记）和波兰的哥穆尔卡（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等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领袖云集在格奥尔基大厅，场面极为盛大。这里过去是俄国沙皇给有功的将军颁发格奥尔基勋章的地方，名将的姓名都雕刻在洁白的大理石上。大厅中央的天花板上挂着一排排整齐的吊灯，显得庄严漂亮。

各国代表团坐在大厅中央长方形的会议桌上。上坐正中是东道国苏联的代表赫鲁晓夫等人，对面是中国代表刘少奇等人。我的座位在苏联代表团右侧，旁边就是胡志明。

会议主席根据俄文字母次序由各国轮流担任。虽说是字母次序，时而从最初开始，时而从最后开始。第一次是“A”阿尔巴尼亚，第二次是“Я”日本，即由我担任主席，大约一个小时就往下传。

我当主席时，自己并不觉得紧张，但出了一个差错，把下面请“苏共中央代表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发言”说成了“谢尔盖耶维奇·苏斯洛夫发言”。一瞬间，会场上都“噢”了一声。

会议开始时，由各国代表团团长依次发言。与会国多达八十一个，光听团长发言也花了不少时间。依次发言完毕后转入举手发言，这时会场气氛才骤然活跃起来。

这次国际会议的最大目的，在于确认共产主义者的国际团结，并为此制订一个“纲领性方针”。一九五七年，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曾云集莫斯科，起草了《莫斯科宣言》。至今整整过了三年了。

“新纲领”（称作《莫斯科声明》）草案在预备会议上推敲斟酌后提交正式会议，但在正式会议上又把预备会议上的争论重复了一遍。

谁都看得很清楚，苏中之间的分歧很大。实际上已经超出“分歧”的范围了。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和刘少奇、邓小平放肆地互相攻击，吵得不可开交。

讨论的题目有：兄弟党的相互援助；帝国主义的本性；民族解放斗争的评价；和平共处的意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问题；南斯拉夫和修正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以及国际联系和团结。

每天都开会讨论，反复修改《声明》草案的字句。东欧各国（阿尔巴尼亚除外）不用说是支持赫鲁晓夫的，西欧各国和中近东各国的党代表也都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保持中立或被看作稍靠近中国的，只有北越、北朝鲜、印度尼西亚等少数几国的党，公开非难苏联的只有阿尔巴尼亚。

恩维尔·霍查在会议进行到一半时站起来讲话。他一开始就指名道姓地指责赫鲁晓夫。他首先非难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技术人员，接着又说：

“我们也因发生旱灾和地震而受到饥饿的威胁，但赫鲁晓夫却没有把答应援助我们的小麦运来。我们毫无办法，只得出售仅有的一点黄金，从西方国家购买粮食。这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困难呀！苏联这样做，是违背马列主义原则的大国主义！”

苏联派的波兰代表和西班牙共产党主席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等先后起来反驳霍查。他们说：

“在这种会议上，这样非难赫鲁晓夫同志，难道不失礼吗？阿尔巴尼亚才犯了错误。”

伊巴露丽身高一米七几，是仪表堂堂的女中丈夫，这次会议上最大的雄辩家。她丈夫生前担任西共总书记，死于西班牙战争，唯一的儿子志愿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也牺牲了。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苏联派。

这场争论后，霍查一怒之下立即退出会场，回旅馆去了。

“一九六〇年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报告

获得热烈的掌声

终于轮到我发言了。我们的态度一直为各党代表所注意。在中国发言指责苏联时，大家都关心日本是否跟着鼓掌。因此，我们不得不慎重行事。

实际上，我们持中立态度，既不偏护中国，也不向着苏联。不论谁发言，只要是感情用事，就概不鼓掌。主张两国协商解决苏联撤走技术人员的问题。

但不能否认，我们内心是倾向中国的。首先，认为从中国撤走技术人员做得太过份了，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犯罪行为，给

中国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呀！在中印边界冲突上，我们对苏联不支持社会主义中国，也持批判态度。

但我在发言中一句也没有涉及这些问题。我讲的内容是我国在此前几个月开展的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与会者都知道我们取得了阻止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的成果，所以都很热心地听我发言。当我讲到日共在一千万人以上的群众斗争中起了核心作用，通过反美斗争党员和党的机关报都成倍增长时，全场响起了非常热烈的掌声。

《莫斯科声明》中有如下一段话：

“在日本，开展了反对日美军事同盟，争取和平、民主主义和民族独立的强有力的群众运动。”

正式会议拖了将近一个月。不管怎样讨论，都填不平苏中之间的鸿沟。大国意识、面子以及国家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以致发展到眼看就要决裂的局面。虽然谁也没有使用“决裂”这个词，但连散会时还决定不了第二天的开会时间。

不用说，若不是与会者一致签名，这个《莫斯科声明》就不会有多少分量。如果中国拒绝签名，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布苏中两党决裂，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重大裂痕。

我几经考虑，觉得只有请胡志明出来调停了。他经历过苦难的历史。越南长时期受到法帝国主义欺侮，好不容易才把它赶走，接着又面临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侵略，胡志明正同美帝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全世界谁都赞颂他、尊敬他。

胡志明对解决分歧的分量

我一个人来到胡志明住处，对他说：

“胡志明同志，全体与会代表都很尊敬您。您的发言有分量。是否我们一起去见赫鲁晓夫同志和刘少奇同志，请他们达成妥协。我们不应该使这次会议决裂。”

胡志明是和北越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一起接待我的。他拍拍膝盖说：

“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就去见赫鲁晓夫同志。”

我们还约了印度、印尼、北朝鲜、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国的党的代表，在胡志明率领下先去见了赫鲁晓夫。他比较简单地表示：

“只要中国同志赞成，什么时候都可以见。”

接着我们前往中国大使馆，会见刘少奇等人。胡志明一开始就说：

“我们希望刘少奇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能够促膝交谈，同志式地交换意见。这样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刘少奇的回答十分冷淡。

“我们也认为统一和团结很重要，但与其搞一个错误的决议，还不如不搞为好。现在的《声明》草案是错误的，因此以不搞为好。”

坐在胡志明一旁的我，也不能就此罢休，便说：

“刘少奇同志，我不同意您的意见。您们革命已经成功了，掌握了政权，没有必要考虑舆论问题。但象我们这些正在进行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有人写文章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了，就会出现许多困难。虽然在莫斯科争论很激烈，但最后还是统一了，如果不是这种结果，我们就很难办。请您再重新考虑一下。”

我们各自回到住处后，可能刘少奇给国内毛泽东挂了直通电话，事情急转直下，问题解决了。

第二天，在格奥尔基大厅，赫鲁晓夫对各国党的代表说：

“我和刘少奇同志协商结果，相互取得充分谅解。委托大会秘书处作若干文字修改后，这次会议就可宣告结束了。”

全场掌声雷动。这时，刘少奇突然站起来提出一个奇妙的建议。

第十七回 能言善辩的苏斯洛夫 同我在莫斯科的一场争论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初，在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大厅里，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进入最后一天，各国代表的脸上都显出一种安心的情绪，天花板上的吊灯也比往日明亮。

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面对面地坐在长方形桌子的正中间，赫鲁晓夫两侧是苏斯洛夫和柯西金，刘少奇两侧是邓小平和彭真。

赫鲁晓夫向大会报告他同刘少奇达成了协议，全场掌声雷动。苏中两个“共产党大国”携起手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巨大的力量。

在一片欢呼声中，刘少奇说了一段奇妙的话：

“我们有一个建议，把‘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这句话写进《莫斯科声明》。”

对此，我也吃了一惊。昨天以前两党还在舌剑唇枪地争论不休，尤其是中国代表团的 attitude 令人生畏。但一个夜晚之

后,却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提出这种建议,有过先例。三年前在莫斯科举行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

“人类社会里,到处都有个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党就是头。”

“头”和“先锋队”是有区别的,但我也弄不明白刘少奇为什么在苏中尖锐对立已经公诸于众的情况下,突然提出这样的建议。

战前和战时,有个名为共产国际的组织,其中由苏联党指导各国党。战后,斯大林实际上又通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进行过类似的指导。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组织了,互相之间没有指导党和被指导党之分,各党都是独立和平等的,任何党不得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

但是,格奥尔基大厅里的气氛,已经不允许我作上述内容的发言了。

刘少奇提议后,法国和捷克等国的党的代表相继表示附议。起初,赫鲁晓夫还推辞了一番,但难于说服大家,最后便在《莫斯科声明》里写了这么一段:

“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声明: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经验和久经考验的队伍,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先锋队。”

从字面上看,中苏对立已经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在格奥尔基大厅里举行闭幕招待会后,勃列日涅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陪同中国代表团刘少奇等人,访问了列宁格勒、基辅等城市,到处都一起出席群众集会和舞台上握手

言欢,热烈拥抱,表演双方情同手足的友谊。因此,外部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苏中对立的严重性。

少数派的核心人物春日庄次郎脱党

我回国后,因拟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举行的党的八大已日益临近,所以顾不上参加八十一党会议后的疲劳,就立即在全国各地奔跑了。必须设法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七大时流产的《政治纲领》。

我和宫本显治等中央委员会多数派认为,第一阶段的目标是依靠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逐步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春日庄次郎和内藤知周等少数派则主张社会主义革命才是当前的课题。双方的对立依然如故,七大的争论原封不动地持续下来。这样下去,八大也难免出现混乱。

深入一点说,双方对立的焦点在于认为日本是否已经独立;在今后的革命中,承认不承认争取独立的斗争是决定性的课题。多数派重视必须切断对美从属关系的反美斗争,少数派则坚持同已经复活的日本垄断资本进行斗争才是至关重要的。

不久前,在八十一党代表会议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争论。我一强调民主主义革命,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党的代表就群起而攻之,印象最深的是东德代表曾为此纠缠不休。他说:

“日本难道不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吗?可你还在胡诌什么从属于美国呀,独立斗争重要呀,民主主义革命呀;

社会主义革命才是你们的课题。”

我反驳说：

“我们党的方针应由我们自己决定。你们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认识不足。”

我现在仍然认为，我们多数派那时强调反美斗争是正确的。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和松岛治重(政治局委员)等人一起，前往少数派势力较大的关西和九州等地区的几个县委进行说服工作。宫本显治也不时到地方去活动。

但在八大前夕，身居党纪检查委员会主席要职的少数派头头春日庄次郎脱党了。接着，山田六左卫门、西川彦义、龟山幸三、内藤知周(均中委)、内野壮儿、原全五(均后补中委)等六人也追随春日，公开进行派别活动。

党中央立即召集中央全会，开除这七个人出党。这时，出头露面的常常是我，而不是宫本。

动了这一大手术后，七月二十五日，党的八大在世田谷区民会馆举行，会期一周，通过了《政治纲领》。这是在没有外国党干涉的情况下，我们党自己起草的第一个《纲领》。此后虽然作过若干修正，它至今还是党的“纲领”。

领导班子仍由野坂任党中央主席，宫本任总书记。宫本、袴田和松岛治重三人兼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围绕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第九次禁止

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发生纠纷

虽然通过了《新纲领》，成立了新的领导班子，但苏中两党

的对立使我们感到有沉重的压力。苏中两党在八十一党莫斯科会议上虽然没有决裂，但裂痕也越来越大，并公开化了。一九六二年十月发生了古巴危机。当时赫鲁晓夫把导弹运进古巴，美国肯尼迪总统对此大发雷霆，封锁海面，要求立即撤走。加勒比海形成一触即发的局势。一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声明从古巴撤走导弹。中国指责赫鲁晓夫先搞冒险主义，后搞投降主义。苏联则反驳说，这样做阻止了美帝对古巴的入侵。

古巴事件后不久，我代表日本党分别出席了保加利亚党、匈牙利党和捷克党的代表大会。大部分外国党的代表对苏联都大加颂扬，听起来肉麻得令人讨厌。只要谁在发言中一提到“托苏联的福……”，全体政府部长便都起立鼓掌。与此相反，向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吹的冷风，比预料的要强烈得多。

我们也不得不公开表态，承认兄弟党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同时要求苏中两党进行谈判，谋求和解。坦率地说，我们的路线和中国的路线一致的地方比较多。正如《新纲领》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日本处于半占领状态，应该把斗争着重于向美国争取独立这一点上，因此，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打击美帝国主义。在这方面，感到赫鲁晓夫强调的和平共处政策，削弱了反美的锋芒。

当时舆论界都宣传日共对华一边倒。虽然没有一边倒，但对站在反美斗争前列的中国抱有亲近感则是事实。

苏中两党和日苏两党之间的不和，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上，又进一步扩大和尖锐化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九六三年七月，正当苏中两党的论战高手苏斯洛夫和邓小平就“和解”问题进行会谈时，赫鲁晓

夫却置此于不顾，也在莫斯科举行了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会谈。三国在苏斯洛夫和邓小平的会谈决裂后第五天草签了这个条约。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三国除地下核武器试验外，全面禁止在宇宙空间、大气层和水中的试验。赫鲁晓夫大肆宣传这是走向全面裁军的“最初的现实成果”。

中国立即谴责这个条约是“愚弄全世界人民的骗局”。我们也不能欢迎这个条约。即使消除了大气污染，但可以任意进行地下核试验，所以并不会使美国感到为难。相反，条约具有削弱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和全面裁军运动的弱点。此外，从条约中还可以看出大国主义的基础，美苏可以通过这个条约垄断核武器，而不许中国和其他国家拥有。

由于我们不赞成这个条约，苏共就千方百计力图控制日苏协会的领导权（我是该会的副会长），拉拢党的领导干部（志贺义雄等），明里暗里干涉我们的内政。同年九月在广岛举行的第九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这一切都在日本国民面前公开了。

那次大会一开始，社会党和总评系统的代表就上次大会遗留的“反对任何国家的核试验”问题进行抵制，从而引起混乱；接着国内外的代表又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联代表团团长茹科夫吹捧这个条约，极力争取多数，他们同分裂“原水协”的社会党和总评系统的代表一起，对抗以日共和“原水协”为中心的力量。

同时，中国代表团谴责苏联阴谋和美帝勾结，束缚中国的手脚。

我作为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看见苏联派的外国代表不经主席许可就胡言乱语，便大声斥责他们。塔斯社惟恐天下不乱，大肆报道说：“袴田里见活象一个无赖汉，态度粗野极了。”我对此非常愤慨。而且茹科夫回国后，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广岛之声》的文章中，指名道姓攻击“日本共产党代表在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上，唯中国代表团之命是从，并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从此，不仅苏中对立，日苏两党的对立也公开化了。

同老相识苏斯洛夫的激烈争吵

一九六四年二月，我作为日共代表团团长，和松岛治重、西泽富夫等一起赴莫斯科（米原昶从布拉格前来），参加日苏两党会谈。我们的目的是要求苏联党及其影响下的组织停止对日本党及有关团体的不正当干涉。

苏共代表团包括仅次于赫鲁晓夫的第二号人物勃列日涅夫、库西宁（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中央书记、国际部长）等人，由勃列日涅夫担任团长。但由于以往的关系，苏斯洛夫最了解情况，他就成为我的主要论战对手。

我和他命中有缘，过去曾多次交锋。他比我大两岁，很早就被斯大林看中，当了中央书记。他个子瘦高，能言善辩，特别在指责其他党的缺点时，用语尖酸刻薄。当苏共对其他党的干涉形成问题时，常常在幕后指挥的不是苏斯洛夫就是米高扬。

会谈最初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举行，他表示“请客人先发言”，所以我便放了一炮：

“我们很清楚，世界上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兄弟党的关系上起过什么作用，并对此表示敬意。但最近在日本国内，我党和苏联大使馆、《真理报》记者的关系不如以前融洽。原因何在呢？”

“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也可以看出，你们只支持听你们话的人，进行分裂活动，干涉我们内政。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观点，不能一切都支持苏联的决定。不能因为不支持你们，就对我们进行批评、攻击。”

我说到这里，苏斯洛夫插嘴道：

“我们没有干过这种事情。”

④

我也加了一棒：

“共产主义者待人必须正直。现在我们每天都受到你们的干扰，不知如何是好。”

我拒绝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苏斯洛夫反驳说：

“我们从来没有干涉过其他党的内政。与此相反，我们一贯援助其他党，使他们处于有利地位。对中国共产党，我们也不知道提供过多少援助。”

我马上追问说：

“不要再吹什么援助了，说多了，受援国也会不高兴的。你说援助了中国，但并非是无偿的，而是缔结了支付协定的。尽管如此，同中国关系一坏，你们就马上撤走技术人员。你们的这种做法，使年轻的社会主义中国蒙受了多大的损失！”

坐在一旁的波诺马廖夫大吼一声：

“这是最后通牒！”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也都附和说：“最后通牒。”

我坚决顶住，并说：

“我们不是为了切断两党关系而来的，请你们收回刚才这句话。”我还觉得这场合是一个好机会，便提出了一九五〇年分裂时的问题。我谈到一九五〇年苏联党以“情报局批评”的形式，没头没脑地干涉日本党；在《五一年纲领》中，又和中国党一起把极左冒险主义的方针强加给日本党等。这时，苏斯洛夫一面摇手表示否定，一面抗议说：“那和我们没有关系，都是斯大林干的。现在你们旧事重提，只能认为是另有企图。”

我也没有让步。

“你们把一切都推在斯大林身上。但是，即使都是他干的，苏联党也必须理所当然地承担责任。”

从三月二日到十一日的日苏会谈就这样决裂了。然而苏方却千方百计要搞一个《联合声明》。但是这次会谈未就任何问题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发表一个表面上是有意义的《联合声明》，就等于欺骗世界人民。我们拒绝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波诺马廖夫追到机场，在我一只脚已经跨上舷梯时还拉着我的衣袖纠缠。

“袴田同志，还是签字吧。你不签字，我们不好办呀。”但我还是拒绝了。

毛泽东说的一段令人费解的话

我们离开莫斯科后便去中国访问，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

迎。那时中国已在报上公开批评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是“分裂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

在中国,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进行了会谈,也会见了毛泽东。还有过这样一件事:

我们离开中国去北朝鲜访问时,中国驻那里的大使转告我:“毛泽东希望再见一面。”我回国途中在武汉停留,去见了毛泽东。那时,毛泽东讲了一段令人费解的话:

“我们并非生来就是共产党员,我是如此,你也不例外。我们一面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一面改造了思想。但就在我们领导人中,有人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对这段绕着弯子的叙述,我无言对答。难道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才特意请我来的吗?毛还想继续说下去,但这时有几个人走进屋来,他便中断了谈话。

两年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少奇等人就挨了批评。那时我才醒悟过来,原来毛泽东那段令人费解的话是针对刘少奇说的。

四月,我们前往广州,和正在那里疗养的宫本显治会合。此后,又赴河内访问,再次见到了胡志明。“胡伯伯”简单朴素的住宅令人至今难忘。

第十八回 在天安门上获悉印尼

“九·三〇事件”时的冲击

一九六四年二月,我前往莫斯科和苏共中央会谈前不久,宫本显治到了广州。他肺炎后康复不佳(也非重症),医生劝

他去温暖的地方疗养，以恢复健康。正巧这时中国党发来邀请，他便决定去广州。随行人员颇为排场，计有妻子、孩子、医生、两名护士和秘书等六、七人。

顺便提一句，当时苏中两党对立已经发展到公开论战，前景暗淡。日本舆论都在渲染日共执行亲华路线。在此情况下，党的总书记到中国去过疗养生活，客观上意味着什么，已经不言而喻了。

现在再说什么当时带着医生和护士同行，是出于这一判断，即从独立自主的立场出发，不能靠外国医生安排疗养生活。这是一种多么自欺欺人的逻辑呀！

我在莫斯科和苏斯洛夫等人会谈后，相继访问北京、平壤，四月到达广州。陶铸（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等当地许多人举着红旗前来迎接我，其中包括宫本显治。

宫本住在广州郊外设有游泳池的迎宾馆里，游游泳，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我汇报了莫斯科日苏会谈的情况，第二天就和米原昶、西泽富夫等乘专机飞往河内。那时美国尚未开始轰炸越南北方，但南方已经打响了游击战争。河内十分平静。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和近千名群众队伍，以及歌舞团载歌载舞欢迎我们。

他们安排我们住在一所旧日本军队司令部的楼房里。一会儿，胡志明就乘苏制低级胜利牌轿车从后门下车，独自一步一步地沿楼梯走了上来。他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正在和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交战的国家的主席，不如说是一位农村的老大爷。有时他在街上步行，一个女孩手捧鲜花向他跑来，他便把女孩抱在怀里，亲亲她的小脸蛋——和这种动作相称

的革命家，是为数不多的。

松散的统一战线在大反攻中发挥了威力

莫斯科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后三年半，我和胡志明又重逢了。那时，他采纳我的建议，为苏中两党“和解”而奔忙过。敢于反对美帝侵略的胡志明的发言，分量是很重的。

胡志明曾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里学习过，是我的老前辈。我们直接用俄语交谈。他说话坦率，但不滔滔不绝。诚恳朴素的话语中，充满了他特有的风格。

几天后，我们去他住宅。他的生活俭朴得令人吃惊。那是一幢二层木房子，一层就是几根柱子，二层只有两个房间。地板也是木板，擦得很亮，但也没有铺地毯。房里放着桌椅。

胡志明坐在床上，笑着说，他就住在这里。

房子四周有几个警卫人员在暗处警戒。此外，就是一对青年夫妇经常来帮助料理一些家务。

胡志明指着原法国总督府的方向说：

“那里虽然改成了主席官邸，但散发出帝国主义的臭气，令人不快，不如住在这里踏实。”

胡志明爱抽烟，常常要吸到烫手时才把烟头扔掉。

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是南方人，皮肤很黑，给人一种冷静而透彻的感觉。他向我们介绍的建立细致但又广泛的统一战线经验，至今记忆犹新。黎笋说：

“目前我们在南方建立的统一战线，不是以武装为主的。我们的斗争既然是民族解放战争，那么即便是保守派，只要他主张越南必须独立，南北必须统一，就能够和我们团结起来。”

佛教徒、基督教徒、政府官吏、商人都不例外。以工人、农民组织为基础，不急不躁、以理服人地把他们组织起来，如同把一块一块石头堆砌起来。统一战线中，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南方城市里，即使是同情分子，也不能强行给他们布置任务。根据社会情况，组织他们进行不显眼的斗争。这样就可以团结许多人，十年、二十年后一定会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操之过急，肯定会失败。”

黎笋歇一口气继续说：

“不久前，周恩来同志来过越南……。我对他也谈了统一战线问题。他听后拍拍膝盖说：‘如果当时我们也象你们一样组织这种统一战线，就没有必要进行长征了。’”

这个统一战线的威力，在越南战争最后的大反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岘港、波莱古、直至西贡，都是如此。惊慌失措的美国军队，丢下大批坦克、飞机逃跑了。

我一面听黎笋的介绍，一面反省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实在太性急、太自负、太好大喜功了。例如，只要工会执行部一被社会党系统的干部掌握，就去批评一通，整人家。当他们斗争失利或谋求妥协时，又声色俱厉地再敲打人家一次。

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始终未能克服这个缺点。

“欢迎您到越南休养一个时期。”

我们郑重地婉谢越方的亲切表示，回到广州。在那里又碰上了一个证明日本党操之过急的事件。

只考虑保护组织而发表《四·八声明》

在国内，从一九六三年秋天开始，以总评系统的全电

通^①等为中心,要求提高工资的气氛很强烈。随着第二年春季斗争^②的进展,这种要求更加强烈。后来进一步发展,以国劳^③、动劳^④、全电通、全递^⑤等“公劳协”^⑥为主体,决定四月十七日举行“半天总罢工”。

但四月八日,共产党突然发表了题为《告春季斗争中的全体工人》的声明书(《四·八声明》),对“半天总罢工”大泼冷水。

《声明》一开始虽说:“以提高工资为主要内容的春季斗争,正在迎来由罢工而引起总动员的重大局面,日本共产党再次表示支持工人的春季斗争。”但却对“由罢工而引起总动员的方针,感到深切的忧虑”。并进而提出:这样做会给政府、大资本家进行镇压以借口;他们正在施展阴谋诡计,分裂和破坏工会;工人群众对这场严重斗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因此必须排除挑拨,尽快重新研究由罢工引起总动员的方针。

我从越南回到广州,看到九日的《赤旗报》刊登的这个《声明》,感到愕然。这不是在破坏罢工吗?

我问身旁的米原昶和西泽富夫:“你们如何看待这个声明?”

① 全国电气通讯工会的简称。——译者

② 日本工人每年春天开展一次以要求提高工资为主要目标的斗争。——译者

③ 国营铁路工会的简称。——译者

④ 国营铁路动力车工会的简称。——译者

⑤ 全国邮递员工会的简称。——译者

⑥ 公共企业体工会协议会的简称。——译者

但他们一言不发。

我便说：

“这个《声明》完全是胡说！群众团体决定的事情，而且象总罢工这样重要的事情，共产党有什么权利进行制止？干这种蠢事，总评内的反共分子一定会攻击总评内的共产党员。使我们最为难的，不是受到资方的攻击，而是遭到自己伙伴的指责。总评和我们是进行共同斗争的伙伴。”

我们马上飞往海南岛，因为宫本已经到那里去了。他精神很好，每天游泳，晒得黑黝黝的。海南岛建有军港和机场，军事上很重要，同时盖了一些供党的领导人休养的别墅。他吃的也特好，可谓应有尽有。

宫本马上问我们对《四·八声明》的意见。我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宫本也赞成我的意见。于是当即把我们两人的意见整理一下，用电话传达给东京党的政治局。

但为时晚了。“半天总罢工”已经通过池田勇人首相和大田董总评议长之间的高级会谈解决了。

虽说我和宫本显治，以及松岛治重都在海外，但这件事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

后来听说，在政治局等会议上，极力主张发表《四·八声明》的是听涛克巳（政治局委员）和伊井弥四郎、冈田文吉、竹内七郎等人。他们担心，一九五〇年解除公职时，一些在行政部门和企业里的党员都被赶了出来，如今好不容易才逐步得到恢复。如果再搞总罢工，还是党员积极分子挨整，也很可能又一次被赶了出来。

他们只着眼于保护组织这一点，而没有看到整个潮流。

但这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野坂参三和志贺义雄等人身为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加于制止。

《四·八声明》反响很大。工会内党员积极分子大都挨了整。全电通、全递等工会里，不少党员都以不服从工会领导、妨碍罢工为由受到处分，以至被开除出工会。

我在四月底回到日本，宫本则在五月返回，才得出《四·八声明》是错误的结论。为了处理善后，我先后去各个工会表示道歉。现在还记得，当时全递委员长宝树文彦狠狠向我提出意见。日教组^①、国劳和私铁总连^②等，对我坦率承认错误，都表示好感。

“不能非难中国的核试验”

俗话说，一个难关刚过，又进一个难关。五月，政治局委员、众议员志贺义雄违反党的方针，在议会表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时投了赞成票，并在投票时擅自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早已准备好的小册子《向大家呼吁》。显而易见，这是在向党中央挑战。

志贺投白票(赞成票)的事件，我们并非完全没有预料到。在去年十月七中全会上，我们已经作出了不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决定。志贺和后来在参议院投白票的铃木市藏(政治局委员)、中委神山茂夫、中野重治等人在那次讨论中，已经对不赞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表示保留意见。

而且，在党的方针决定后，志贺还经常出入苏联大使馆，

① 全国教职员工会的简称。——译者

② 私营铁路工会总联合会的简称。——译者

充当苏联的代言人,大肆宣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向全面禁止核武器前进了一大步”。

在投票的前一天,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应众参两院议长邀请来日本访问,时间虽然错开了,但这个白票事件正是在米高扬出席众议院全体会议旁听时发生的。

宫本一回国,我们就召开中央全会,开除志贺、铃木出党,九月又开除了追随志贺一派的神山、中野。

十月,传来了中国首次进行核试验的消息。中国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认定这个条约是“为了维护美英苏三国的核垄断”,我们根据中国的这一立场,就估计到中国的核试验已经为期不远了。诚然,中国事先并没有把首次核试验告诉我们。

坦率地说,想起原子弹轰炸所造成的悲惨景象,在内心难于举双手赞成中国的核试验,但也不能因此产生非难中国的情绪。中国一直处于美帝的核包围下,受到遏止政策的威胁。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不得已的。记得当我听到中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时,感到“中国干得真出色!”

使艾地产生错觉的庆祝典礼

一九六五年,亚洲形势激烈动荡。

二月,美国开始轰炸北越,不断增加投入南越的正规军人数,越南战争越打越大……。九月,发生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政变的事件,即“九·三〇事件”。

日本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几年双边关系急剧发展。把美帝国主义看作最大敌人的政治路线、对部分禁止

核试验条约的批判态度、对苏中对立所持的立场观点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基本上和我们采取相同的路线。同时，我们，特别是宫本显治对印尼党主席艾地朝气蓬勃的领导能力，感到强烈的吸引力。

当时，这位年仅四十二岁的领导人，和鲁克曼第一副主席、约多第二副主席一起，完成了重建党的工作，建立了一个除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之外的最大的党，党员人数超过三百万。和印尼“独立之父”苏加诺总统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苏加诺正是依靠军队和共产党这两根支柱处理国政的。

但是，我对印尼党也并非没有一点怀疑。前年年底，鲁克曼来日本访问，他说：

“空军和我们合作，海军保持善意的中立，只有陆军首脑最反动。他们在陆军内影响很大，但不足为惧。与此相比较，问题在于印尼最大的财阀担任经济部长，而他又和托派相勾结。”

听了他的介绍，我觉得这个估计过于乐观了。印尼陆军势力最大，其核心是纳苏蒂安将军（国防统筹部长），军内反共意识根深蒂固。

他们所说的三百万至三百五十万党员人数，多少有些夸张。至于支持党的工农群众多达五百万至一千万之说，但在关键时刻，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我们认为这是可疑的。

我作为党的代表团团长，这年五月前往印尼访问，出席印尼党建党四十五周年大会。一到首都雅加达，首先感到惊讶的，是全国都在热气腾腾地庆祝党的生日。大街上挂着许多巨幅标语，上面写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万岁！”

我感到仿佛来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纪念大会在苏联赠送给苏加诺的可以容纳十万人的体育场举行。苏加诺和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等全体部长都来参加了。会场里挤得水泄不通，使人觉得党的力量非同寻常。

苏加诺在纪念大会上大捧特捧艾地和共产党。他说：

“艾地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城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艾地是印度尼西亚的城墙。失掉共产党就是失掉兄弟。”

对苏加诺的演说，会场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和赞叹声。我想出席纪念大会的陆军将领们对这种情景是不会愉快的，而艾地等人却因此产生了一种错觉。

艾地接着讲话说：

“为了粉碎马来西亚，对付美、英帝国主义的威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武装印尼的工人和农民。工农武装是防止帝国主义入侵的唯一办法。对世界的恶魔、一切帝国主义的头子美帝国主义，印度尼西亚人民必须发动更强大的攻势。

“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没收包括石油企业在内的美国设在印度尼西亚的企业，实行国有化。”

我听着艾地的这一篇“强硬演说”，但也万万没有想到四个月后，印尼党会伙同一部分军人，发动武装起义。纪念大会第二天，我见到了一支由二、三十名女党员组成的武装部队，但她们肩上扛着的武器都是些十分旧式的枪。

此外，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位中央委员的夫人批评党中央说：

“多数政府工作人员只上半天班，下午得穿着短裤去拉人力车。不打点零工，他们就活不下去。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国家！农村更惨。而现在的党中央却不去组织斗争，只和苏加诺扯在一起。”

我对她说：

“在外国客人面前批评党中央是不对的，我虽不会去告状，但以后要谨慎一些。”

话虽这么说，但后来知道，持她这种观点的党员大有人在。

不想斗争的党中央，突然飞跃式地发动武装起义。原因何在呢？

中国国庆节晚上得悉冲击性的消息

许多党的代表参加了印尼党的纪念大会。和印尼党关系密切的中国派来了以彭真为首的代表团，北越代表团团长是政治局委员黎德寿。

在一次招待会上，朝鲜劳动党的代表邀请我们夫妇去朝鲜参加解放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和休假一个月，并说这是金日成首相的口信。

我表示，这得回日本后和其他领导人商量一下，但估计问题不大。这时，彭真笑着走过来说：

“袴田同志，走什么路线去朝鲜呀？”

“除了中国，还有什么路好走呢？”

“那就在朝鲜和中国各休假一半时间吧。”

光我一个人去外国休养，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但我还是接

受了彭真的好意。

朝鲜解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八月十五日在东海岸景色优美的休养地元山举行。至今印象很深的是，受到金日成首相亲切的款待，当时我和艾地夫人同桌而坐。不知那位夫人后来的命运如何？

回国途中，我和妻子一起到中国休养，九月和常驻北京的砂间一良（中委）会见了毛泽东。这件事在下回再谈，我难忘的是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传来的“事件”。

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地庆祝了建国十六周年国庆节。庆祝活动十时开始，我们从后侧阶梯走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走在最前面，一个弱小的女孩子搀扶着他，防止万一摔倒。接着是刘少奇，他由一个强壮的青年搀扶着。第三个是我，一个小伙子要搀我一把时，我谢绝了，表示自己可以上去。

从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向下眺望，景色别致，我尽情观看了五十万人的游行队伍。

“事件”在那天晚上传到我的耳中。

天色逐渐暗下来时，天安门广场开始放焰火。城楼上白天站人的地方并排放着一些桌椅，上面堆满了酒菜。边吃边喝，边谈边看，焰火美得无与伦比。整齐的大炮同时把焰火射向天空，刹那间整个广场就象白天一样明亮。

大约九点光景，国家主席刘少奇朝我走来，轻声说道：

“袴田同志，有件事……。”

我起身靠近他，他脸上露出一种从未见过的悲痛、沮丧的神色。

“袴田同志，印度尼西亚象是发生了武装起义，雅加达电台开始兴高采烈地广播革命力量已经夺取政权，但不久反动势力就开始广播了。不知道印尼党的同志们情况怎样，真叫人着急。”

我受到强烈的冲击。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革命委员会不到一天就被镇压下去

刘少奇的担心是对的。

印尼党的一部分力量和苏加诺总统的卫队长翁东中校一起，九月三十日半夜到十月一日拂晓，突然袭击陆军首脑，杀害了陆军司令亚尼和国防统筹部长纳苏蒂安的副官，占领了电台和电报局。翁东中校立即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内阁名单。

但是，革命军所做的仅此而已。

免遭杀害的纳苏蒂安、陆军战略后备司令苏哈托等指挥陆军部队和伞兵，十月一日晚上就镇压了革命军，并以此为契机，陆军、右翼伊斯兰教徒开始在全国清剿赤色分子，惨杀了二十几万共产党员。中国大使馆也因曾经支持过印尼党而遭到袭击。十月又传来消息说，艾地在中爪哇被枪杀了。

聪明的艾地等人，为什么要急于求成呢？也许是过于相信三百多万这个数字，也可能是认为已经争取到了苏加诺而产生的这种安心感起了作用，还是因为低估了陆军的力量呢？

五月，印尼党建立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后，艾地出访阿尔及利亚、苏联，八月来到中国。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首脑都

会见了。不知道那时他们对艾地——毛泽东的崇拜者谈了些什么。他回国后形势急转直下。

国庆节一过，我就急着回国了。宫本从印尼“九·三〇事件”中也受到了震动。

第二年，另一种不同形式的冲击又向我们侵袭了。

第十九回 日中两党决裂的原因， 毛泽东的“苏联法西斯论”

随着中苏之间和日苏两党之间的对立加剧，日中两党的关系愈加密切。一九六五年，我们夫妇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应邀去中国休养的。在我们没有觉察的情况下，中国的反苏感情意外地激昂起来。

此前，我曾多次会见过毛泽东。我几乎每年访华一次，而且每次都有机会和毛泽东交谈。他的每一次谈话，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年九月会见毛泽东，也不例外。

我和砂间一良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会谈，内容涉及越南战争等各种问题。刘少奇突然批判苏联说：

“苏联已经堕落成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建立了法西斯独裁政权，必须和他们斗争到底。”

我吓了一跳，情不自禁地朝砂间看去。

苏联对日本党进行种种干涉，中国也受到这种干涉。同病相怜，谈话投机，但对这种赤裸裸地敌视苏联的感情，自己实在无言对答。批评苏联是“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还可以接受，但“法西斯”就值得斟酌了。这句话使人联想起希特勒

和墨索里尼，联想起奥斯维辛^①。当时中国还没有使用社会帝国主义这个词。

刘少奇讲完后，我表示：

“感谢你们为我们提供这个交换意见的机会。这对增进相互了解很有好处。在大部分问题上双方都是一致的，但也不能不承认，有些部分我们难于赞同。”

说到这里，毛泽东走了进来。他问：

“你们和他们意见一致了吗？”

我回答说：

“许多问题上意见一致，但坦率地说，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毛泽东用柔和的语气说：

“日本的同志们非常能干，我坚信你们一定能够出色地解决各种问题。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行事。”

但“苏联是法西斯”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出口的，第二年毛泽东一宫本会谈时证明了这一点。

那天，毛泽东表态后就结束了谈话，一起进餐。席间，毛泽东祝酒说：

“理应由我祝酒，但因为我不会喝酒，所以请大家一起干一杯。”

我在宴席上觉察到，刘少奇自始至终闷闷不乐，周恩来一个人忙着应酬，邓小平默默无声地用筷子夹菜吃。从这三个人的三种表情中，可以看到毛刘关系和毛周关系。

^① 波兰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在这里修建了大规模的集中营，残杀犹太人和其他人民，罪恶滔天。——译者

毛泽东说“美中必战”

这里，还想提及同年九月另一件事。党的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发表了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论文。九月三日《人民日报》刊出，九月十七日《赤旗报》全文转载。实际上，论文内容只强调武装斗争，我们实在难于跟上。

论文引用毛泽东语录后强调：枪杆子里出政权；美帝是纸老虎，强大的是人民；不应该害怕战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从而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至今有效；美、欧是“世界的城市”，亚、非、拉是“世界的农村”，必须依靠这个人口众多的“农村”来进行世界革命，等等。

林彪还把采取和平共处路线的苏联称作修正主义，谴责它“帮了美帝国主义的忙”。论文中，已经出现不只是“反美”，苏联也是打倒的对象这种反苏思想的萌芽。此刻，已经不是一般的中苏对立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宫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访问中国、北越和北朝鲜三国的。那时，两年前进党的九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上田耕一郎、不破哲三等随宫本同行。

访问目的在于呼吁建立反对美帝侵略越南的国际统一战线。我们和苏联党对立，批判其现代修正主义的错误，但赞成它共同支持北越。前年二月起轰炸北越愈演愈烈，大量美国地面部队卷入南越，越南战争已经升级为“美国的战争”。

宫本代表团在访问上海、河内和平壤后来到北京，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起草了一个联合声明。但当把这个联合声明

带到上海去见毛泽东时，事态发生了剧变。

毛泽东看完联合声明后，气鼓鼓地说：

“苏联岂止是修正主义，是在搞法西斯独裁嘛！联合声明不指名谴责苏联，还有什么意义？北京那些人太软弱了。”

后来听代表团汇报时知道，毛泽东还说：

“美帝企图把越南战争扩大到中国，我们不应该害怕打仗。假定发生美中战争。那时，美军可能从北越边界、朝鲜边界、台湾、冲绳入侵中国。为了牵制美军，越南、朝鲜和日本党还要支援中国。

“同时，美中战争一开始，苏军就会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借口，侵入内蒙和东北地区。我们还必须和苏联较量……。”

因此，他主张，现在需要的不是“反美统一战线”，而是“反美反苏统一战线”。这样，哪里还能谈得拢呢？毛泽东一官本会谈不欢而散，代表团拒绝毛泽东的建议后，受到冷遇，三月底回到国内。

同苏共处不好关系，现在又和中共发生对立。对我们来说，这是继印尼党政变失败后又一个巨大的冲击。

决裂后，中国党对我们党和友好团体的内部干涉非常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新闻工作者会议等相继发生分裂，党内毛泽东盲从分子出版《毛泽东思想研究》（西泽隆二、大塚有章等）、《长周新闻》（福田正义、原田长司等）^①一类刊物，开始攻

^① 以福田正义为首的日共山口县委一九六六年“造反”，成立日共（左派），并出版《长周新闻》等，后同我党关系也逐渐恶化，在我粉碎“四人帮”后，公开猖狂反华，目前和阿尔巴尼亚拉得很紧。——译者

击党中央是修正主义。进而在北京发生了砂间一良、绀野纯一(《赤旗报》记者)受到嘲弄的事件。

这些动向和席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关，我对红卫兵运动最难于忍受。他们既非工人，也非农民，只是一些高、初中学生，但却给对革命有功的老同志戴高帽，挂黑牌，任意游街批斗。他们虽是受人煽动的，但这些青年男女究竟有什么权利诽谤和污辱革命功臣呢？

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使多少人受到打击，遭受牺牲，在失意中离开人世？如贺龙将军，这位勇猛的战略家受到大字报攻击，在监禁中死去。前几天，听说刘少奇的左右手彭真已经复出，但就在我认识的人中，有些老干部至今并未恢复工作。有些人自杀了。经济极度混乱，阻碍了建设和发展。

文革创伤，至今未愈。

捷克事件前夕的莫斯科会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同“暴徒”发疯一样。在骚乱期间，正常的党的机构失去机能，一切都以毛泽东的名字、都以个人崇拜的形式来进行。

这些消息报道使许多人不再信仰社会主义。紧接着在一九六八年，又发生了一起更为严重地损害社会主义国际信任的大事，即苏军入侵捷克。

战后，捷克在苏联援助下，革命获得成功。这使捷克长期处于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地位，苏联也把捷克看作徒弟和儿子。但捷克早就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受到西欧文化的强烈影响，憧憬自由的气氛根深蒂固，要求对苏一边倒造成的

窒息进行批判的呼声日益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八年一月，四十六岁的“自由派”旗手杜布切克取代“保守派”诺沃提尼，当选为第一书记，开始走上自由化的道路。口号是“建立更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目的在于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在勃列日涅夫眼里，这成为对苏联的叛逆。他从杜布切克一上台起，就开始对捷克进行种种露骨的干涉。八月二十日，苏军坦克部队和波兰、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华沙条约国的军队一起，侵入捷克，包围了捷共中央总部和总统府。不仅如此，苏军还给杜布切克等党政领导人带上手铐，劫持到莫斯科。

苏联究竟有什么权利这样干呢？

很凑巧，这年八月，我正好在莫斯科，和苏共代表苏斯洛夫谈判处于绝缘状态的日苏两党关系正常化问题。八月八日，会谈开始第二天，苏斯洛夫突然反常地表示：

“袴田同志，今天就结束会谈，明天我要去休养了。”

我生气了。

“去休养而停止谈判，这算什么！何时结束应由双方商定。”

这个抗议使会谈在后一天也照常进行，但苏斯洛夫满腹牢骚地说：

“勃列日涅夫同志说我成了日本党的俘虏，要我尽快收场。”

那时，苏斯洛夫根本没有提及入侵捷克的事。但我回国后得悉，那些天苏联和东欧国家正为捷克问题紧急磋商，接着

就是突然武装入侵。后来我想，苏斯洛夫说要停止谈判，可能就是出于此因。

世界共产主义力量四分五裂

苏中公然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这一影响下被迫表明态度，其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捷克事件……，最近开始的中越斗争、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翻脸，如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马克思、列宁都没有料到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写道：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然而现在不只是无产者，就连共产党本身也失掉了国际团结。

原因何在呢？不言而喻，苏共负有最大的责任。

一九一七年，在俄国辽阔的土地上，出现了社会主义政权。这是历史性的重大事件，为人类前进的方向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但当首先取得革命胜利自豪感转化成傲慢，摆出领导者的架子干涉其他党并搞大国主义时，情况就坏了。这和过去向我们党和其他党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完全是两码事。

一九六〇年，赫鲁晓夫以不顺从自己的意志为理由，从正在从事建设的中国一下子撤走苏联技术人员，使中国受到了极其重大的打击和损失。入侵捷克事件上，蛮不讲理的苏联大国主义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进一步说，党的领导人的责任也是一个问题。上面曾经提

到，一九六四年我去莫斯科参加两党会谈，批评苏联党在有关一九五〇年分裂问题上干涉过我党时，苏斯洛夫马上摇手辩解说：

“这是斯大林干的，和我们无关。”

但是，即使是斯大林主动干的，苏联党也必须承担责任。光说从中国撤走技术人员是赫鲁晓夫的责任，入侵捷克是勃列日涅夫的责任，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关于这一点，我想必须写一段山本悬藏的事件。一九三七年，他被卷入斯大林的清洗，无端地受到怀疑，死在西伯利亚监狱里。事情虽然发生在很早以前，实际上也是今天的问题。

一九六〇年，我在莫斯科见到山本夫人。那时，她向我诉说的悲惨遭遇，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第二十回 证明我对党中央批评意见的内部资料

山本悬藏的名字已经很少人知道了。他生于一八九五年，如还活着，今年该是八十三岁。他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在二十年代我国工人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他从一个普通小学毕业后，当过多年金属工人。

一九二八年“三·一五事件”中，党员大量被捕时，他因患结核病卧床不起而幸免，并避开“特高”监视逃到莫斯科。此后，他作为红色工会国际日本代表进行活动，和片山潜、野坂

参三等人生活在一起，经常往返于莫斯科和海参崴之间，同日本的同志们保持联系。

一九三七年，斯大林刮起大清洗风暴时，苏联军警突然闯进山本居住的公寓，把他劫持走了。据说是因为特嫌，但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不知道为什么会怀疑到他头上，只能说那是一个异常的时代。

遭受同样命运的日本革命家，还有从德国留学后到达苏联的医生国崎定洞，属于美共的十几个日本人（他们因为没有美国国籍而被驱逐出境，来到苏联），以及和冈田嘉子一起跑到苏联的杉本良吉。加起来约有近二十个日本党员，都以相同的特嫌被带走了。其中多数早已处决，但详细情况至今不明。

山本在逃离日本时就患有重结核病。为了照顾他，一九三一年，当时的风间丈吉^① 执行部把他妻子关松子派到莫斯科。她是天草人，在海参崴工作时和山本相识。

战后我们得悉，山本一九四二年死于西伯利亚犯人医院里，死时审讯尚未结束。他内心该有多么懊悔呀！

大清洗造成的有功人员家属的悲剧

一九五四年，我在莫斯科写完《六全协原案》，行将返回北京前，问苏斯洛夫：

“苏斯洛夫同志，我马上就要离开莫斯科了，但心里老是

^① 风间丈吉(1902—1968)，小学毕业后当钳工，一九二五年留苏，一九三〇年回国后重建日共，任委员长。一九三二年被捕，变节叛变，一九三四年被开除出党。——译者

牵挂着一件事。听说我们的山本悬藏同志曾受到不正当的怀疑，病死在流亡地，他的妻子至今还活着，在西伯利亚一个食堂里洗碟子。她比我大七、八岁，已是相当高龄了。知道她还在劳动，心里很不安。对革命有功人员的家属，不能认为这种待遇是妥当的。希望把她接到莫斯科，作为兄弟党领导人的夫人，给予应有的待遇。”

苏斯洛夫问同席的苏共中央日本处人员：

“你们知道她的事吗？”那个人点点头。苏斯洛夫就向我表示：“好象他们知道她的地址，一定按照你的意见去办。”

六年后的一九六〇年，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见到了阔别三十五年的关松子夫人。在场的还有片山潜的女儿片山安。正如苏斯洛夫保证的那样，关松子那时已经领取养老金，住在莫斯科的一所公寓里。

但单身流落异乡的寂寞感，总是不好受的。何况这个异乡就是杀害自己丈夫、此后又使自己吃尽苦头的苏联。真想离开这个令人诅咒的国家，回到自己故乡去……。

她知道我来到片山安的公寓时，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

“袴田同志来了，日共代表团团长袴田同志来了，这一次他一定会把我带回日本去的……。”

一见面，他就诉说道：

“袴田同志，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把我带回去。”

对此，我除说谎外，别无他法。她的事尚未和党商量过，山本的案子也没有向苏联发出过正式照会。

我只好应付说：

“请再等一段时间，不久一定会来接你的。”

“袴田同志，连您也这么说呀！我为什么不能回日本呢？”

我的耳边，至今还回响着她那悲惨的呼声。

不久，她就死在莫斯科的公寓里。那时，我为何不尽全力把她交给日本党呢，实在太遗憾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后悔莫及的大事。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写上这一段呢？不用说，是为了说清楚斯大林的责任，以及苏联党必须把它承担下来。

信任苏联，并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拚命工作的全世界的革命家们，在本国受到迫害，逃到革命者的祖国苏联来的满腔热情的同志们，在那次大清洗中无端地受到怀疑，丢掉了宝贵的生命。现在苏共中央已把这一切都置之脑后，完全推在斯大林头上。

“对不起，那是我们的过错。”

遗憾的是，至今还听不到他们说这样一句话。不，不仅如此，对死者家属也不能光给恢复名誉的一纸空文就算了事，而应给予相应的待遇。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也是有责任的。关松子对日共的怨恨也许超过苏共，特别是野坂参三曾在莫斯科和山本夫妇朝夕相处，更有责任把她救出来。

大学毕业的秀才们青云直上

我把话题从四分五裂的国际共运转到了斯大林清洗。毛泽东一宫本会谈决裂后，一九六六年十月，党的十大召开了，正式开除了西泽隆二等亲华派。一九七〇年，又召开了党的十一大，通过了题为《七十年代的展望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

的大会决议。不用说，这个文件基于党的力量得到发展的势头，对七十年代抱有很大的希望。其中一段写道：

“七十年代的各种条件，孕育着如下展望：日本民主势力事实上结成统一战线，打倒自民党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从而结束战后延续二十五年的保守党的反动统治。民主势力必须战胜一切困难、障碍，把七十年代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事业推向成功。”

宫本显治的战略是：七十年代，自民党和共产党的对峙将成为基轴；在七十年代不晚的时期内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那时，党员数已经超过三十万，并拥有近二百万机关报读者。

人事方面，也建立了主席、委员长和书记局长三个岗位，四十岁的不破哲三提拔为书记局长。那时的副委员长由我和冈正芳担任。

这样看来，好象都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从那时起，党的活动就有问题了。老干部开始受到排挤，宫本身边大学毕业的秀才们受到重用，青云直上。典型例子就是不破和他的哥哥上田耕一郎。四十来岁的人物还有冈正芳、政治局常委西泽富夫，以及小林荣三、榊利夫等（后来，当过宫本秘书的小岛功等都进了政治局）。宫本一帮人控制了党的要害部门。

过去一有事就来商量的宫本，也从那时起不理睬我了。正象有人背后骂我是“刽子手浅右卫门”那样，过去只要一闹事，就由我出面，同反对派和派别活动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在党的十大前夕清除毛泽东盲从分子后，也就基本结束了。与此同时，宫本就不需要我了。

不错，不破等人确实对宫本有一呼百应的能力，写出又长又难的论文，但这些秀才并没有经历过艰苦斗争的考验，缺乏群众运动和日常工作的基本功。一次，宫本就说过：

“如让不破君从地区常委一级开始锻炼，也许更好一些。”

从那时起，扩大《赤旗报》发行量、增加党员成为至高无上的命令。一次又一次地举行“扩大月活动”，给基层党员分配扩大《赤旗报》发行量的任务，使他们忙得晕头转向。

被扩大《赤旗报》发行量弄得精疲力尽

社会上，公害严重，住宅问题也日趋紧张。物价上涨、“合理化”、低工资等造成了不少问题。农村里强迫农民减少粮食耕作面积。理应把这些生活问题一一提上日程，组织市民运动、群众运动，开展更积极的斗争，但放在这些方面的力量却很少。不做日常工作，不帮助市民做一些切身的好事，只是一味地劝诱他们订阅《赤旗报》，其效果是有限的。但宫本和年轻的秀才们似乎不懂这个道理。

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了。

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立花论文”^①。一九七六年一月，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在国会上提出了“小畑、大泉特务查问问题”。这些本来都是难于容忍的反共攻击，但宫本却把我的作品《和党一起前进》的内容作为问题了。

我的作品中叙述了：宫本从网走监狱出来的过程；特务小畑在查问中企图逃跑，我们从后面抓住他时，他哇地一声大喊

^① 评论家立花隆发表长篇文章，揭露宫本、袴田等人一九三三年使小畑达夫“伤害致死”的共产党“私刑事件”，进行反共宣传。——译者

起来；我在法庭陈述中说明小畑断气时体位是朝下的，等等。宫本对我上述叙述极为恼火，杀气腾腾地要我更正。

一九七六年大选失败后，我和宫本彻底决裂了。一九七二年上次大选时，包括“革新共同”和冲绳人民党^①在内，党取得了四十个议席，引人注目。这次减少二十一席，只有十九人当选。

在总结大选的十二月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我批评不肯承认大选失败的宫本等人，并指出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党从早到晚只抓扩大《赤旗报》发行量，放弃了群众斗争和日常工作。我进一步指出：无休止地扩大《赤旗报》发行量，县和地区一级干部、党员都已精疲力尽，丧失了积极性；党内民主不够；国家机关和大企业的党员显著减少，而既不交党费、又不参加活动、根据党章十二条理应开除的“党员”却在增加（一九七六年八月前的八年间，达到十三万多人）……。

接着，我要求改变路线。我说：

“这样下去，根本不可能在七十年代不晚的时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我绝非不负责任地乱放炮，而是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设性的意见。宫本等人却看作对他们的攻击，非法地把我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从那天的议事录上一笔勾销了。

近千名人士批判党中央

我被开除后，《赤旗报》攻击我的发言“全是扯谎”、“杂乱

^① “革新共同”是日共支持、控制的组织，个别人以此名义参加竞选，更能取得党外人士的选票。冲绳人民党是冲绳的一个小党，一九七二年大选后并入日共。——译者

无章”。但我在那次常委会上的发言并无错误，其证据是当时有近千名党内外人士来信批评党中央。这里我仅公布一部分证明这一点的内部资料。

这些资料是党的选举对策局在选举后让众议员候选人写的“书面感想”，装帧成册后在政治局常委中传阅的。

正森成二(大阪一区,当选)在“书面感想”中说:

“扩大《赤旗报》是重要的,也是温度计。但是为了持续扩大并维持其发行量,绝对有必要结合群众要求,开展经常的服务性活动、群众斗争和群众工作。特别在大城市,这将决定胜负。”

“然而,最近党的活动倾向,是常常不以群众工作为基础,只把扩大发行量作为自己的任务。这样下去,即使一时增加了,还肯定会降下去。现在,共产党必须成为护民官,成为群众日常要求的代言人。”

三谷秀治(大阪四区,当选)在涉及《赤旗报》发行量时,尖锐地指出:

“在我当面接触支持者和读者时,多次发现他们收到《赤旗报》后原封不动地堆在一旁。虽在扩大运动中成了读者,但并没有看报。”

“关于这一点,不少人的意见认为报上的文章是难而无味。这不仅限于《赤旗报》。许多人还说,电视讨论会上,矢野绚也(公明党书记长)的话比共产党人讲的好懂,共产党人讲话象在大学里上课。为了把报办得通俗易懂,必须把长篇论文缩写成摘要。”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还应该改进读者会的组织工作。由

于过分追求发行量，大都采取极其事务性的工作方法，削弱了归纳群众要求、发动群众斗争的观点。大家强烈认为，通过实际利害关系，提高政治觉悟固然重要，但光靠大道理，也是很难在群众中普及的。特别要紧的是不能成为《赤旗报》的劝诱员，而要重视组织工作和群众运动。”

田代文久(福冈二区,落选)反映了选区里的下述内情:

“扩大党的力量即是选举胜利，这种形式已经定型了，领导机关依靠这种形式大搞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选举后，一位来访的女党员对我说，党的工作没有意思，提不起劲来，扩大运动已把大家搞得疲惫不堪了。

“一个市职员工会的党员说，选举时上级号召我们为革命而休假，但在搞扩大运动时，早把薪金照发的假期全部用完了，那里还有为革命休假的余地呢。

“向地区组织、支部提出矿区灾害等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时，也因眼下正忙于扩大运动而无暇顾及的理由被拒绝了。

“国铁工会筑平、北支支部近二十年来一直由我们领导，但今年被社会党夺走了。原因在于党只搞扩大运动，不抓工会工作，从而脱离了工会会员。而且，开始时还能动员一些党员来搞扩大运动，时间一长，大家就疲塌了。”

小竹辉弥(山形二区,落选)说:

“果农的税金斗争，活用国有山林的问题，保证西瓜价格的斗争，反对进口樱桃的斗争，冷冻灾害对策，等等，凡是哪个地区在我党国会议员团的支持下进行斗争，那里就对我党寄予期望，上次支持自民党的群众也积极支持我党了。”

中京地区的一个候选人(落选)对县委委员长眼睛朝上表

示很不满。他说：

“来支援选举的人，党内地位高低不同，所受的待遇也完全不一样。政治局委员一级的就贵宾相待，否则就冷若冰霜，真令人寒心。选举期间，上田副委员长来支援时，县委委员长陪他去高级饭店进餐，而 K 议员和我就在选举事务所内吃饭盒的饭。我并不是也想去高级饭店，问题是上田来访时间很短，我非常想听听他对候选人有些什么指示和建议，但最后他并没有认识我，就回去了。”

寺前岩（京都二区，当选）对基层党员不热心这一点诉苦说：

“选举期间配给我三名警卫人员，但在我打招呼前，他们连自我介绍都不作，缺乏常识。三人都没有受过党的教育，其中一个更差劲。一天，他居然中途回家了。另一个当我在街头演讲遇到酒鬼捣乱时，不但不去处理，反而成了累赘。”

不准我参加干部会议，令人愤慨

我至今认为开除我是非法的。我是副委员长、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但去年一年内却不准我参加政治局会议。不仅如此，去年四月，一面不让我参加常委会，一面又给我停止党员权利六个月的处分。在六个月未滿前，十月召开党的十四大，把我排除在外。

开除我的理由是我在《新潮周刊》上发表了那篇手记。但是请问，把我排除出一切党的机关后，我能用什么办法把自己的心情告诉党员，说明自己的立场。

我为党奋斗了五十余年。在艰难的十五年监狱生活中，

我也没有“转向”，坚持下来了。我从未想过自己会被开除出党。《赤旗报》在我被开除后对我的恶毒攻击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宫本为了把我搞臭，已经把党的机关报也占为己有了。

宫本一伙在把我开除前玩弄的全部阴谋，我决心在其他场合具体而彻底地加以揭露。

这里，我谨表示，我决心要把不长的余生献给日本共产党，来结束“我的战后经历”。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